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9 772096 337209

2020/3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二〇年第三期（总第二十一期第四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征稿重点

一、参考主题

- (一) 统一战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 (二) 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 (三) 统一战线与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研究
- (四) 统一战线与“两大奇迹”研究
- (五) 健全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制度研究
- (六)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制度研究
- (七) 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 (八)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
- (九)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研究
- (十) 完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研究
- (十一)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研究
- (十二) 做好新时代海外统战工作研究
- (十三) 坚持和完善统一战线民主监督制度研究
- (十四) 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研究
- (十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统一战线发展历程与经验研究
- (十六)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
- (十七) 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表现与教训
- (十八) 国际社会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二、相关说明

以上参考主题为大方向，欢迎广大作者结合学科专业和热点难点问题确定选题。重点主题范围内稿件，我刊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来稿敬请关注以下方面：

(一) 内容要求。导向正确，主题突出，逻辑清晰，结构规范，论证深入，文字通畅。

(二) 规范要求。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重合率不高于15%。每篇论文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不少于10条，提倡包含精到的文献述评。

(三) 体例要求。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 000字，体例参照《〈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四) 征稿时间。2019年11月—2020年12月。

(五) 投稿方式。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联系电话：（023）62874725。

(六) 我刊开放获取地址：<http://www.cqsy.org/?Tongyi/Zhanxian/>。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0年第3期

主管单位：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 《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编 委： 王英津 冯玉军 朱陆民 华正学
齐鹏飞 许建英 严安林 李春玲
李 捷 李路路 杨 恕 肖存良
吴志成 邹平学 沈桂萍 宋 俭
张献生 张 建 张 峰 陈先才
陈奕平 范柏乃 罗振建 罗来军
周 勇 周淑真 袁廷华 莫岳云
钱再见 殷啸虎 郭春生 郭朝先
袁 征 黄天柱 蒋 锐 蒋德海
韩云波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 夏晓华
主 编： 何晓栋
编辑部主任： 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0年第3期（总第21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4卷

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专题

01 人民监督权力：论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逻辑

/ 刘俊祥 曾 森

11 凝聚共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使命及其实现 / 蒋德海

17 新媒体时代的量子化生存与离散式联结

——论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统战工作创新 / 谢 静

新时代统一战线专题（1）·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研究

24 内外联动：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中的2019年香港暴乱

/ 曾向红 张峻溯

45 “港独”的极化机制与过程研究 / 李 捷 李文慧

62 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异化及其化解途径 / 赵 浚 陈社杉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中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数据库总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新时代统一战线专题(2)·重大疫情应对与民营企业发展

- 68 疫情中生鲜电商的机遇、问题与对策：在线新经济视角 / 李勇坚
- 76 疫情对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及应对 / 郭朝先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 82 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解构：基于媒体舆论的政治学分析
/ 陈奕平 关亦佳

研究现状与动态

- 91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中“nation”与“nation building”术语
之意涵解析——兼论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 / 叶江
- 101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研究述评 / 张多
-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征稿重点
-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0 No.3(Sum No.21) Vol.4

- 01 People Monitor the Power: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Developing Socialist Monitory Democracy
LIU Junxiang&ZENG Sen
- 11 Building Consensus: the Miss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JIANG Dehai
- 17 Quantized Existence and Discrete Connection in the Era of New Media——On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Alliance and
the Innovation of United Front Work
XIE Jing
- 24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Hong Kong Riots in 2019 in a New Round of Global Protests
ZENG Xianghong&ZHANG junsuo
- 45 Polarization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Hong Kong Independence"
LI Jie&LI Wenhui
- 62 The Dissimilation of Hong Kong Nativism and Its Solution
ZHAO Jun&CHEN Zhishan
- 68 Opportunities,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resh Food E-commerce in the Epidem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ine New Economy
LI Yongjian
- 76 The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pidemic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GUO Chaoxian
- 82 D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reat Theory" in Australia:a Pol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Media Public Opinion
CHEN Yiping&GUAN Yijia
- 91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Meaning of the English Terms "N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Nation building :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 by Andreas Wimmer——Concurrently Talking About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Book to the National Identity Building in Multi-ethnic Nations
YE Jiang
- 101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ZHANG Duo

人民监督权力： 论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逻辑

刘俊祥 曾 森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监督民主是人民通过各种方式监督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关的权力行为的民主政治形式。监督民主理论主要有西方的超越式民主理论和中国的系统性民主理论。超越式民主理论认为，监督民主是继大会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后的民主新品种，是公民监督公权力行为的“后代议”民主发展的新趋势。系统性民主理论认为，一个良性发展的政治系统应该全面发展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中国已经形成三大民主共存发展的雏形。政治系统走向良性的政治发展，要求政治构建、政治运行、政治监护（监控维护）和政治更新的全方位民主化。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逻辑及实践逻辑是：在扬弃西方超越式民主理论基础之上坚持系统性民主理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为指导，坚持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共同发展战略，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民主化与法治化。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有助于避免陷入国家治乱的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监督民主；超越式民主理论；系统性民主理论；系统生命周期理论；人民民主思想；人民监督权力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3-0001-10

“监督民主”（或称“监督式民主”）概念由西方学者最先提出并使用。但以“人民监督权力”为本质特征的监督民主理论则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提出并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监督思想和监督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监督思想和监督民主理论中国化的表现。我国民主政治实践已经初步形成由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这三大民主形式构成的人民民主政治体系。对什么是监督民主、为什么要发展监督民主、怎样实现监督民主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梳理出超越式民主理论、系统性民主理论以及人民民主理论等不同的监督民主理论。本文着力梳理这三种民主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0.03.001

作者简介：刘俊祥，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曾森，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刘俊祥，曾森. 人民监督权力：论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3）：1-10.

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逻辑。笔者认为：监督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和人民监督权力的民主政治形式，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治由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这三大实现形式构成。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把监督民主置于民主政治形态层次进行学理考察尚未获得足够重视。多数学者把监督等义于民主监督手段，并重点在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等分割语境中讨论。有的研究认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既是对执政党治国理政过程的政治监督，也是民主党派作为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1]。有的研究指出，“协商式监督”是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新定位，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2]。笔者前期的相关研究初步论及“监督民主”问题，在中国特色人民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认为，新时代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并推进监督民主的法治化^[3]。对“监督”的工具化、局部化认知，不利于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新型人民民主形态的高度，在民主形态层次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治的创新发展与进行话语体系构建。鉴于此，本文运用系统性民主理论，在整体性、形态性层次上论述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逻辑。

一、超越式民主理论：超越大会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监督民主新形式

“监督民主”概念和理念由美国学者迈克·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最先明确提出。但最早从事监督民主研究并形成系统性和代表性监督民主思想的学者是澳大利亚的约翰·基恩（John Keane）。以约翰·基恩为代表的西方超越式民主理论认为，监督民主是继大会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后的民主新品种，是“后代议”民主发展的新趋势。可见，超越式民主理论或者说后代议监督民主理论就是西式监督民主理论。

在思想逻辑上，约翰·基恩基于对西方民主（特别是代议制选举民主）的反思而展开监督民主研究，并阐述其监督民主思想。针对西方代议制选举民主的思维定势，约翰·基恩提出了“民主东方论”和“民主多元论”的观点，认为民主最早不是源于西方而是源自东方，因此，民主是东方馈赠给西方的礼物而不是相反。而且，西方的模式已经不再具有普遍性，因为民主正在走向本土化。

“民主的价值和制度从来都不是一个刻板的固定模子，甚至民主的含义也在随着时间发生变化。”^[4]基于此，他将民主的历史划分为大会民主时代、代议民主时代和监督民主时代这三个有所交叠的时代，认为民主既是一种决策方式，也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所谓大会民主是相互平等的人以集体会议方式进行自我管治。所谓代议民主则是将政府工作交给在定期选举中选出的代表去处理的人民治理。所谓监督民主则是“一种政体、一种生活方式，任何生活在这一制度下的掌权者不仅要接受周期性的‘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的监督，而且要经受各式各样独立监督机构严密的监督和制约，这些独立机构的使命就在于制约和消除专制权力中的腐化性的负面影响”^{[4] 588}。在约翰·基恩看来，这种诞生于“后1945”时代的“监督式民主是民主历史上的新品种，它包含了许多正在迅速成长的‘后议会制’政体，其核心是各种在议会之外严格审查权的机制”^{[4] 588-589}。

这就是说，监督民主是对代议民主的叠加式超越。一方面，监督民主的发展既依赖于代议制，又成就了代议民主制。“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代议制民主的原则——公共性，公民之间人人平等，选举代表——才真正成为代议民主制的精髓。”^{[4] 584}另一方面，监督民主作为一种全新型的民主，正

在逐渐超越和取代代议民主。这表现为“权力监督组织的数量在增长，分布的范围也在扩张，其发展的速度说明‘一人一票一代表’的老规则，也即代议民主斗争的核心要求，正在被监督式民主的新原则所取代：‘一人，多重利益，多种声音、数张选票、数名代表’”^{[4] 591}。而且，这种“监督式民主是一种全新型的民主，它在运作上与人们常用的教科书所讲的‘代议民主’、‘自由民主’或‘议会民主’大相径庭”^{[4] 603}。其显著特点之一是它逐渐地将监察机制带进民主之手触及不到的社会领域，让权力监督和权力控制机制向整个政治秩序的周边和下方扩展。在这方面，约翰·基恩与西方不少学者的看法相反，认为“代议制民主的时代正在过去，一个新型的‘后代议’民主已经诞生，并在整个民主世界伸展蔓延”^{[4] 15}。其发展趋势既不延续代议民主，也并非回到想象中的雅典大会民主或转变为协商民主，而是走向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民主——监督民主。在这个刚刚开始和监督民主新时代，民主的新含义或者说监督民主的含义，就是“对各种决策者进行公共审查和公共监控，不论他们做出的是国家机构的还是跨国机构的决策，是所谓非政府组织的还是民间社会组织（比如企业、工会、体育联合会或慈善机构）的决策”^{[4] 15}。在约翰·基恩看来，“人民大会的民主和代议机制一直在与公共监督和公共审查权力运作的新手段相互融合。代议民主并不是简单地在萎缩和消亡……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二战’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公众要求清除腐败和权力滥用的压力，代议制民主逐渐地、不声不响地深化出一种新的、前人无缘得知的民主形式”^{[4] 15-16}，这就是监督民主。

基于约翰·基恩的上述思想逻辑，笔者将其监督民主理论归纳并称为超越式民主理论（或者说后代议监督民主理论）。一方面，监督民主理论已经超越了西方既有的代议制选举民主理论；另一方面，监督民主是公众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新背景下对各种国内和跨国决策者进行的公共审查和有效监督。这在民主模式上是对大会民主特别是代议制民主的超越。因此，监督民主可以看作后代议民主的“新品种”和“新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约翰·基恩监督民主理论的提出和阐释，从观念上打破了“民主西化”的神话和“唯选举民主”的思维定势，可以也应该多样化和本土化地发展各国的民主。而且，在选举民主之上或之外，还可以发展新型监督民主——由人民（公民）民主地监督公共权力机关及其公权力行为。因此，我国发展形式多样的人民民主政治以及监督民主，理应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当然，约翰·基恩的监督民主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论证性的。对于何谓监督民主、为何要发展监督民主以及如何发展监督民主，约翰·基恩并未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约翰·基恩乐观宣称的监督民主能走多远，能否成为“公民大会民主、代议制民主之后的第三种民主，这已经引起争议和质疑，同时有待时间来检验”^[5]。另外，从基本理念上讲，以约翰·基恩以及舒德森为代表的监督民主理论，虽然试图在民主产生和发展方面超越西化思维，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寄希望于美国有能力担当监督式民主的负责任“领袖”，无视马克思主义监督民主理论的先在性和前瞻性以及中国特色监督民主实践的有效性。这种理论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西方的超越式民主理论或者说后代议监督民主理论。

二、系统性民主理论：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并存的监督民主形式

超越式民主理论的“西方性”注定了其缺乏普遍的分析论证力。于是，笔者尝试在扬弃超越式

民主理论或者说后代议监督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探寻一种新的分析论证理论,即“系统性民主理论”。根据这种系统性民主理论,可以对政治系统的民主化和良性发展进行有效的理论分析与论证,用以证明监督民主是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并存的高级民主形式。

我国学者除了译介和述评约翰·基恩等人的监督民主理论外^[5],也论及中国特色的监督民主。燕继荣从公共决策流程的角度,将民主视为由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这前中后三个阶段或三个环节构成的系统和过程。其中,选举民主是选举精英人物负责制定公共政策并实施管理;协商民主是在决策过程中通过民主协商产生公共政策或为公共决策提供依据;监督民主在性质上是作为决策评价的民主,它的作用是“关注管理效果:民众对于管理者及其行为(包括公共政策)实施评价监督”^[6]。鯤水、敬言在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时指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制包含四个环节:选拔政治领导人、决策、管理(包括政策实施和民众参与)和监督。”他们认为,只有选举式民主、协商式民主和监督式民主三者有机统一,才能够完整覆盖政治体系的四个环节。他们由此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有选举式民主,又有协商式和监督式民主,本质上是一个‘三合一’的民主模式”^[7]。周淑真认为,民主形态正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展而发生深刻变化,“继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协商式民主之后,监督式民主应运而生”。监督式民主框架下,民主不再仅仅意味着选举,而是表现为各方面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8]。他们是在相关民主问题研究中涉及监督民主或者民主监督问题,而非对监督民主进行专门系统研究。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不同于西方超越式民主理论和后代议监督民主理论的中国特色的过程式、新形态民主理论的萌生。笔者认为,他们所讲的监督民主是与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相对应的第三个阶段或第三个环节,或者说是与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协商式民主相适应的新民主形态,是“系统性民主理论”的雏形。

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运用“系统生命周期理论”为我国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理论论证,并为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提供理论支撑。现代系统理论认为,每个系统都是具有生命周期的动态系统,在没有监控维护的自然状态下,系统的生命周期一般表现为构建、运行和消亡三个阶段;而在有监控维护的状态下,系统的生命周期表现为构建、运行、监护(监控维护)和更新四个阶段。政治系统的生命周期也是如此。政治系统如果没有监控维护,其生命周期表现为政治构建、政治运行和政治消亡(或消亡重建)三个阶段。因此,这种政治系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恶性的政治衰退,逃不脱盛衰历史周期率。但是,如果政治系统构建了监控维护机制,那么,政治系统的生命周期就会表现为政治构建、政治运行、政治监护(监控维护)和政治更新(政治发展)四个阶段。于是,政治系统走向良性的政治发展。

政治现代化的实践证明,政治系统走向良性政治发展与政治民主化正相关。从政治系统民主化的角度来讲,民主就是以人民为政治主体进行的政治统治或公共治理,是政治系统运行全过程的人民当家作主。在由人民主体和政权客体构成的政治系统中,民主意味着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能力,另一方面要保证政权系统的民主责任能力,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意味着民主。即政治系统的构建、运行和发展都需要符合民意,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要保证政权系统具有民主责任能力。由此,可以归纳出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这三大民主实现形式^[9]。其一,选举民主是指政治系统构建阶段即国家政权组建和公务员政治录用环节的民主政治形式。选举民主要求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公务员并组建国家政权以实现民主建政。其二,协商民主是指政治系统运行阶段即国家政权

运行和公务员施政环节的民主政治形式。国家政权建立之后，推进国家治理或国家管理的民主化，既需要公务员民主地实施决策管理，又需要人民民主地参与决策管理。公务员民主治理责任的履行与人民民主参与权利的行使相结合，形成合作协商的治理民主（或管理民主），即协商民主。因此，协商民主应该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参与等多种民主治理形式。其三，监督民主是指国家政权组建、运行和监控维护以及公务员监管等政治系统运行周期全过程的民主政治形式。监督民主不仅指位于政治构建环节的选举民主、政治运行环节的协商民主之后的政治监护（监控维护）环节的民主监督。实际上，监督民主是一种高级民主形式，它既在政治系统运行的过程环节层面与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并存，又超越统摄着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监督民主既是过程性民主，又是高级性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更新发展环节的民主化，是选举民主、协商民主以及监督民主并存的结果与表现。

在现代政治社会，政治系统走向良性的政治发展，要求政治构建、政治运行、政治监护（监控维护）和政治更新的全方位民主化。现代政治系统走向政治发展而不是陷入政治衰退，就不仅要在政权系统设计建构时实行选举民主（选举民主理论的观点），在政权系统运行使用时实行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理论的观点），在政权系统监管维护时实行监督民主（超越式民主理论和过程式民主理论的“监督民主 1.0”观点），而且应当在政权系统建构、运行和更新发展的各环节全过程地实行监督民主（系统性民主理论的“监督民主 2.0”观点），以有效地保障人民享有选举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并落实政权系统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以及民主治理等民主责任。

根据上文的分析解释，如果运用“系统生命周期理论”来分析政治系统走向良性政治发展与政治民主化，那么就可以得出全面实行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的研究结论和理论观念。这就是本文所述“系统性民主理论”以及政治系统的民主运行全过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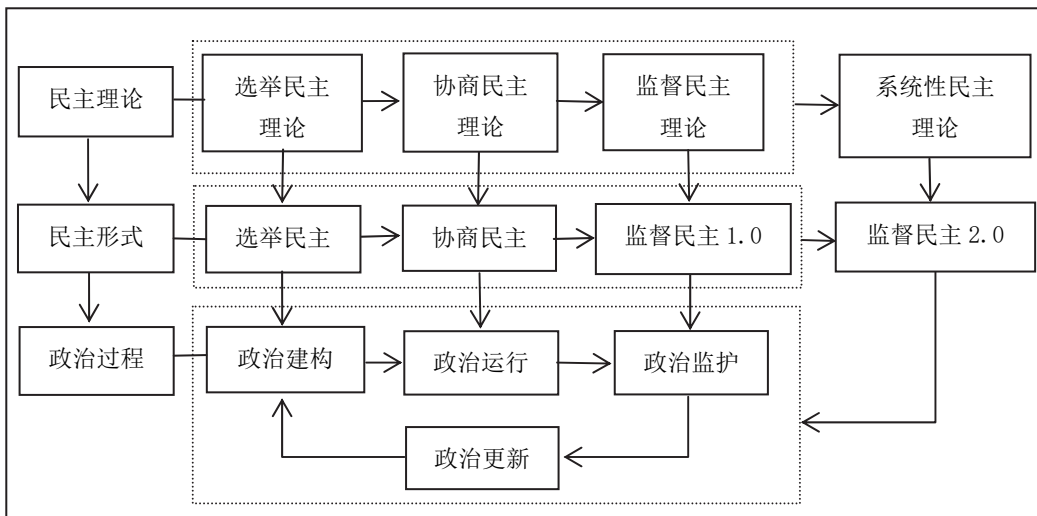


图 1 政治系统民主运行分析模型

这种系统性民主理论对政治系统民主化运行的全过程的描述，既用来分析人类政治系统民主化的历时性发展，也可用来观察我国民主政治运行的共时性实践，还可用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

民主思想以及人民监督思想。首先，从人类政治系统民主化的历时性分析角度可以发现，从古至今已经相继形成管理（治理）民主、选举民主和监督民主这三种民主形式。在古代，民主意味着人民的直接管理或治理，表现为管理（治理）民主。在近代，民主偏重于人民的间接管理或治理，表现为选举民主。在现代，管理（治理）民主已经转化为（或被优化为）协商民主。而且，现代国家特别是智能化进程中的国家，更重视人民对治理或管理以及政治系统运行的民主监督，由此催生出具有现代性的监督民主。在现代政治系统中，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应该是现代民主的三大实践形式。其次，从我国民主政治运行共时性的应然逻辑来讲，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不仅要坚持选举民主，实施协商民主，还要发展监督民主，以全面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再次，从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实践进程角度来看，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已经在我国政治体系中形成了共存发展的雏形。甚至可以说，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形成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这三大民主实践形式”^[9]。

综上所述，系统性监督民主理论作为一种分析论证理论，与前述超越式民主理论以及过程式、新形态民主理论相比，更能够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提供理论论证，为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提供理论支撑。

三、人民民主理论：人民监督政府权力的监督式民主政治形式

运用系统性民主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以及人民监督思想进行解读和研究可以发现，人民民主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人民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监督民主理论，在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民主理论。而且，马克思主义监督民主理论的核心观念可以概括为：所谓监督民主，就是让人民监督政府，由人民监督权力。

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系统构建、运行、监管和改革发展的民主化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习近平等，在不同时期都阐述了全面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发展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在我国，管理民主已经被升级为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的人民民主政治思想，并且都表达了通过人民监督政府和权力以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应该保障人民普遍选举、参与管理和监督罢免的民主权利。在民主的实现形式方面，他们在实质理念（而非概念形式）上已经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的实践原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民主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在国家政治时代，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和监督民主都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指出，所谓真正的民主制是把全体人民都包括在内的民主制，是人民民主制。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10]。这种人民民主制本质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在现实中作为“真正民主制的萌芽”，表现为巴黎公社式“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11]。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进一步指出，为了实现人民管理的这种民主制，巴黎公社采取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和监督民主等多种人民民主形式。

其一，选举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首要实现形式。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12]这种争取普选权的普选制民主的基本

内涵和要求是什么呢？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概括提出民主选举的四个要素——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马克思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会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11] 55}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实行的这种普选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13]。

其二，管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恩格斯曾经预言，人民普遍参与的“管理上的民主”，应该是民主的“更高级形式”^{[13] 179}。这种管理民主一是表现为参与民主，即人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民主。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11] 107}。这意味着巴黎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将军事、行政和政治的公职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将政治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的手中，用人民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政府机器，人民在政权运行中列席参与重大问题和方针政策的讨论决定。二是表现为自治民主，即人民的自我管理。在马克思的人民民主理论看来，人民的自我管理或自治管理是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巴黎公社的民主管理实质上可以看作工人群众的自我管理。马克思的论述还揭示出这种自治民主管理的发展趋势：如果巴黎公社这种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向前发展，它也会要求更多的地方自治和人民自治，即人民自治管理的程度会随着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其三，监督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必要实现形式。除了实行人民的选举民主和管理民主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实行的公开普遍的监督制、责任制和罢免制度，认为这种监督民主制有助于防止国家政权及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11] 96}。而且，巴黎公社的“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11]。巴黎公社实施的人民民主政治体系，通过政策制度明确宣布所有公职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公社委员和各级负责人都要经常参加选民大会、群众集会和俱乐部活动，及时向选民报告工作、接受质询，听取选民的批评建议，并随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志给予罢免撤换，以防范和监督官员。总之，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式的人民选举制、人民参与制、官员负责制、官员撤换制以及人民监督制等人民民主政治形式，既有助于实现人民民主的人民性价值，也有助于发挥规制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作用。可见，保障人民普遍享有选举权、管理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发展社会主义的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和监督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的精髓。

列宁结合苏联的实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监督民主理论，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面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发展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和监督民主的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实践中。在汲取巴黎公社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列宁在思想理论、政策制度和政治实践层面，强调并推动通过人民选举、参与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方式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权的民主监督，从而推进苏联式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实践和发展。

在论述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时，毛泽东全面阐述了发展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和监督民主的人民民主政治思想。其一，实行选举民主。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选举民主思想，即中国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政治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14]。其二，实施管理民主。毛泽东认为，民主

既是一种政治制度，又是领导人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在现实上，这种民主政治表现为民主管理、民主生活、民主作风和民主方法，其核心内容是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实施管理民主。其三，发展监督民主。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提出了“民主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经典性监督民主政治思想。当时，针对黄炎培提出的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担忧，毛泽东坚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5]毛泽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监督民主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民主思想的最早阐述和表达。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对发展人民民主以及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进行了新的阐述和强调。其一，在选举民主方面，邓小平指出，我国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民主制度，要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权利。“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16]，不能搞西方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其二，在管理民主方面，邓小平提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7]；要通过宪法依法保证人民真正享有民主管理权。其三，在监督民主方面，邓小平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17] 332}。邓小平指出，要制定规范各级干部职权范围和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的各种规章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而且，要让人民有权依法对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干部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和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和纪律处分。可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阐述了“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的监督民主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发展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人民监督权力”，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民主思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18]这就是说，全方位地实施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判断标准。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在我国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系统性民主政治思想。其核心要义是，“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18]。这意味着我国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概括起来，这就是要全面系统地发展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其一，在选举民主方面，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其二，在协商民主方面，要发展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

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保障人民依法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协商管理和民主治理。其三，在监督民主方面，要在制度体系上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19]。在实施民主监督上，要相信“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18]，“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20]。实际上，这种通过“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让人民监督权力”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民主政治思想，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民主思想。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系统论述表明，民主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在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构建、运行和发展进程中，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和监督民主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人民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其中，监督民主更是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监护保障机制和高级民主形式。因此，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既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以及人民监督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人民依法监督政府和权力的政制之道。

四、结 语

“监督民主”既不是“民主监督”在语序上的简单颠倒，也不是民主监督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简单翻版，而是相对于“选举民主”和/或“协商民主”而言的民主政治的新术语和新理论。监督民主就是人民通过各种方式监督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关的权力行为的民主政治形式。基于学理分析的视角，笔者将监督民主理论划分为西式超越式民主理论和中式系统性民主理论。超越式民主理论是以约翰·基恩为代表的对民主进行描述解释的理论，认为监督民主是继大会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后的民主新品种，是公民监督公权力行为的“后代议”民主发展的新趋势。超越式民主理论虽然超越了西式代议制民主思维，但并未超越西方民主理论和西方民主实践。在研究和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时，要对超越式民主理论采取“扬弃”的立场。系统性民主理论是一种对民主的分析论证理论，认为一个良性发展的政治系统，应该全面发展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这种系统性民主理论既可以有效地论证政治系统的民主化和良性发展，同时可以合理地解读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理论，挖掘和梳理马克思主义系统性人民民主思想和监督民主理论；还可以为新时代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政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提供有效的学理支撑。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不能照搬西方超越式民主理论。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基本理论逻辑及实践逻辑，应该是在扬弃西方超越式民主理论的基础上坚持系统性民主分析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坚持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的共同发展，全面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权利。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应该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政府和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避免陷入国家治乱的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 [1] 魏晓文, 苏杭. 国家治理视域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问题探析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5 (6): 28-33.
- [2] 张峰. 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协商式监督新定位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 (6): 112-117+163.
- [3] 刘俊祥. 经济政治学人民政治话语的建构逻辑及其现实表达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 1-11.
- [4] 约翰·基恩. 生死民主 [M]. 安雯,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7.
- [5] 郭忠华. 监督式民主: 约翰·基恩的民主新论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08-04 (7).
- [6] 燕继荣. 协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 [J]. 科学社会主义, 2006 (6): 28-31.
- [7] 鲲水, 敬言. 从常识超越选举式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探讨 [J]. 人民论坛, 2013 (3): 66-67.
- [8] 周淑真, 孙林. 在深化改革中破解民主监督难题 [J]. 中国政协理论研究, 2014 (1): 44-48.
- [9] 刘俊祥, 梅立润. 监督民主制: 中国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耗散性危害的防治机制 [J]. 学术界, 2017 (12): 56-70+324.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281.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20-121.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602.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69.
- [14]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77.
- [15] 黄炎培. 八十年来 [M].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148-149.
- [16]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40.
- [17]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22.
- [18]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9月5) [N]. 人民日报, 2014-09-06 (2).
- [19]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19-11-06 (1).
- [2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10月18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凝聚共识：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使命及其实现

蒋德海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含统一战线凝聚共识能力的现代化。应把凝聚共识纳入统一战线工作，并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轨道。凝聚共识体现统一战线的优越性。统一战线是一种凝聚共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态。统一战线凝聚共识具有包容性、权威性和正当性等特征。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理论和实践存在若干障碍。统一战线凝聚共识指向凝聚人心。凝聚人心必须和凝聚共识联系起来，把凝聚共识当成凝聚人心的前提工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将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凝聚共识的整体机制，统一战线要在剧烈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凝聚共识的新理念和新机制。

关键词：国家治理；政治形态；统一战线；共识；人心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3-0011-06

凝聚共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新要求。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凝聚人民的共识。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凝聚共识。凝聚了共识就是凝聚了人心，有了共识和人心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历久弥新。此前，凝聚共识一般被视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功能，未在统一战线作为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形态的高度得到充分审视。一些研究讨论了国家治理中共识凝聚问题。周光辉认为，在社会多元化的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寻求信念共识、制度共识和政策共识^[1]。刘建军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凝聚共识的重要论述进行了梳理^[2]。但是，相关研究尚未充分重视统一战线这一中国特色政治上层建筑和机制的凝聚共识价值。鉴于此，本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统一战线凝聚共识问题进行讨论。

DOI: 10.13946/j.cnki.jcqi.2020.03.002

作者简介：蒋德海，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引用格式：蒋德海. 凝聚共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使命及其实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3): 11-16.

一、统一战线是凝聚共识的政治形态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现代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表现在政治诉求上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价值追求、思想观点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如何让如此众多的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统一起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合力？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通过建立统一战线凝聚共识。在革命时代，统一战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凝聚共识作用。20世纪初，各种政治势力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充斥着中国大地。为了推翻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气魄，建立了统一战线，最广泛地团结各方面的政治力量，凝聚各方政治智慧和真知灼见，有效地支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3]

在建设时代，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缺失的政治智慧和举措。在当代世界，社会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的多元化不但十分自然，而且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只有一种社会价值诉求和一种政治见解。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多元并不意味着社会必然乱象丛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但要尊重多元化的价值诉求，而且要将多元化的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汇聚起来，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促进力量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力。这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价值和优越性所在。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形式和力量。

第一，统一战线凝聚共识体现包容性。凝聚共识的第一个优越性是，不排斥不同价值观点和政治见解。统一战线作为汇聚、叠加多元化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的政治形式，凝聚共识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的政治价值诉求本身就是多元化社会的一种表现，也是多元化社会的一种常态。社会生活是多元化的，人们的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自然也是多元化的。承认和包容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正是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前提。换言之，如果没有这种多样化的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异’主要是统一战线成员间在信仰上、世界观上、具体利益和要求上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别。没有‘异’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4]

第二，统一战线凝聚共识体现权威性。凝聚共识的第二个优越性是，最终成为国家治理政策和方针的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是统一的、完整的和有权威的。国家治理必须有明确统一的政策措施来吸纳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而这些措施和价值诉求都来源于共识。可见，共识是多元化的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演变成统一的国家治理措施的桥梁。凝聚共识就是这个桥梁的搭建过程。共识之所以优越，就是它不再是多元化的，而是可以直接用来指导国家治理的政策和措施，但它来源于多元化社会中纷繁复杂的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共识具有双重性，既包含了多元性，又是走向一致性的桥梁。共识是一元和多元的统一。统一战线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过程正是形成具有权威性共识的过程。

第三，统一战线凝聚共识体现正当性。凝聚共识的第三个优越性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过程是交流沟通和说理的过程，不同的价值诉求和政治主张都有表达和伸张的机会。正是在沟通、说理的过程中，那种具有更大正义性、正当性的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会产生更大的征服力量。大多数人都接受具有更大正义性和正当性的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而且这种接受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它发自

人们的内心，不需要强制和行政命令，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细致。共识就是这样“凝”成的，它是在“理”的精心呵护下逐渐汇聚形成的。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过程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民主方式，经由交流、沟通、协商等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同一目标的政治过程，表现为一种政治文明。只有具有政治智慧且通过正当程序形成并表现为政治文明的主张才能成为共识。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通过凝聚共识，团结全国各种进步力量，形成服务革命和建设的最广泛的力量。在革命年代，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力量，形成以推翻“三座大山”为目标的共识，结成最广泛最牢固的统一战线，取得了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统一战线在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国家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凝聚共识的政治功能。人民当家作主需要凝聚共识。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形成共识，成为凝聚共识的重要的政治形式。由此，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形式。在新时期和新时代，团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都需要共识。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多元化，尤其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价值诉求和理念更加多样化。这对统一战线凝聚共识提出了新要求。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推翻了旧世界，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战线仍然拥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凝聚共识建设新世界的使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5]统一战线既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法宝，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有力武器和法宝。邓小平明确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6]

统一战线如此之大的优越性，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新生活的理念和智慧。统一战线是我国新时期人民民主的要求和表现形式，凝聚共识则是人民民主的基本要求。只有实行民主，才需要凝聚共识；也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够通过凝聚共识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凝聚共识是人民事业的需要；只有人民的事业才需要凝聚共识，也只有当人民的意志凝聚为共识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统一战线正是这样一种凝聚共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态。统一战线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凝聚共识的目标，也就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可见，是不是凝聚共识，有没有凝聚共识，凝聚了多大的共识，都能够成为衡量统一战线质量的重要标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统一战线的政治性质。

因此，应当充分重视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地位。从统一战线的作用看，能否凝聚共识是统一战线能否发挥作用的生命线。统一战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凝聚全国人民的共识，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统一战线能不能凝聚共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凝聚共识，也决定了统一战线能不能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功能，决定了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从统一战线的实践效果看，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都与凝聚共识有关。统一战线工作越发展，就越能在最大程度上凝聚共识；统一战线越能够凝聚共识，自身就越巩固壮大。

二、统一战线凝聚共识存在若干障碍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相比，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聚最广泛社会共识的使命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重要。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作出了“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的论断^[6]。《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强调：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7]。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理论和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整体环境存在不足。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仍存在不利于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一些观点。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不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五种观点^[8]。一是“过时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现在强了，而且越来越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执政党，有没有共识不重要。二是“麻烦论”，认为现在党如此强大，同党外人士搞协商是自找麻烦。三是“危险论”，认为把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与非公经济人士搞统一战线是与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异己力量划等号。四是“无关论”，认为开展统战工作是统战部门的事。五是“被动论”，认为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发挥主要取决于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作为党外人士，只能被动地发挥作用。这五种观点忽略了统一战线的“统一”需要通过凝聚人心和共识实现。不凝聚人心和共识，就没有“统一”，甚至有了“统一”也会失去“统一”。这些观念的存在影响了我国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开展。针对这些错误观点，中央领导早已告诫要注意克服。如针对“麻烦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看，搞政治就要不怕麻烦，不怕麻烦才能有良政。天下哪有不麻烦的政治呢？”^{[7] 558}

第二，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价值意义未得到充分认知。其表现是把凝聚共识等同于某种方法，忽略了其价值意义。调查研究是统一战线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调查研究作为在统一战线领域广泛使用的方法，不单是为了沟通交流、了解情况，更是为了实现价值通约。统一战线的调查研究为决策提供建议，具有必要性。但是，凝聚共识不等于调查研究。凝聚共识是凝聚人心的前提，具有使命和目标的價值。调查研究是统一战线了解问题的一种方法，最终要用于实现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目标。开展什么样的调查研究，怎样使用调查研究成果，根本上取决于如何对待统一战线。只有不把统一战线仅定位于工具层面，统一战线才能发挥凝聚共识的作用。

第三，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方法有待创新发展。这主要表现为统一战线工作往往习惯于既成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新的工作方法尚有不足。这反映在凝聚共识上，老办法不能及时总结更新，新办法不能较快产生。面对社会多样化、信息技术时代来临等新情况，统一战线凝聚共识存在“本领不足”问题。相关研究就港澳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方法不足指出：“‘老办法’多、‘新办法’少。在当前，统一战线在港澳争取人心过度依赖传统的面对面联谊交友手段，过度依赖特殊利益照顾，而对互联网新兴手段不够重视、不熟悉甚至不会用，对依法争取人心谋划使用较少，工作手段方式迫切需要转型升级。”^[9]

第四，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民主法治含金量仍需提高。这与统一战线工作与全面依法治国相融合不足有关。有的统战干部和成员习惯于根据经验办事，对国家法律法规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不充分。对待不同的观点和价值诉求，统一战线工作注重加强对统战成员的政治引领。而政治引领存在如何与凝聚共识相统一的问题。应当融政治引领于凝聚共识之中，通过凝聚共识来实现政治引领，更多地通过交流、沟通和说理来进行引领。共产党人向来对马克思主义有高度的自信。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0] 政治引领应当与沟通、交流和说理相结合，通过凝聚共识进行引领，更能实现政治引领的目标。

第五，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工作存在实践困难。凝聚共识的制度机制在严格意义上应属于国家宪制性文件。但在目前，“民主党派参与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都是中共的党内文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层面，尚不是国家法制调节范围，没有形成政党协商的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11]。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是不够的。此外，即使是党内规范性文件，也往往抽象规定多，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相对缺乏。比如，把必须提交政治协商的内容规定为“重要问题”“重要事务”等，造成实施时随意性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一战线中沟通、交流、协商机制的公平性、合理性和有序性。此外，统一战线沟通交流协商成果的落实情况也对凝聚共识有影响。如果统一战线通过程序凝聚的共识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得不到尊重，就会大大影响统一战线工作，最终会影响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作用。反之，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必然会重视通过统一战线凝聚共识。

这些问题都表明，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任务和目标仍很艰巨。社会主义民主需要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也就更需要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凝聚共识创造更多更好的方法和机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同步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现代化。

三、统一战线凝聚共识指向凝聚人心

凝聚人心必须和凝聚共识联系起来，把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轨道。

第一，凝聚共识是凝聚人心的基本手段。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人、联合人，凸显了凝聚共识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12] 在民主法治时代，要善于以民主法治方式来“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能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13] 如果说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是“过河”，那么凝聚共识就是“过河”的“桥”和“船”。人心和共识相联系：共识是人心的前提，人心是共识的结果。能不能凝聚人心，前提是能不能凝聚共识。有了共识才有人心的凝聚，没有共识就没有人心。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必须重视凝聚共识的工作，而且要把凝聚共识当成凝聚人心的前提工作。

第二，凝聚共识是凝聚人心的基本标志。统一战线能否凝聚人心，凝聚人心的程度如何，都是凝聚共识成效的表现。不能够凝聚共识或者凝聚共识很勉强，也就不能够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强调，共识来源于说理和自觉自愿接受理的过程。能够成为共识的观念和价值，一定具有掌握群众和说服人的真理、理性的力量和价值。因此，凝聚共识就是用真理和理性征服人、团结人。真理和理性是

凝聚共识的基本手段和力量。真理和理性的力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强制。人们接受真理和理性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过程，甚至任何强制的力量都不能阻碍这个过程的发生。共识之所以能够凝聚而成，就因为共识具有真理和理性的品格。体现共识的事物，往往是真理、真相和规律等一系列要素的组合。正因为真理、真相和规律等一系列要素的组合，共识才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一旦为人们所掌握就会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信仰，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共同的目标奋斗。共识正是这样凝聚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就是这样一种共识。

第三，凝聚共识要采取沟通、交流和协商方式。凝聚共识是沟通、交流和协商的结果。凝聚共识的沟通、交流和协商，必须是充分的、科学的和合理的。交流、沟通存在充分、不充分的区分。交流、沟通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同见解的冲撞，是是非、对和错只有在冲撞中才能显现出来。凝聚共识的机制要保障这种辨明是非对错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要保障冲撞的结果是“理”的结晶，任何错误和不理性的东西都会在凝聚过程中被淘汰和被排斥，由此保留下来凝聚的果实——共识。协商同样如此。协商的本质仍然是交流和沟通，但更多体现的是某种政治智慧。通过交流和沟通，不同的观点和价值诉求都能够得到尊重。共识就是在交流沟通协商以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它更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虽然人们在协商中可能需要放弃一些具体利益，但却获得了更大的、更持久的共同利益。

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在剧烈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凝聚共识的新理念和新机制。正是有了共识，统一战线才能够通过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把我们的人搞得更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统一战线是一门学问，即“团结学”；是一种理论，即“力量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将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凝聚共识的整体机制。

参考文献：

- [1] 周光辉.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寻求和凝聚社会共识 [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 (5): 11-13.
- [2] 刘建军. 习近平对凝聚共识的全面论述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8 (8): 24-28.
- [3]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05-606.
- [4] 刘佳义. 论凝聚共识 [J]. 中国政协理论研究, 2019 (4): 20-21.
- [5]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39.
- [6]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03.
- [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39.
- [8] 陈喜庆. 关于科学认识和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几个问题 [N]. 人民政协报, 2019-07-10 (8).
- [9] 林华山. “一国两制”实践中统一战线争取人心问题研究 [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 (3): 34-38.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460.
- [11] 牛广明, 王学东, 赵俊华, 等. 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发挥重要作用问题研究 [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16 (5): 4-8.
-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04.
- [1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11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52.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新媒体时代的量子化生存与离散式联结

——论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统战工作创新

谢 静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奠基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与实践, 其所面对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深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媒介技术和交往方式的影响。当前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和应用,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 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联盟建构。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个体存在方式逐步从原子态向量子态转换: 量子化个体处于叠加态, 个体的存在方式与特定的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应, 群体建构兴起新的关联逻辑——离散式联结。离散式联结具有非整体性和非独立性特点。基于个人认同与群体联结方式的变革, 传统统战工作模式面临缺乏竞争力和连接力的挑战。针对当前网络统战工作中的新媒体观念表象化、工具化问题, 大统战工作格局要打破统战工作的专业化、部门化, 将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贯彻到国家治理的每一领域、每一环节、每一岗位; 在多样化的行动中建立多元化的联结形式, 尤其是针对个体、具体事件的微联结; 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 增强新联结的可见性和感染力。

关键词: 新媒体; 自我认同; 群体建构; 政治联盟; 量子化生存; 离散式联结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0) 03-0017-07

新媒体技术的发明和发展, 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媒体业结构, 也给整个社会的运作和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深刻影响, 更对建立在既有交往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形态产生极大冲击。近些年提出的“互联网+”概念, 是关于新媒体技术结构性作用的一种表述, 较为形象地体现了互联网与社会各行业、各方面的广泛关联。不过, 这样的表述对于解释互联网技术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0.03.003

作者简介: 谢静,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上海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理论研究基地专家。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沟通城市: 新媒体背景下中国城市传播状况调查和评估”(16JJD860001)

引用格式: 谢静. 新媒体时代的量子化生存与离散式联结——论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统战工作创新[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3): 17-23.

第一，它容易给人错觉，以为只要简单加上互联网工具性层面的技术就能与时俱进，而忽略互联网技术给行业生产或社会生活带来的根本变革和结构性影响。第二，以“互联网”指称当前的技术形态，虽突出了联结，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联结形式和逻辑的变化，也忽略了各种新断裂，尤其是在更为隐而不显层面的新联结与新断裂，比如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社会联结与空间机制等。事实上，随着传播技术中移动性、智能化的增强，社会变迁远非“互联”二字可以涵盖。

当前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统战工作明显体现出“+互联网”的工具性、表象性思维。一是视互联网为新兴行业，将其经营者、从业者作为一类新兴群体纳入统战工作对象的范畴，以期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二是视互联网为新兴技术工具，在既有工作领域或模式中增加新媒体技术的采纳与应用。就实质而言，二者遵循的依然是统战工作的传统思维和路径，没有将新媒体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革命纳入统战工作的思考范畴，忽视了范式创新的必要性。

奠基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与实践，面对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深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人际传播和报刊等大众传播二元并立的交往格局的影响。而当前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联盟建构。为了适应这种变革，我们需要反思传统的统战工作所依赖的深层结构。针对当前统战工作中存在的新媒体观念表象化、工具化问题，本文重点阐述新媒体技术对个人认同和群体联结方式的影响，探讨由此给统战工作带来的挑战以及应对之策。

一、从主体的原子化到量子化：自我认同的新机制

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统战工作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除了时代变化带来的某些特性差异，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人有无根本变化？当前的统战理论缺乏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反思，依然以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关于人的理解来构建工作体系，从而出现诸多与当下新媒体技术社会不相适应的认识。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人”是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个体。然而，在不同环境中，个体政治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殊异。当前的统战理论主要关注政治、经济等显在环境对个体身份建构和认同的影响，较少留意媒介与技术变迁对认知与交往的影响。然而，关于媒介技术的研究表明，认知与交往的媒介与技术变革，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主体构建与自我认同。而主体性与认同感既是人们在世生存的核心所在，也是个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根本基础。为此，本文将首先分析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主体与认同变化，探讨这种变化给统战实践带来的挑战。

当前统战理论所建基的“人”的观念，主要来自于现代性理论。现代性理论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原子式的社会。个体不是如传统社会那样，在“休戚与共”的日常交往和精神生活中组成“默认一致”的共同体，而是依靠契约抽象地联结起来^[1]，由一系列中介技术——比如货币、机器、传媒等关联团结在一起。由此，现代社会也导致了原子化主体的崛起：从共同体之中离析出来的原子式个体，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一方面，作为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主体虽然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孤立的。他们脱离了各种共同体的牵扯和约束，可以自主独立选择自己的交往对象和认同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原子化的现代主体也是完整的，在独立的躯壳中驻守着可由意识支配和控制的“自我”。

现代社会原子化主体的诞生，意味着主体的构建乃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化的过程之上。首先是主客体的二元化。在主体产生之际，客体也随之出现。作为主体的人将其所处的世界和环境对象化，

但同时自我也被他人对象化。在统战实践中，统战工作主体面对特定问题（对象/客体）而行动，但同时又被统战工作对象化。其次是时空分异，即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自我统一性主要建立在身体周遭（在场）时空统一性的基础之上，那么现代社会大量中介技术将当时、当下之外的远距空间和标准时间纳入自我认同之中，形成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对立。如果说血缘、地缘等关系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要认同方式，那么现代社会在这些认同之外，叠加了更多基于中介机制的身份认同，阶级、民族等政治身份就是中介化的不在场身份。

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原子式个体以及二元对立结构的相对稳定机制，当前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社会面临的是几乎彻底的流动性与非连续性。个体的独立与完整遭遇挑战，二元对立结构逐步消解，维持个体与社会稳定的机制本身变得不稳定。个人作为主体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从媒介技术来看，数字化正逐步改变个体的认知方式和自我认同的基础，不断消融主客体的边界，重新构造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作为人体的延伸，媒体将亲眼所见、亲身体验之外的世界带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构造出自我认同的时空结构。每一种新技术新媒体的发明和应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认同基础结构。

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体因其集中性和垄断性为人们塑造了一个相对统一、亲身体验之外的世界，各种政治身份经由大众媒体的中介而确立、强化。但是，随着社交媒体横空出世，所有人经由大众媒介一起看世界、一起感知和体认世界的一致性被瓦解。朋友圈、聊天群折射出的社会现实犹如万花筒，色彩斑斓而形态迥异。从表面看，人们经由各种媒介渠道进入同学、同乡或者兴趣“群”之中，仿佛重新回到传统的共同体状态。但是，杂多而并存的“群”实质上消解了共同体构建所需的“休戚与共”，更何况这些“群”已然嵌入各种中介化的远程时空。比如，同学群成员身在不同处却有可能讨论任何话题，不但无法休戚与共，而且常常意见各异甚至尖锐对立。同时，人们在不同的“群”里进进出出，构造出来的时空结构也只能零零碎碎，高度流动而不连续^[2-3]。如此时空机制下的主体身份认同，即使可被冠以某种名称，比如某某的领导、某某的父亲、某某的同学等，但其意义和关系形式已迥然不同，以致社交媒体“群”中的自我认同呈现出混杂而跳跃的特征。人们有时甚至陷入令自我模糊困惑的境地，产生“我是谁？我还是我吗？”的疑惑。

另外，基于新智能技术的信息推送与分发，改变着人们的认知基础和结构，塑造或改造着人的主体性。有学者就将数字技术所造就的新人称为“后人类”。其基本特点是：“主体性是突生的，而不是既定的；是分布式的，而不仅仅是锁定在意识中的；是从混乱的世界产生并且与混乱的世界结成一体的，而不是占据一种统治和操纵地位并且与世界分离的。”^[4]

与现代社会主体的原子化相区别，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主体更类似量子，与原子相对稳定、独立的存在形式不同，量子因处于“叠加态”而面临多种可能性。从量子物理学理论中，我们可以获得两点启示：

第一，量子化个体处于叠加态。量子的“叠加态”跟其特殊性质即“波粒二象性”有关。“光以波的形式传播，但以粒子的形式离开和达到。”^[5]原子也是一种粒子，但是作为粒子的量子尺度更小，正是这种尺度变化导致了活动规则的变化。在新媒体技术时代，与个体相关的信息急剧增加，人们对于自我与他人的认知与理解可以更多建立在个性化信息而非类型化信息的基础之上，而类型化信息正是现代社会区分个体身份的重要基础。正因为此，德国社会学家库克里克将数字社会称为“微粒社会”，以区别建立在平均值基础上的“粗粒社会”^[6]。更重要的是，量子不仅是一种微粒，同时是波，其光速运动能力使其可能出现在几乎任何地方。传统社会的自我统一性建立在广延空间

的统一基础上。其后，大众媒体将远距时空信息以光速传送到个体面前，但因不能与本地生活完全融合而造成时空分离，或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脱嵌”^[7]。而当前的新媒体技术不但可以瞬间传送远距时空信息，还可以凭借地理位置、定位技术等将主体更紧密地与身体所处时空进行联结。因此，个体既不是纯粹“在地”，也不会完全“脱嵌”，而是处于一种“叠加态”。个体可能既在此处又在彼处，或者既不在此处又不在彼处。“多重空间中的数字在场”特点，形成了与现代社会“我思故我在”完全不同的主体认同。哲学学者蓝江称其为“我思-数据传输-行为”的同一性^[8]。

第二，个体的存在方式与特定的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波粒二象性特质，“电子的客观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这不依赖于实际的观测。只有当我们去观测它的时候，电子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也就是说，量子的存在状况是“与观察者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5] 17}。以量子的方式去理解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个体，可以发现其存在方式与特定的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数字技术展示了个人在特定时刻所处的特定空间、关联的特定个人或群体，并由此刻画出特定的身份特性。这种状态不仅局限于在线情境，还因媒体的移动性增强而越来越与线下生活高度纠缠、互嵌。

一直以来，统战工作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体特征的认识基础之上。这种原子化个体具有较为稳定的自我认同和政治身份，而且个体的政治身份更多地与亲身交往之外的抽象他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传统的统战工作得以展开的机会空间。然而，当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个体逐步从原子态向量子态转换，自我认同和政治身份的构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并寻找统战工作的新形态与新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既有的政治身份都失效了，现实恰恰相反。由于新媒体技术可以大量、高速地传递信息，以致各种事件和纷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繁多激烈，个体在社交媒体圈、群中更容易被裹挟、牵连。这更加容易激活个体的各种政治身份，比如民族、性别、国家、城市等，并形成不同政治身份的连续流动与不断叠加，甚至产生政治身份的模糊，使传统的界定方式难以为继。传统的身份界定是静态先赋的，处于相对稳定不变的状态，可以根据人口统计学的特定指标加以确认和区别。新媒体技术时代量子化生存中的个体则处于一种叠加态，随时随处都可能激活其中一种或几种身份，而且这种身份与其静态的标签未必一致。更重要的是，很少是一种身份单独作用，往往是多种身份交叉、融合，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战线和同盟、对手。

这些现象表明，新媒体技术时代的统战工作需要根据个体认同方式的变化，梳理工作对象与工作方法；辨识处于叠加态的多重身份个体的特点，找到切合叠加多重身份的同一个个体的有效方法。

二、从组织整合到离散式联结：群体建构的新逻辑

主体的自我认同和政治身份建构，与主体间的关联方式相互影响。当下，在新媒体技术的中介作用下，人们逐步从原子式生存转向量子状态，与之相应，自我与他人的互动方式、群体的构建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现代社会以组织整合为主的团结（联结）形式越来越低效，新的关联逻辑逐渐兴起并影响传统组织机构。这种新逻辑对应的是分布式、叠加态的主体，可以被称作离散式联结。与传统组织相对封闭、稳定、持续的整合不同，离散式联结在时间和空间上断断续续，所构造的关系往往呈现碎片化、拼贴式的样貌。

组织整合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整合机制。现代科层组织以理性化为基本特征，建立在现代主体的职业化、独立性、非个人化等基础之上^[9]。周雪光将组织整合视为涂尔干所说的机械整合和有机整

合之外的第三种整合模式，即“通过严密的组织权威和制度来安排和规范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又称为组织一元化。组织整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重要的治理模式^[10]。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组织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沟通成本的重要机制。组织的稳定结构和规章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11]。媒介学将组织与特定媒体联系起来，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12]。传统组织受到面对面传播和书面传播在时间（速度）和空间（范围与距离）方面的限制，只能更多地依靠规范的传承而非指令传达。因而，传统组织主要通过相对稳定持续的观念一体化来实现大范围的整合，在地方微观治理过程中则更倾向于灵活自治，即依靠小范围的互动而非远程命令。当电报等电子媒体出现后，迅速传递跨越空间的信息成为可能，更为规范严密的现代科层组织就出现了^[13]。

然而，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信息传播迅速、便捷、灵活，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沟通成本（无限趋近于零），而且传播的线路和范围越来越难以限制在既有组织结构之中。组织整合所依赖的权威、制度和规范面临极大挑战。这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传统组织的逐步去科层化。沟通成本降低使组织中间层级作用下降；多渠道传播和多元声音出现使组织权威降低，导致去中心化；内外沟通门槛降低使组织边界不断模糊，等等。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的组织形态因此发生变化，出现“扁平化组织”“后科层组织”“网状联盟”“群”（megacommunities）^[14]等新形态。二是组织形态变化带来与传统组织完全不同的新型联结机制出现，即英国社会学者拉什所言“无组织”（disorganizations）机制。“无组织”并不意味着一团散沙，而是指被终极价值而非组织结构起来的团体^[15]。共享价值取代传统组织规范，成为联结或整合的新纽带。这与传统组织形成鲜明对照，因为韦伯式的科层组织是理性化、去价值、非人格化的。这种“无组织”的联结或整合更具集体性、更多变，“它们形成、变形又分裂，然后在别处汇聚起来”^{[15] 70}。拉什的表述或许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新形态组织形式，如虚拟社群^[16]、闪聚等，无疑都是新媒体技术兴起之后才出现的新型联结形式。

基于个体量子化，这两种组织方式的后果可以进一步解释为量子态个体之间的联结方式变化：

第一，新形式的联结越来越不具有整体性。无论是有机整合还是组织整合，甚至包括网状组织、虚拟社群等，都或多或少地隐含了一种整体性，将联结形式想象为实体。但量子状态的个体联结关系是不连续、跳跃的，难以构成整体。从空间来看，这种联结可以近在咫尺，也可以远在天涯；可以明确空间定位，也可以隐蔽地理信息。而且，不同于互联网初期的论坛等虚拟社群尚有一个相对封闭的虚拟空间，新型社交媒体上的联结分散在层层叠叠的朋友圈、聊天群等，联结纽带更为分散多样。虽然这些联结所依赖的网络线路相互连通，但从媒体界面考察，又呈现出离散状态的非连续组合。人们在各种尺度的空间游移，将各种地点拼缀、挂钩，兼有网上交流的异步性和差异化的时间节奏^[17]。社交媒体构造的联结形式与其说是具有一定整体性的网络，不如说是离散分布的闪烁光标群。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如现代民族共同体中，标准化、统一化时间是想象性关系建立的重要基础^[18]。

第二，与新媒体技术背景下联结的非整体性密切相关的是非独立性。这不仅意味着联结的边界模糊且持续变化，而且由于网络上的个体在不同的关联中往往只展露某个截面，因此这种联结是个体碎片的组合，不具有独立性。人们以各种符号、标签在社交圈群中相遇、组合，很快又分离。新联结中的个人常常没有形象、姓名、性别、年龄，有的只是标签。由此形成的联结可能只是关联某一议题或行动，难以清楚定义、追踪、观察或维护。

长期以来，统战工作的联盟构建主要采取组织整合方式，自上而下地搭建社团组织机构、协调

成员关系、动员并激励各种行动。社团组织本身相对于党政部门联结形式更为松散，需要组织严密的统战部门自上而下地引领、协调和动员以实现政治整合。随着新技术媒体的普及，大多数社团组织开始采用数字化连接方式。这些社团组织的公众号大多沿袭传统的大众媒体传播思路，采取宣讲式传播，少与成员互动，很难促进观念一体化。由其组建的社交群多是由统一特定身份的统战成员构成的封闭群组，其功能主要为发布通知、传递信息、交流工作，充当低成本的传播工具。

与前述离散式联结相对照，传统组织整合方式面临两大挑战。其一，缺乏竞争力。统一战线社团组织仍有吸引力，但当人们随手就可以在新媒体上组建一个“群”时，这些社团组织面临竞争压力。它们需要与层出不穷的新联结竞争注意力、时间和精力。除非具备有效激励和丰厚回报，否则人们投入在传统团体中的时间和精力将越来越少。离散式联结本身意味着碎片化参与，人们偶尔在传统社团组织中“闪现”，也让忠诚度和凝聚力越来越难以形成。其二，缺乏连接力。在社交媒体中，聚集成“群”往往有赖于具有足够吸引力的焦点，比如特定事件、议题等；或是多重关联的交叉、叠加，比如有的微信群可分化出无数子群，包括美食群、旅游群、时事群等。传统的统一战线社团组织往往功能单一，相互之间缺乏深入有效的交流互动。相关社团组织无法嵌入人们的日常关系，难以真正形成传播学意义上的群体（联结）。

三、统战工作的理念与制度创新

新媒体技术不只成就了新行业和企业、提供了新言论空间、制造了网络意见人士，从而给统战工作带来新的客体；更塑造了新的生存状态和工作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联盟形态，对统战工作提出理念和制度创新的迫切需要。由新媒体技术推动改变的自我认同和群体建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身份认同、交往关系和联结形态，这些基础性要素的变化影响了传统统战工作框架的效能。“大统战”察觉到了新时代统战工作面临的新环境，但组织机制和工作方式需要创新发展。

第一，针对自我认同机制变化，大统战工作格局要真正打破统战工作的专业化、部门化，将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贯穿到国家治理的每一领域、每一环节、每一岗位。传统的统战工作建立在明确而具体的个体身份基础之上，围绕相对固定的行业或群体展开工作。当个体更多地以量子态呈现时，这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区分的意义变小。虽然人们仍然在新媒体交往中以各种身份出现，但是这些身份越来越退化为流动的标签。在频繁变动的新媒体语境中，这些标签的“符号效能”^[19]下降，在不同场景中的意义滑动厉害，降低了原初的政治价值。统战工作如果单纯强化特定的政治身份，在新媒体时代将可能进一步消耗身份的固有价值。要打破以主体/客体进行分工的组织结构，将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主题覆盖到国家全部治理环节。这种新的组织结构方式正是新媒体环境下科层组织改革的重点方向，“网络化治理”^[20]、“无缝隙政府”^[21]等概念即是这种趋势的体现。

第二，针对群体建构方式变化，大统战工作格局应在多样化的行动中建立多元化的联结形式，尤其是针对个体、具体事件的微联结，加强渗透力和嵌入性。传统统战工作方法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面临挑战，需要更好应对人们的量子化生存和离散式联结。大统战工作格局将职责分解到不同部门和环节，意味着针对不同问题和情境需要不同的联结与认同方式。尤其要注意避免仅以自我为中心，要尽可能以“共情”“移情”“代入”的方式，深入渗透到具体场景，建立具有高度嵌入性的联结形式。比如，以“事件性”“过程性”来界定网络人士，从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去识别把握统

战工作对象，这是对新模式的一种探索。

第三，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增强新联结的可见性和感染力。首先，提高可见性。这既指利用网络痕迹识别各类主体和群体，也指创造可见的方式促进新联结。传统身份识别所依据的人口统计学指标仍然是“粗颗粒”的，而数字技术为我们识别更具个性特征的“微粒人”提供条件，也创造了事先行为管理和控制未来的新方法^[6] 122-123。大统战工作格局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技术优势。其次，提高感染力。提高联结的可见性与增强感染力相关，要以更加多样的方式促进人们的集结和凝聚。移情是一种方式，充分运用多媒体也是有用的技巧。新媒体传播技巧应当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者的基本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 [1]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 谢静. 微信新闻: 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 (4): 10-28+126.
- [3] 孙玮. 微信, 中国人的“在世存有” [J]. 学术月刊, 2015 (12): 5-18.
- [4] 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M]. 刘宇清,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394.
- [5] 约翰·格里宾. 薛定谔的小猫 [M]. 张广才,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5: 6.
- [6] 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 微粒社会 [M]. 黄昆, 夏柯,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 [7]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8] 蓝江. 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通信技术变革的哲学效应 [J]. 探索与争鸣, 2019 (9): 37-40.
- [9] 马克思·韦伯. 经济与社会: 第2卷(上) [M]. 闫克文, 译. 上海: 世纪传播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10] 周雪光.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以科举制为线索 [J]. 社会, 2019 (2): 1-30.
- [11] 肯尼斯·阿罗. 组织的极限 [M]. 万谦,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 [12]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引论 [M]. 刘文玲,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 [13] 小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 看得见的手: 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M]. 重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14] 雷金纳德·范李, 马克·盖伦切尔, 费尔南多·纳波利塔诺, 等. 群: 凝聚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力量的新模式 [M]. 时娜,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0.
- [15] 斯各特·拉什. 信息批判 [M]. 杨德睿,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68.
- [16] 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M]. London: MIT Press, 1993.
- [17] 谢静. 时空之流: 移动新媒体的城市尺度 [J]. 探索与争鸣, 2018 (10): 128-135+144.
- [1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吴叻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9] 朱迪·迪恩. 传播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局限 [J]. 李玥阳, 译. 全球传媒学刊, 2015 (2): 54-64.
- [20]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 威廉·D. 埃格斯. 网络化治理: 公共部门的新形态 [M]. 孙迎春,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21] 拉塞尔·M·林登. 无缝隙政府: 公共部门再造指南 [M]. 汪大海, 吴群芳,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龚静阳

内外联动： 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中的 2019 年香港暴乱

曾向红 张峻溯

（兰州大学 中亚研究所/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2019 年 6 月以来，我国香港地区以“反修例”为幌子的暴乱活动迅速极端化，对国家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构成巨大挑战。将 2019 年香港暴乱置于更广阔的视界中，可以发现此次暴乱是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中香港内部因素和境外干涉势力内外联动的结果。就内部因素而言，香港暴乱分子通过运用香港社会中发达的资金网络、组织网络、舆论网络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并千方百计将这些社会网络提供的资源转化为煽动暴乱的实际行动。暴乱分子借助的部分社会网络具有双重性，它们一方面扎根于香港本地社会，另一方面又与境外干涉势力互为策应。而在境外干涉势力中，西方有关国家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英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最为显著。它们通过资金支持、议程设置、话语塑造等方式肆意干预香港事务，极力推动香港社会问题的政治化与国际化，企图以此牵制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努力。2019 年香港暴乱具有非常浓郁的“颜色革命”色彩。在话语上，暴乱分子在借鉴“阿拉伯之春”中的“变革”框架和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系列“占领”运动中“占领”框架的同时，在结合香港社会特征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既有抗议框架的暴力转型。2019 年香港暴乱中动员框架的暴力特征，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抗议浪潮并导致对西方社会的“反噬”。

关键词：香港暴乱；内外联动；抗议浪潮；社会网络；资源动员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3-0024-21

2010 年年底以来，西亚、北非地区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和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爆发的系列“占领”运动，构成全球范围内新一轮抗议浪潮^①。受境外干涉势力和香港特区内部社会矛盾政治化

DOI：10.13946/j.cnki.jcqi.2020.03.004

作者简介：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峻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颜色革命’的发生、扩散与应对研究”（19BGJ051）

引用格式：曾向红，张峻溯. 内外联动：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中的 2019 年香港暴乱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3）：24-44.

^① 本文中的“抗议”一词是社会运动研究中对政治与社会动员现象的中性描述。香港“修例风波”处于此轮抗议浪潮中，但是所谓的“反修例抗议”实质上是祸港、乱港的暴乱，远超出抗议的范畴。后文将会对香港暴乱的性质进行详细的说明。

等因素的影响，2019 年香港地区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违法暴乱活动。2019 年 9 月 3 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在国新办举办的发布会上指出，现在香港一些激进分子身上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颜色革命”的特征，他们的目的是瘫痪特区政府，夺取特区的管治权，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当前这场风波的走向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少数暴徒及其幕后黑手的操纵下，当前事态已经完全变质^[1]。2019 年 11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习近平指出，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2]。这场带有“颜色革命”特点的暴乱继承了“阿拉伯之春”和系列“占领”运动的诸多特征，并结合香港社会自身特点实现了框架的转型。本文从梳理解释香港社会不稳定的既有框架出发，采用内外联动的视角解释 2019 年香港暴乱的发生。笔者认为，2019 年香港暴乱的发生是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的大环境下内部因素和境外干涉联动的结果；香港社会的政治化趋势和大众传媒对“社会—政治”联系渠道的替代是香港暴乱的内部根源，境外干涉是香港暴乱扩大化的重要推手。

一、问题提出与现有解释

（一）问题提出

2019 年 6 月，以反对修改《逃犯条例》为导火线的“修例风波”在香港迅速蔓延，并迅速演变一场乱港、祸港的暴乱。暴乱分子不但以极暴的方式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公然践踏香港法治；更有甚者在暴力游行示威过程中围堵、冲击香港中联办大楼，污损国徽，藐视中央权威，甚至鼓吹“港独”，提出所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挑战国家尊严和“一国两制”原则底线。这一场由香港反对派挑起的、被香港社会激进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利用的“修例风波”，最终演变成破坏香港法治与社会安定、危害国家安全的暴乱。2019 年发生在香港的暴乱显示，境外势力在香港的活动及其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已经对香港特区的繁荣稳定和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挑战。

现有成果对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动机、方式、路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仍有不足。长期以来，国内对香港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香港产业转型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3-5]、香港内部政治运作^[6-9]和“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10-12]等方面；国外对香港的研究兴趣则在于香港选举、港人政治倾向和香港社会发展的人口学、社会学调查^[13-14]。目前，相关文献对境外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研究比较少。即便有相关研究，大多只是将研究聚焦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等某一方面境外势力在香港的活动并评析其影响^[15-19]。这些研究未就境外干涉势力介入香港事务的手段和途径进行详细的梳理和阐释，也没有分析在出现重大社会危机时香港内部矛盾和境外干涉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联动机制。

（二）现有解释

针对近年来“香港社会为何变得不稳定”的问题，国内外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

1. “社会容纳政治”机制的衰落

“社会容纳政治”这一概念由香港研究学者刘兆佳在 1982 年首先提出，用于解释港英时期香港社会维持稳定的原因。“社会容纳政治”机制是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上存在的各

种资源网络使社会成员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从而使成员的社会资源需求很少被政治化,社会有能力吸纳一些可能被政治化的问题^[20]。刘兆佳认为,这种建立在经济发展、社会资源丰富基础上的“去政治化”机制,使得港英时期的香港并未像其他英属殖民地那样爆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社会抗争甚至革命。这种“去政治化”机制非常依赖经济的高度繁荣,“如果出现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而政府又拿不出措施予以纾缓,它肯定会陷入政治麻烦的漩涡”^{[20] 17}。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后,香港经济发展的势头放缓;上海、深圳等内地城市崛起也影响着香港在中国整体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香港的经济增长动力出现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社会不稳定反过来影响经济施政和经济发展^[21]。

2. “局部民主化”弊端显现

“局部民主化”^①在本文主要指港英当局为了实现“光荣撤退”而在殖民后期对港人适度、有限地开放政治领域的行为。香港的“局部民主化”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港英当局预料到香港最终会回归中国,为了能在香港官僚体制中留下亲英分子、事先安设干预回归后香港事务的“入口”,蓄意在香港范围内开启政制改革。港英当局主导的政制改革的核心为“民主化”,但这不是给予港人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充分的民主权利,更多地是将基层精英选举出来,形成民意代表,组成区议会,缓解民众集中在政府较高层级的压力,将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疏导至较易控制的地区层面事务。区议会形成初期,其主要职能仅仅是咨询,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但是,随着政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区议会职能和组成部分不断变化,逐渐被赋予了管理地区事务的权力,特别是政制改革后期压力团体的加入导致了区议会中成员间派系的分化。对香港特区政府来说,区议会变成一个更难驾驭、更喧嚣吵闹、更不愿妥协的政治组织^{[20] 100}。

“局部民主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香港立法局的“民主改革”上。1987年,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仅两年后,港英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发表了《代议制发展检讨绿皮书》,提出1988年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的意见。1991年,香港立法局选举引入直选机制;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再次推出“政改方案”,提出立法会的全部议席均由普选产生。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就是要把香港立法局发展成为一个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使其具备所谓有效的代表市民所需的独立性,拥有明确而独立的管理自己事务的职权,能够发展本身的委员会架构,能够通过对港督的质询、听取港督对出访和重要事务的汇报等方式监督港督,从而使香港的政制由行政主导向立法主导转变^[22]。彭定康的“政改”与《基本法》中确立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相悖。这在政制问题上进一步分裂了香港社会,造就了如今香港立法会派系争斗、立法会决议“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香港社会政治乱局。

3. 现有解释的不足与反思

无论是“社会容纳政治”机制还是“局部民主化”,在解释香港社会动荡的原因时,其观察视角都是香港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内部政治制度。从内部因素分析香港的社会政治发展,能让我们充分了解香港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但是,以内部视角研究香港社会的不足在于,忽视了香港社会建构和政制改革过程中的非本地因素,将香港社会政治的变迁过分归因于香港内部因素,割裂

^① “局部民主化”的概念由刘兆佳教授首创,用于描述回归后香港的政治模式。笔者认为,香港“局部民主化”的起源不是回归后,而是在殖民后期港英当局就已经单方面开始设置,如“立法局改革”、区议会的设立等;回归后香港政治模式只是被迫接受“局部民主化”的现状。

了香港殖民地时期和回归后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港英当局在香港回归前 15 年就开启了香港“局部民主化”的“潘多拉魔盒”，其主要目的是在香港回归后通过培植本土反对派力量制约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总之，香港社会与政制改革的推动力基本源自外部环境，且与殖民统治逐渐完结及主权转移关系紧扣^{[20] 158}。在现阶段探讨香港政治社会的发展与现状时，我们不能忽视外部势力在香港的作用，且应该将内外部因素结合，在内外联动的视角下研究发生在香港的动荡与冲突。

二、香港暴乱发生的内部因素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其内部社会关系主要由于自身的原因发生了深刻变化，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香港社会关系及矛盾日趋复杂化。回归后，香港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与香港市民的需求不匹配，香港特区政府管治能力与香港社会治理要求不匹配。这两大主要矛盾的相互交织构成香港社会复杂的内部环境。一方面，香港经济发展势头下降，难以继续提供原有的诸多社会资源，殖民地时期形成的“社会容纳政治”机制由于缺少雄厚经济资源基础而走向衰落；另一方面，香港“局部民主化”是港英当局的单方面行为，而非从香港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发，其弊端日益凸显，成为香港社会发展中的薄弱部分。

（一）“政治化”成为香港社会的发展趋势

港英时期的香港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外向型经济随着运输科技的发展而逐渐繁荣，最终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的高度繁荣吸引着来自内地的人员输入。他们追求财富且常常表现出一种疏远政治的社会倾向。内地人员的输入使香港的华人社会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的香港华人社会信奉“功利家庭主义”，即将家庭的利益放在社会利益之上，把提高自身家庭利益作为第一要务，较少关注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功利家庭主义”的驱使下，香港华人群体渴望通过香港自由的社会环境获取财富，往往疏远政治议题。香港华人群体的这种政治心态是“社会容纳政治”机制得以在香港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相对于香港华人群体，港英当局控制着香港的政治权力，倾向于利用政治权力中“法律”和“秩序”的能力，为香港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所需的社会服务和市政服务。总的来说，港英当局希望尽可能不介入经济和社会事务。香港华人群体的政治心态、诉求与港英当局的管治在政治策略和社会政策方面有所契合，从而实现了香港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彼此独立，但又保持着最低限度的整合^{[20] 45-50}。

随着香港社会政治的持续变迁，其中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这使得维持香港社会稳定的“社会容纳政治”机制出现了问题。政治上，香港主权移交的日期越来越近，香港社会普遍对于 1997 年之后的香港何去何从感到困惑和不安，加上港英当局的“反共”宣传以及香港华人社会与生俱来的“避难心理”^[23]，港人对政治议题的关注在这一时期大幅上升。经济上，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虽然香港经济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并未大幅波动，但经济结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实现经济转型成为香港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2003 年非典疫情使得香港经济下滑、失业率增高。香港内部势力与境外势力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歪曲与炒作使得港人的不安瞬间达到了极点，社会中弥漫着挫折感和疏离感。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后，香港高端实体经济和现代工业基础薄弱的弊端更加突出：房地产垄断加剧，社会流动困难，香港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社会愈加呈现出高度关注民生问题、政治问题关注度上升并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特点。收入增长的放缓和生活压力的增加，使香

港居民对现实的不满增加，部分香港居民在反对派的煽动和歪曲下，将对现实的不满带入现实生活，成为反对派所谓的“主流”^[24]。

（二）香港大众传媒与“社会—政治”联系渠道

随着社会中挫折感和疏离感的增长，香港社会政治关注度逐渐上升。这意味着港人对政治参与的诉求在这一阶段显著上升，小部分中产阶级的个人和组织要求扩大公众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并认为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这更多是为了宣泄丧失信心的情绪，而非政治上有野心、有组织的社会动员^{[20] 45}。这造成了三种严重后果：第一，港人的政治热情迅速增长，突破了原有“社会容纳政治”机制可以承受的范围，原有机制逐渐失效；第二，要求参政的港人对政治的了解不充分，是完完全全的“政治素人”，不知道如何利用政治手段解决民众的实际诉求；第三，作为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控者——香港特区政府对于如何分配政治权力以满足群众需求并无有效方案 and 对策，只能按照“局部民主化”的思路加以应对。回归前港英当局设计的“局部民主化”存在显著弊端，其中不仅掺杂着英国势力，还包含了社会中众多的压力团体。这些受资本和外部势力操纵的政治角色在解决香港社会内部问题时嘈杂且低效，甚至对香港特区政府形成掣肘。

在“局部民主化”的政制改革思路下，“直接的民主选举”被宣传成最为有效的“社会—政治”沟通渠道。但是香港市民不是在真空中参与选举，当他们在竞选宣传中做出决定时，其实无时无刻不沉浸于大众传媒中。大众传媒以新闻媒体为主体，其手段与路径囊括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方面。由于香港社会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政党，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党的作用，成为港人代议选举的主要渠道。由于香港地区的政治派别与媒体存在某种共生性，“政党媒体化”与“媒体政治化”成为香港社会的显著特点^[2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传媒由于资金问题而依附于许多大金主与财团，这一点在香港也不例外。《明报》《信报》等纸质传媒集团在回归前后陆续被香港本地商业资本购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者也开始并购香港媒体集团，进入香港大众传媒领域。目前，香港大众传媒领域已经被香港本地房地产资本和境外资本牢牢掌控。这些媒体以市场为导向，向公众发布多元化的社会资讯，影响着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会政治领域。

大众传媒能够通过舆论引导、建立和巩固信仰、社会暗示及教育实现社会控制功能^[26]。在不完善的选举政治下，港人的政治判断与政治知识大多来源于大众传媒，尤其是香港的现代新闻媒体。因此，香港媒体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强势的角色，能够影响甚至操纵香港居民的政治认知。这意味着像“东方报业集团”（Oriental Press）和“壹传媒”（Next Media）这样控制香港八成纸媒的产业垄断者，有能力将政治动机、机构网络和媒体影响力相连接，以满足其商业利益^[27]。在商业资本利益的驱使下，香港一些大众传媒不完全以“客观真实”为自己的价值导向，而是把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作为运营的准则。面对香港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或政治事件，这些传媒集团的立场和观点不一定真实和准确。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香港大众传媒的政治作用更为突出：亲“泛民”的媒体在网络上积极发声，号称维护公民利益，但其中不乏激进分子和“勇武派”，他们恰恰是破坏香港民主与法治的元凶。与此相反，来自香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的声音较弱，原因在于媒体报道的偏见以及支持“一国两制”的香港政治人物大多是对互联网不太了解的年长者。

随着香港青年一代进入社会，部分香港青年通过使用社交媒体了解和关心香港政治发展，但现

实生活频繁上演的政治争拗蔓延至网络空间，导致理性思维和情绪化表达的冲突，合理的意见表达在非理性的言语攻击之下难以实现^[28]。最终，“泛民”的声音占据了香港媒体中政治领域的主流，对香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的政策大肆批评，并引导青年以“泛民”的价值观审视“一国两制”与香港社会存在的矛盾，这就不可避免地政府现行政策产生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香港青年一代将大众传媒当作主要的政治参与渠道而不是辅助工具，这导致大众传媒的控制性功能被过分放大，甚至能够操纵部分港人的政治行为，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原有“社会容纳政治”机制逐渐失灵、新的“社会—政治”联系渠道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由于香港发达的大众传媒以及青年一代对媒体政治替代性的认可，大众传媒成为实际的“社会—政治”联系渠道的替代品。另一方面，香港资本主义体制下新闻业资本的逐利性，不可避免地会诱发资本操控媒体从而控制新闻舆论的现象。境外势力和香港反对派同样非常容易利用大众传媒操纵港人的政治行为，反对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将社会矛盾通过香港大众传媒转化为香港青年过激的政治行为并煽动民众与政府的对立，从而造成事实上的社会矛盾政治化。同时，香港的大众传媒具有民间性、社会性，能够将单纯的政治议题引向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群体。对于香港社会而言，政治正在延伸到民间社会的更广泛边界，发展出涵盖广泛的做法，包括公开讨论、志愿协会、非正式网络和社会运动^[29]。这种“开放”的政治边界和过分社会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为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提供了事实上的便利。

（三）香港社团组织

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港英当局推行的“社会容纳政治”机制使香港社会领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开发。通过社会中众多互助性的社团组织，港人无需过多依赖政府就能满足自身生活和工作上的需求。对于香港人来说，社会组织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殖民地时期，港英当局利用华人精英及其社团组织，让他们为华人社会提供种种服务，补政府之不足，亦利用这些组织和服务发挥“社会控制”的作用^[30]。随着香港社会领域的不断发展，经济的繁荣促使社会中不同群体产生明显分化，社团组织的功能也从互助的性质转变为代表某一群体的利益诉求。由于港英当局的统治性质，这些社团组织无法进一步“政治化”从而转变为政党，而是继续以“社会化”的形式存在于香港社会之中。

回归前后，香港本地知识分子的崛起使香港社团转变为一定数量的“政团”，成为社会中民众就关切的问题与政府进行交涉的主体。这一时期，末代港督彭定康推行“政改方案”，将香港社会中对港英当局的压力疏导到社会领域，并在政权内部开放一定的参政机会。“政改”机会使得包括“政团”在内的香港社会内部的社会组织先后组建“政党”并希望进入政权内部。港英当局为了控制政权内部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势必不会将重大政治议题的决策权交由港人。为了让“政改”后的港英当局仍能按照英国的意愿继续运行，港英当局在社团组织中努力培植亲英势力，并使他们以“官守议员”的身份进入“立法局”。在此情形下，以时任“布政司司长”陈方安生为代表的一批“亲英派”被港英当局安排进政府，成为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中亲英“泛民”势力的前身。经过港英当局对香港社会中社团组织的分化和重组，一大批“反建制”的社团组织在香港回归前后短暂的几年内迅速成长起来，为日后香港社会内部“建制派”和“泛民派”的紧张关系埋下了伏笔。

可见，香港在殖民时期形成发达的社会领域，其中众多社团组织成为与港人利益密切相关的行

为体。随着香港社会阶层的分化，一些社团组织演变成为某一阶层或团体发声的社会压力团体。鉴于港英当局曾经刻意培植社会领域中亲英的社团组织，这些基于亲英社团所形成的社会压力团体成为香港社会中社会政治领域的薄弱部分。它们虽然代表了特定港人群体的利益和诉求，但同时成为境外干涉势力介入香港内部矛盾的工具。在香港暴乱中，以“民主党”“公民党”“职工盟”“教师协会”为代表的香港政治社团，成为“泛民派”组织暴乱游行、反对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主体。这些深度活动在香港社会、政治、教育等领域的社团组织利用开放的社会环境与西方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为了一己私利将香港局势推向险境。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香港社会中不少社团组织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反华媒体相配合，企图借助外部力量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三、香港暴乱中的境外干涉

在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境外干涉主要指影响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外部行为。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对主权国家进行干扰、侵蚀、威胁和颠覆，从而破坏国家安全状态、削弱国家安全能力^[31]。境外干涉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军事干涉和非军事干涉。军事干涉主要是运用武装力量，如美军对叙利亚动武，介入叙利亚内部冲突。非军事干涉主要是运用经济、政治、舆论等非军事手段，借助不同类型的组织网络对主权国家进行干扰、侵蚀、威胁和颠覆，“颜色革命”是非军事干涉的典型做法。香港暴乱产生的境外因素主要包括境外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由于中国具有完备的国防武装力量且威慑可信性高，这些国际和地区行为体对香港暴乱所采取的干涉行为主要集中在非军事干涉领域。

（一）境外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一般是指不被视为政府部门一部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及其他法人。非政府组织一般具有民间性、自治性、非营利性等特点，其关注和活动所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主要集中在环保、人权、民主、消除贫困等方面。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资金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因此，非政府组织虽然名为“独立且中立”的“第三部门”，但极易成为某一特定团体或财团的利益代言人。在资本至上的西方社会，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殖民时期香港“自由港”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聚集之地。这些非政府组织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以“观察选举”“学术交流”“社会调查”等为由头，向香港社会各领域乃至内地进行渗透甚至开展间谍活动。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西方许多以“社会调查”“人权保障”为活动目标的在港非政府组织分支，“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反华势力乱港、祸港的前哨阵地，充当美英等国干涉香港事务、破坏“一国两制”的“白手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大赦国际”等西方非政府组织或提供资金支持，或发布所谓的“观察报告”，公然发表支持暴乱分子和“港独”的言论，诋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抹黑“一国两制”。

直接的资金资助和发布虚假“涉港报告”操纵国际舆论，是境外非政府组织介入香港暴乱的主要方式。在众多西方非政府组织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涉港资金资助的核心组织。2016年至2019年四年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港均有直接的资金投入，总额高达2 359 364美元。投入的数额在2019年达到顶峰642 933美元，占近四年总额的27.25%。这些资金大多流向了“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等组织，通过这些“功

能性组织”在香港社会开展渗透活动。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港活动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为例，它在香港主要支持“职工盟”，对外宣称旨在增强香港劳工的组织和团结能力、扩大工人的权利与民主，实则鼓动“职工盟”下属工会对抗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命令，开展罢工活动。

与“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直接向香港本地社团组织拨款不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在香港的渗透更加隐蔽。“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作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另一大主要受赠者，其涉港资金主要用于香港政党间磋商、香港民意调查以及为选民提供选举指南。香港大学“民意研究所”正是“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一手资助并提供技术支持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表面上声称将这些资金投入香港非政府组织倡导、专家学者研讨会以及香港公民自由倡导等方面。实际上，“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以这些资金为基础，支持香港社会有关调查机构以“金钱问卷”方式调查所谓“民意”，形成虚假的民意调查报告向社会公布，并且以向香港选民提供选举指南的方式干涉香港本地选举。

此外，向香港本地社团组织渗透是“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在香港的另一种主要运作模式，意图用资金控制的方法将香港本地社团组织发展成听其操控的“傀儡”。“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还伙同“国际共和研究所”联手炮制“欧洲民主青年网络”。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均来自于已被策动“颜色革命”的中东欧等国，并在暴乱未止的香港刻意挑选香港本地青年前往受训，以期他们在“公民领域”发挥作用^[32]。

香港暴乱中的资金除了来自于境外非政府组织，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西方国家的私人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就是资助香港暴乱的背后“金主”之一。自 1993 年成立以来，“索罗斯基金会”在世界各个国家均有活动的踪迹。“索罗斯基金会”及其分支机构大肆在所在国输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多个国家“街头政治”乃至“颜色革命”的爆发均与之有关。2015 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俄罗斯被禁，被指对俄罗斯宪法构成威胁。2017 年，“索罗斯基金会”在土耳其被停止运营，埃尔多安指责索罗斯试图分裂土耳其。该基金会表面上以构建“开放社会”为行动目标，实际上运用巨大的金融资本，以资本运作的手段扶植反对派，使其成为“民主化”和“私有化”理念的践行者，从而通过“做空”的形式将他国数十年发展成果洗劫一空。亚洲金融危机时，索罗斯在香港惨遭失败。但是 2004 年以来，“索罗斯基金会”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再次进入香港。香港大学及其他学术、调研机构成为“索罗斯基金会”重点渗透的对象。根据 DC Leaks 披露的关于“索罗斯基金会”的内部资料，“索罗斯基金会”2015 年以来一直活跃于香港大学“港独”分子戴耀廷任职的法律学院，并设立专门的“公民领袖计划”“人权奖学金”等奖项^[33]。在香港街头鼓动示威者袭击警察的“洋教官”布莱恩·克恩（Brian Kern），曾在香港多个学校开展名为“人权”的选修课，在课上妖魔化中国中央政府并大肆宣扬所谓的“开放社会”，其资金同样出自“索罗斯基金会”。可见，香港发生的“街头政治”和带有“颜色革命”特征的暴乱与“索罗斯基金会”在香港的渗透存在密切关联。“索罗斯基金会”不仅为香港的反政府暴乱活动提供资金，更为暴徒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以“大赦国际”“自由之家”为代表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在香港暴乱发生后发布了一系列“涉港报告”。这些“涉港报告”的立足点均为西方视角下的民主与人权，极力鼓动香港民众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完全对立，把所谓“真人权”作为博取国际社会关注的虚假噱头，大肆渲染暴乱分子对抗

香港特区政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涉港报告”甚至与西方媒体和“港独”媒体相结合，将报告中的所谓“建议”通过舆论加工扩大为暴乱活动的口号和诉求。2019年8月1日，“自由之家”发布了题为“香港的民主危机：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的报告，妄称“美国国会应立即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随后，“港独”媒体大肆炒作“镇压关头，（美国）与港同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标识与美国国旗也迅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香港发生暴乱期间，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涉港报告”俨然成为暴乱分子行动的指南。这也说明发生在香港的“修例风波”已经掺杂了境外势力的因素。这一场看似“无领导”的暴乱，出现了以境外非政府组织为操纵者的、具体的“领导者”。

这些“涉港报告”更将香港社会问题的矛头直指中国中央政府，将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与表态曲解为“北京对香港的红线”，将香港所出现的暴乱归因于“一国两制”；并在报告中丑化“一国两制”以及内地的法律制度，以此渲染所谓的“香港危机”。在无良媒体的报道和夸大下，这些报告不断在示威人群和香港普通民众中扩散，引起香港社会的极度恐慌。“涉港报告”以曲解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大政方针为靶子，借“民主”“人权”之名，对香港特首、特区政府乃至中国中央政府进行恶意的造谣与抹黑。他们的目的在于人为地扩大矛盾，以“涉港报告”作为舆论基础，企图完全割裂港人与香港特区政府、港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信任，煽动香港民众与政府的对立甚至冲突。

境外非政府组织和西方金融资本大鳄所控制的基金会在香港暴乱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些境外势力已经通过策动东欧、北非的“颜色革命”总结出了一系列操纵社会运动并为其利益服务的手段与方法。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他们通过资金援助、舆论造势等途径，对香港教育界进行渗透、强力灌输西方民主价值观，以资金援助的方式勾结香港社会中存在的反政府团体势力，以发布“涉港报告”“提出政策建议”的方式为反对派发起的暴乱设置共同的“抗争议题”；在抹黑、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的同时，将香港反对派塑造成“民主”“自由”“人权”的代言人，以博取香港社会中不明真相民众的同情。在境外资本的介入下，香港的商业媒体几乎都沦为反对派的舆论工具，社会中充斥着大量关于香港特区政府和警队的“假新闻”。境外资本介入而产生的巨大社会舆论压力将民众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归因于香港特区政府，导致其公信力受到冲击。同时，社会中弥漫着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使香港民众与香港特区政府无法得到有效沟通，最终通过极端暴力活动宣泄出来。可见，境外势力在香港社会中营造的舆论网络使香港社会面临暴乱的严重威胁。

（二）外国政府

1. 美国政府

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美国政府及其国内一些政客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公然为香港激进势力和暴乱分子撑腰打气，在香港暴乱复杂化、扩大化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行政当局及国会主要通过国会立法、外交及国际舆论两个方面干涉香港事务。一方面，在香港暴乱发生后，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强推所谓“2019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将“二十三条立法”、香港政改进程等一些根本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纳入美国政府的政策反应体系中；以国内商业出口限制的方式企图干涉香港警方正常的执法行为，为暴乱分子撑腰打气；以“香港自由”为借口，形成针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及经济制裁名单^[34]，企图以此向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施压。另一方面，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先后邀请李柱铭、李卓人、黄之锋、何韵诗等乱港头目窜访美国，出席所谓“听证会”。他们在会上歪曲香港暴乱事实，大肆诋毁“一国两制”和香港特区政府。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成为美国介入修订《逃犯条例》这一具体香港事务的重要推手和执行者。2019 年 2 月开始，针对香港特区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频繁在媒体上发表干涉言论，公开反对香港特区政府、诋毁“一国两制”。香港暴乱升级后，新上任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史墨客立即与政治部主管朱莉·埃德会见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并进行了长时间密谈。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暴乱发生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积极联络、培育香港反对派力量，以期对抗“建制派”和中国中央政府，甚至对“港独”分子采取间接支持的态度。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高度关注香港反对派的政策表态和内部的势力分配。香港反对派多名议员被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列为所谓的“重点保护对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活跃于香港法律、教育、青年等领域。向香港青年进行利益输送和价值观洗脑，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最重要的途径之一。非法“占中”的骨干、“港独”组织“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都是美国重点培育的对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甚至安排香港激进青年赴美参加所谓“民主活动”，与反对派议员会面，共谋推动所谓“香港民主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在其盟友国家间引起了非常恶劣的示范作用。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反华势力在美国政府之后极力鼓吹效仿立法，妄称对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国务院港澳办的相关官员进行制裁。2019 年 12 月 3 日，意大利国会通过所谓决议，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调查香港警队“滥用暴力”，并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对禁止黄之锋等人赴意做出“解释”。欧盟则在此之后呼吁成员国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形式积极立法，旨在对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赴欧人员进行所谓“人权审查”。

美国政府还怂恿台湾民进党当局介入香港暴乱中，企图营造“港独”与“台独”合流的趋势。一方面，民进党当局涉港政策完全配合美国的需要，在美国对港干涉行动上亦步亦趋；另一方面，香港暴乱正值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民进党当局在美国的授意下有意制造“港台联动”，协助蔡英文连选连任。2019 年 6 月 9 日，蔡英文在社交平台发表意见称“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还将“台湾撑香港，我们守台湾”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蔡英文借助香港暴乱为自己竞选造势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面对由香港逃窜到台湾的暴乱分子，民进党当局竟称其为“来自香港的朋友”，甚至为香港暴乱募集物资、筹集资金。“民进党在期望、鼓动香港激进势力走向更为极端、暴力的近乎恐怖主义路线，制造更大的流血事件，借此，民进党当局就可火中取栗地制造‘台湾拒绝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民进党就没有一国两制’的舆论，在岛内的统‘独’斗争中占据高地。”^[35]2019 年 9 月 3 日，“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立法会议员朱凯迪等乱港分子高调窜访台湾，请求民进党当局对暴乱活动提供支持。港台有关势力谋求“独立”的非法活动和政党派别之间的串连扩大，相互撑腰打气的态势持续发展^[36]。

2. 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作为香港社会矛盾国际化、政治化——所谓“香港问题”^①——的另一重要推手，在暴

^① 香港主权归属非常明确，本不存在所谓“香港问题”。至于香港社会发展中的部分矛盾，在任何一个国家均属于正常现象，只涉及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治理事务，根本不足以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然而，西方有关国家刻意提出所谓“香港问题”，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推进香港社会矛盾的国际化、政治化，模糊人们的视野。

乱发生后企图继续在香港显示存在。英国政府及其国内政客在香港暴乱问题上表态不清，甚至对暴乱分子的行为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2019年8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通话，对香港局势表示所谓“严正关切”。在这次“通话”中，英国政府表达“谴责双方使用暴力”的话语，实质是以所谓“公正”为香港暴徒开脱，将香港警队正义执法与暴徒的违法犯罪行为混为一谈，企图以此向香港特区政府施压。此外，英国政府在所谓“香港问题”上继续玩弄文字技巧，利用《中英联合声明》大做文章。在香港暴乱期间所发布的“2019年1月至6月香港半年报告”中，英国政府表达了对“香港重大政治进程”^[37]的所谓关注，假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包含“香港民族党”被取缔一事大肆渲染，声称“香港的自治地位应该继续被维持”。在这份“香港半年报告”中，英国政府错误依据《中英联合声明》，站在“香港事务监督者”的角度对香港事务大加指责，无视香港暴徒破坏香港法治的非法行径，以“支持和平的权利和合法的抗议”为幌子，暗中为香港暴乱分子撑腰打气。《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已经完全履行完毕的历史文件，在香港回归后它就已完成历史使命。《中英联合声明》虽然提到了“一国两制”，但这是中国政府单方面的政策宣誓。中国政府承诺“一国两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五十年不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而不是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回归后仍具有效力。

四、暴乱发生：内外因素联动的结果

殖民地时期“社会容纳政治”机制偏向于将政治问题引向社会领域，香港呈现出社会领域过度开发而政治领域过度未开发的现象^{[20] 17}。“局部民主化”的政改思路又在香港造成了事实上的“大社会、小政府”状况，政府能力受到制度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香港社会中存在着丰富的社会网络，但缺少政府层面对诸多社会网络的有效管理。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内部“泛民”势力和激进分子依靠丰富、发达、超越国界的社会网络企图在香港建立所谓“公民社会”，并以“永远的反对派”自居。他们以社会网络为基础，勾连香港政界、商界、宗教界中与政府相左的组织和团体，通过煽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以“社会动员”形式将不满情绪与“民主化”诉求相互关联，从而转化为香港社会的政治运动。“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社会运动领导者在将抗议者、潜在支持者的怨恨、不满等情绪转化为街头抗议活动过程中所能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组织基础、集体协调、金钱、社会网络、网络技术等^[38]。在香港暴乱中，境内外乱港势力运用的社会网络资源动员手段主要涉及资金、组织、舆论三个方面。

（一）香港暴乱中的社会网络

资金网络是勾连香港境内外乱港势力的最主要途径。在香港，资金网络的运作通过香港本地社团组织实现，大量资金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以项目调研、“人权资助”的名义流入香港本地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港分支机构，通过它们为暴乱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这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将资金以“合法”名目转移至香港境内，而后采取“调研”“资助”“奖学金”等形式为参加暴乱活动的人员特别是缺少经济来源的香港青年学生提供支持。它们甚至将暴乱中的违法活动明码标价，以此鼓励示威者更加激进地挑战政

府权威。为了便于收受来自香港境内外的暴乱资金，香港反对派专门成立了“612 人道支援基金会”。该组织的财报显示，香港暴乱期间乱港分子黎智英控股的“壹传媒”公司以“苹果日报”的名义先后向“612 人道支援基金会”捐款近 165 万港币。截至 2020 年 3 月，该基金会已经累计为香港暴乱游行及相关违法示威活动筹集资金近 1.1 亿港元。这些资金既用来为暴乱活动购置帐篷、雨伞、口罩等物资，同时用作暴乱分子逃避香港法律处罚的保释金。

来源于资金网络的大笔“政治黑金”是 2019 年香港暴乱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物质基础，甚至成为香港内部反对派势力和境外干涉势力勾结的纽带。以“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索罗斯基金会”为代表的境外资本势力通过资助的方式在香港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交易模式”，表面上以资助名义促进香港社会领域的发展，但是在暗中以资本控制的形式将香港本地的社团组织发展成听其操控的“傀儡”；并大肆宣扬所谓“公民社会”理念，企图以资本商业运作的模式培育一批“唯金钱是从”的乱港组织及其人士。这些乱港组织依托境外组织提供的“政治黑金”，勾结香港社会内部的激进势力，企图将香港社会完全变成受资本支配的“法外之地”。

组织网络是香港暴乱活动得以维持的关键。2019 年的香港暴乱虽然显示出“缺乏领导者”的特征，但实际上仍有幕后黑手通过组织网络对暴乱活动进行操纵。香港暴乱分子的手机上几乎都有一个名为“LIHKG”的社交软件，这个软件能够在线进行匿名的、加密的讨论和即时通讯。暴乱分子在这些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进行着持续的资源动员和策略讨论；传统的政治团体和它们的领导人在这场运动中被边缘化，仅仅起到了支持暴乱活动的作用。“612 人道支援基金会”伙同香港有关教会成为暴乱动员的核心。一方面，“612 人道支援基金会”在暴乱的组织中发挥“指挥”和“后勤保障”作用。该基金会向暴乱分子提供所谓的“法律支援”“医疗支援”“心理支援”“紧急经济支援”，运用背后复杂的资源网络为香港暴乱及暴乱分子提供行动便利。另一方面，香港有关教会极力煽动神职人员和信众加入示威人群进行非法集会，甚至借机扩大宗教势力活动范围，暗中筹组“守望香港祈祷会”和“香港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企图在为香港暴乱活动募集资金、招募人员的同时，向香港社会更深处进行渗透。香港基督教会下属的诸多社团组织，如“香港基督徒学生运动”“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葵涌基督徒基层团体”等还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主要参与团体。在香港，基督教会深度介入香港本地的政治运动中。

香港暴乱中的组织网络显示出机动灵活、组织迅速的特点。这与非法“占中”中香港反对派采取的“占领策略”大为不同。这种组织模式的特点被香港反对派称为“水策略”（be water）。依靠网络新媒体技术，香港反对派的诸头目无需出现在暴乱现场，就能对相关人群进行远程操控。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专门的社交软件，企图在暴乱过程中基于灵活的组织方式使暴乱分子能够实现暴徒和普通市民这两种身份的快速转换，以便他们能够像“水”一样混迹于香港各个街道并在统一的时间一起行动；试图以“多点开花”的“水策略”逃避香港警方的追捕。这种“水策略”甚至与 2014 年非法“占中”的“占领策略”完全相反：暴乱分子不追求长时间的聚集，而是以快速且极端的方式向政府示威。暴乱分子的行踪也因此变得更加隐蔽，这从心理上怂恿示威者做出更加激进的行为。逐渐地，人群中了解、使用“水策略”的群体越来越多，游行示威行为愈加激进。此外，这种基于互联网的组织动员还被反对派群体衍生出诸多暴乱活动组织形式，如“快闪”“人链”等。香港暴徒可以随机出现在任何一个街区进行暴力示威，待警察赶到后，又能迅速消失在普通人群中。

在香港反对派倡导的“水策略”下，示威人群不再遵循一个固定的路线或聚集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们开始融入社会人群之中，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形成针对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的“斗争”共识；通过网上发布的信息，根据距离远近和自身的诉求对暴乱活动进行选择性的参加。香港暴乱中灵活的组织策略和组织网络动员了一大批对社会心怀不满的人士，借助“反修例”报复政府和社会。加上黑色口罩和面具的遮挡，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香港反对派组织网络的动员下，起初仅仅为了“反修例”而组建的游行队伍混杂了众多激进分子和香港本地“勇武派”青年。他们通过组织网络加入示威游行之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以“反修例”为自身的诉求，更多的是以“奖金”为目的而参加暴乱并借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可见，暴乱中的组织网络容纳了香港社会中各种反政府的激进势力。

舆论网络是香港暴乱中又一重要的动员路径。由于香港青年一代对媒体政治替代性的认可，来源于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对香港青年群体的影响和控制力极强。香港暴乱发生后，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相关消息被香港青年群体无视。与此相反，来源于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假消息”在香港青年中流传甚广，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612人道支援基金会”为代表的一批乱港组织纷纷建立媒体平台，把它们作为动员香港青年群体的“舆论武器”。在香港暴乱期间，这些媒体平台不仅发布游行示威活动消息，还大量转发来源于“港独”媒体和境外媒体抹黑香港特区政府、歪曲事实的“假消息”，以此博取点击量和曝光度，其关注量在短时间内甚至突破了百万。Facebook、在线论坛等网络社交媒体成为香港青年群体走上街头参加暴乱的最主要消息来源。香港反对派还利用以“壹传媒”“苹果日报”为代表的“港独”媒体，伙同境外反华媒体无视暴乱活动给香港经济社会带来的严重损害，大肆抹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鼓噪境外势力提出的所谓“香港危机”。在这种反对派“舆论高压”的氛围中，香港主流媒体的声音逐渐被淹没，反对派的激进发声充斥着香港的互联网空间，香港普通市民无法分辨消息真假，甚至将真假消息颠倒，最终沦为反对派舆论操控下的工具。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参加香港暴乱的人数和规模。香港境内外的无良媒体还极力通过新闻舆论鼓动示威者进行所谓“揽炒”，将港人的社会诉求与政治诉求相挂钩，谋求社会问题“政治化”，企图引诱香港民众将香港社会问题的矛头指向“一国两制”和中国中央政府。

香港一些大众传媒在舆论网络中扮演了极坏的角色。这些以“客观”“中立”自我标榜的传媒机构无视香港暴乱给香港社会和香港普通居民带来的灾难，一边倒地接受西方“民主”“人权”的政治话语，企图以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为香港暴乱开脱。通过舆论网络，这些传媒机构向香港普通民众特别是香港青年学生群体强力灌输“民主原教旨主义”。它们不谈香港经济结构中因为资本垄断而产生的深层次问题，而将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社会问题的凸显归结于香港现行的政治制度，大肆鼓吹“民主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途径”。在暴乱分子活动引起香港社会一部分人反对的时候，这些新闻媒体又通过“人肉曝光”这样极度违反新闻业职业公德的方式，企图将香港正义之士置于暴徒言语的合力围攻之下，通过舆论手段在香港社会维持一种“黄色恐怖”的氛围。

（二）暴乱动员网络中的枢纽组织

社会网络中的各种资源需要依靠一些实体组织才能发挥动员作用。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香港民间人权阵线”“612人道支援基金会”和香港有关教会等发挥了支持、组织的枢纽作用。

“612人道支援基金会”和香港有关教会利用香港社会中的资金网络为暴乱提供巨额资金和大量

物资援助。作为暴乱活动的枢纽组织之一，“612 人道支援基金会”由“港独”分子陈日君、吴靄仪、许宝强、何秀兰、何韵诗作为资金信托人而成立，旨在取代 2019 年 6 月 16 日临时成立的“反送中受伤被捕者人道支援基金”，宣称“为反送中运动中受伤、被捕或有关人士，提供人道支援，包括医疗、心理/精神，法律及其他有关援助”。在该基金会开展“援助”的同时，大批来源不明的资金流入其银行账户。该基金会与“壹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香港基督教会联系紧密。一方面，以捐赠的名义从“苹果日报”将境外政治黑金“洗白”后注入基金会账户。另一方面，“612 人道支援基金会”与香港基督教会形成“612 基金+教牧+社工-被捕支援-保释金外借、医疗/验伤、情绪支援服务”一整套针对暴乱分子逃避香港警方追责的手段和程序，连贯性和组织性十分紧密。为了确保“612 人道支援基金会”所购买的暴乱物资不被香港警方查封，该基金会暗中组织暴乱分子与香港基督教会勾结，将散布于全港 18 个区的基督教堂和宗教聚会场所等宗教设施当作暴乱物资的储存地和补给站。这样既确保了物资的分散性，又借用“宗教财产”的幌子使暴乱物资免于香港警方的搜查。这种分散的暴乱物资储备为香港反对派在行动中贯彻“水策略”提供了完备的条件。2019 年 6 月 12 日“金钟暴动”后，大批暴乱分子将物资运送至“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位于港仔的“香港堂”，“香港堂”俨然成为暴乱物资站。

与基金会公开向社会募集资金和物资的方式不同，香港有关教会则利用众多信众对“枢机主教”的崇拜和信任作为筹集暴乱资金的主要手段。以前任“香港教区大枢机”陈日君为代表的“乱港牧师”，以虚假的宗教仪式为幌子，在礼拜日大肆动员信众们捐款捐物，并声称“为香港自由民主的福音而祈祷”。香港有关教会还借机发起“守望香港祈祷会”，以虚假的神学话语愚弄信众，将众多信仰虔诚但不谙世事的教徒纳入暴乱活动的动员体系之中。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是香港“反修例”游行的主要发起组织，也是香港暴乱中组织网络的核心。自 2019 年 3 月以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先后筹组和发起了 7 次大型的反政府游行，累计参与总人数超过 400 万。“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包含了香港社会中支持“泛民”势力的社会、政治乃至宗教团体，这些原本分散的组织通过其网络而联系在一起。这些群体在平时并不接受“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领导，更多的是将其当作“抗议”表演的工具，企图就共同的目标利益，采用“抱团”的方式向政府施压。在香港暴乱中，香港反对派利用“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庞大的组织平台将香港社会内部的激进势力整合为一个整体，通过设置共同的目标将游行的规模逐渐扩大，将发生在香港的游行活动从最初“反修例”的游行逐步演变到后来实现所谓“五大诉求”的示威游行。香港反对派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为工具操弄社会议题，将原本具体的社会层面的“修例”问题矛盾逐步转化为更加泛化的政治问题矛盾。通过将议题“泛化”和“政治化”的方式，他们企图将发生在香港的大规模游行当作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这种从具体的社会问题引申为泛化的政治问题、只谈“民主人权”不谈社会稳定和百姓民生的组织动员手段，与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手段如出一辙。从组织动员的角度看，香港反对派利用“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进行暴乱活动的组织动员已经具备了“颜色革命”的特征，与西方势力的干涉脱不了干系。

在香港大规模示威游行转变为暴乱后，“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组织者不分是非曲直甘当暴力活动的保护伞。“612 人道支援基金会”公布的所谓“合作网络”中，“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赫然在列。它在“612 人道支援基金会”活动网络中的主要角色是对暴乱分子实行所谓的“被捕救援”，也就是

阻碍香港警方对暴乱分子的执法行动，将普通民众作为暴乱分子与警方对峙的工具。除此以外，“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伙同“星火支援同盟”“香港人权监察”等行迹恶劣的乱港组织，将暴乱活动借“和平示威”之名加以美化，甚至在西方媒体面前将暴乱之中的香港称为所谓“中国民主法治的桥头堡”。在“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组织动员下，香港反对派操纵示威游行、包庇纵容暴乱分子，以“颜色革命”的手段使游行示威向着更加“政治化”、激进化的方向发展，最终使香港局势滑向暴乱的深渊。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612人道支援基金会”和香港有关教会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平台企图在香港暴乱罗织一整套完整的“舆论网络”，借此向香港市民兜售他们的“政治理念”，并希望借助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向香港特区政府施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利用“香港记者协会”和“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向暴乱分子分发记者证，甚至将一些所谓的“外国记者”纳入暴乱行动中，企图充当逃避警方追捕的挡箭牌。这些假记者在暴乱过程中阻挠警方执法并拍摄扭曲事实的照片，随后在互联网中利用“港独”自媒体大肆报道抹黑警队和政府的“假新闻”。铺天盖地的“假新闻”掩盖了香港主流媒体的报道，众多香港青年特别是香港高校学生缺乏鉴别信息真假的能力，接受这些“港独”自媒体所提供的残缺不全的信息，形成了对香港警队“妖魔化”的刻板印象。在香港反对派的舆论操控下，针对警队和政府的暴力行为愈加严重，甚至突破法治底线，对包括立法会和中联办大楼在内的政府设施进行冲击、围堵。在反对派的舆论高压下，“违法达义”的暴乱理念很快成为他们的共识。

香港有关教会以“礼拜”的名义将大批信众动员加入暴乱人群中，而后借助国外媒体向西方社会宣扬基督教徒在香港暴乱中显示出“勇敢的立场”，以西方社会对基督教天然的好感为自己参与暴乱的行为进行辩护。香港基督教会信众中宣扬“教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将宗教集会的权利凌驾于香港警察和政府的执法权与管治权之上，并以此为借口组成大规模的基督徒游行队伍，深度参与暴乱活动。宗教非政府组织“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还在暴乱中鼓动信众充当“监视者”，以宗教人士的身份为香港暴徒标记警察位置，为暴乱分子的行动提供便利。经过香港有关教会基于所谓“宗教信仰”的舆论动员，香港暴乱中不少人受所谓“宗教信仰”的驱使参加示威活动。在暴乱活动经过宗教话语的粉饰后，他们认为“这既是礼拜，也是抗议”。香港基督教会下属的“香港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还在互联网上开设名为“localprayers”的网站，表面上宣扬基督教信仰理念，实则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非法集会信息，并为暴徒提供相互交流的“即时讯息室”。这些“即时讯息室”多被冠以“心理治疗疏导”等“美名”，实际上以此为幌子对暴乱中的示威者进行在线心理催眠，将他们心中的恐惧和矛盾焦点引导至政府，使他们成为暴乱行动的“后备军”。

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香港反对派非常注重运用香港社会中发达的舆论网络。以新闻媒体为主体的有关大众传媒和宗教组织成为舆论网络发挥作用的关键部分。以网络自媒体和境外媒体为基础的“港独”新闻媒体将暴乱活动美化，并以假新闻的方式引导、利用香港社会中青年群体的愤怒与不满，以“反修例”为幌子将香港社会问题复杂化，并将反对的矛头直指香港特区政府和“一国两制”，企图运用“舆论高压”的手段将整个香港社会笼罩在暴乱的环境下，从而实现“民主化”的诉求。以香港有关教会为幕后主导的宗教势力以所谓“宗教信仰”为幌子，通过宗教系统内传教的方式影响信众的行为，以举行宗教仪式为由头支持和参加暴乱活动。香港一些基督教组织甚至将“心理疏导”当作舆论控制的工具，鼓动教徒把继续参加更为激进的暴乱活动作为缓解心理情绪的途径。

香港基督教会香港社会的势力和影响力向来很大。截至 2019 年，香港基督徒有 88.9 万人，约占香港总人口的 10%；各种类型的教会小学、中学约 520 所，占香港中小学总数的 50%以上^①。在此基础上经过新闻媒体的加工和渲染，所谓“信仰虔诚”和“实现香港的民主化”成为舆论网络中继续进行暴乱活动的代名词。在舆论宣传中，香港反对派将香港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于“非民主”，将“实现民主化”作为香港抵达“彼岸理想世界”的唯一路径；企图将“香港民主”神圣化，借助舆论压力使其成为每一名游行示威者心中“美好的愿望”。香港反对派将自身政治诉求与宗教话语相结合，就是为了在基督教盛行的香港社会实现对人群长期的、持久的舆论控制。

（三）小结

在 2019 年香港暴乱中，暴乱分子运用香港社会中发达的资金网络、组织网络、舆论网络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借助暴乱活动中的枢纽组织将这些社会网络所提供的资源实体化，并转化为支持暴乱的实际行动。这些社会网络既扎根于香港本地社会，又与境外干涉势力互为策应。境外干涉势力利用这些资源网络向香港社会中的乱港组织提供大量援助，甚至通过“政策报告”等形式妄图在香港施展“回旋镖效应”。最终，香港社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通过社会网络与境外干涉势力相互勾结，又通过舆论工具等手段推动香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转变为港人激进的政治行为，香港暴乱由此产生。

在香港暴乱中，境外干涉势力借助香港社会中的资金网络向香港暴乱分子提供大批资金援助，将“政治黑金”作为勾结香港社会中激进势力和反政府团体的纽带。此后，香港暴乱分子又以社会网络为抓手，运用组织、舆论的分支网络将境外干涉势力提供的资金资源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和影响力；借助宗教、网络自媒体等手段宣扬西方所谓“民主化”诉求，企图构造香港社会对暴乱活动有利的“舆论高压”，对香港游行示威人群实现舆论控制，进而将香港暴乱活动长期化。

境外干涉势力借助发达且不受香港特区政府有效管治的社会网络向香港内部进行深度渗透，香港内部的反对派和激进势力则利用社会网络从外部获取充足的资源和支持，对香港青年群体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香港内外部的乱港势力通过社会网络形成了联动。

五、香港暴乱动员框架的继承与转型

以香港发达的社会网络为依托，内外部因素联动下的 2019 年香港暴乱与香港之前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大为不同。相比于 2014 年的非法“占中”，2019 年香港暴乱中示威者的行为更加激进、资源动员能力更强、影响的范围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这场暴乱可能成为香港历史和世界范围内极具标志性的事件。鉴于此，在明晰香港暴乱发生因素的基础上，本部分将香港暴乱中出现的组织动员特点与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下的“主框架”进行对比，明确香港内外联动的暴乱动员框架的继承与转型特点及趋势。这有利于为我们解决香港暴乱问题提供思考方向。

2010 年以来，国际社会进入新一轮抗议浪潮，以中东地区相关国家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和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发生的“占领”运动为主要代表的社会抗议运动成为这一轮浪潮的主流。国内外学界对这两波主要抗议运动的研究得出两方面结论。其一，“占领”运动受到了来自“阿拉伯之春”的直接影响。其二，这一轮抗议浪潮按照社会运动的“主框架”角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

^① 数据来源：香港天主教会教区档案、香港教会网页和香港民政事务局网页。

是以“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变革”框架；二是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占领”框架^[39]。基于这两种框架的联系与差别，笔者将其总结如下（表 1）^[39-41]：

表 1 “变革”框架与“占领”框架对比

维度	“变革”框架	“占领”框架
组织领导	无明确的领导组织，只要反对政府就可以加入进来	虽无明确的领导组织，但有清晰的发起者
抗议动员	建构抗议者的集体身份	“全球文化网络”
话语体系	西方媒体的包装	象征政治的技巧
诉求焦点	变革现有政治体制，实现政权更迭	对社会体制进行调整，不谋求政变
策略选择	“非暴力”	“非暴力”
矛盾根源	“民主化”	社会问题
扩散方式	西方势力干涉	社会自发

随着“阿拉伯之春”和“占领”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类似的社会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在此浪潮下，香港同样未能幸免。2014 年 9 月，香港爆发非法“占中”，大批示威者在香港中环等街区进行“占领”行动，堵塞交通干道，企图通过施压使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接受示威者的要求。这场持续 79 天的非法“占中”具有明显的“占领”框架的特征。从非法“占中”背后的组织领导方式看，它有以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为核心的发起者，这些发起者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非法“占中”所采取的组织手段、策略选择和矛盾根源都与“占领”框架相符合，但其不同点在于非法“占中”的诉求焦点在于当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而不是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进行变革。这就使得在“占领”框架的基础上，香港反对派又对发生在香港的“占领”套上了“政治化”的外衣，使非法“占中”的诉求焦点向“变革”框架转变。从“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所产生的系列社会运动的结果来看，“占领”框架下的系列社会运动大多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虽然两个框架具有相似性，但二者在动员能力上具有很大差别^[39]。以香港非法“占中”为例，在非法“占中”进行的后期，原本“非暴力”的策略选择出现了明显激进化的趋势，这激起了香港社会中许多人的反对，特别是“违法达义”的方式引起人群的争议。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占领”中后期出现许多所谓“领导者”，他们基于自身利益不断争夺话语权，这场非法集会最终走向瓦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抗议浪潮中“占领”框架逐渐式微。

在香港，非法“占中”也走向终结。但是，这场非法集会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香港反对派就此停止活动。2019 年香港暴乱的发生，说明在经历了非法“占中”失败后，香港反对派并没有善罢甘休，反而在香港社会中继续进行着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动员，香港社会运动的框架也因此逐渐发生改变。基于上文对香港暴乱发生的内外部因素的分析，下文将对 2019 年香港暴乱的动员框架进行解构。从香港反对派所利用的内外部因素来看，香港暴乱既继承了“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中的部分因素，又将其与香港本地社会的特征相结合，并在香港暴乱的组织过程中实现了框架的转型。

在组织领导方面，对于“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中无领导的特点，香港暴乱无疑对其进行了继承，大批暴乱分子相聚于街头，队伍中没有出现明确的领导者。与“占领”框架下非法“占中”不同的是，2019 年香港暴乱甚至没有出现清晰的发起者。黄之锋等乱港头目虽然支持示威人群走上

街头，但没有像非法“占中”的戴耀廷等人那样，对暴乱活动设置具体的议程和斗争策略。香港暴乱中的组织网络更多地是基于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络，这种更加开放的组织网络使暴乱人群中的任何一员都可能成为暴乱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甚至能对暴乱议题进行自身所偏好的设置。这就导致香港原本以“反修例”为诉求的社会运动很容易演化成无组织、无秩序的暴乱。

在抗议动员方面，2019 年香港暴乱继承了“变革”变革框架中“建构抗议者集体身份”的做法。香港反对派通过设置抗议口号的方式将暴乱队伍中的“和理非派”与“勇武派”捆绑在一起，通过营造一种“不割席”的氛围，企图弱化不同群体对手段的异议，增强暴乱人群对诉求焦点的共识。在这种“集体身份”之中，主张暴力的群体与主张非暴力的群体因为诉求的相似性而实现合流，从而使暴乱队伍难以分化。无疑，香港反对派对非法“占中”进行了“经验总结”，将“长期维持稳定的运动规模”作为暴乱动员的首要目标。因此，2019 年香港暴乱至今仍然未见非法示威者群体内部的显著分化。

在话语体系方面，2019 年香港暴乱更加依赖运用新闻媒体进行话语建构。这是由香港社会大众传媒极其发达的特点所决定。作为港人心目中事实认可的“社会—政治”联系渠道，香港大众传媒深刻影响着港人的政治行为。香港反对派将暴乱中的话语经媒体的包装后置于所谓的“民主”“人权”之下，这种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话语体系在舆论层面掩盖了香港暴乱祸港、乱港的实质。这既吸引了香港社会内部的青年群体，又在国际舞台上博得西方社会的支持，从而为香港暴乱争取了最大程度的境内外资源。香港境内传统的大众传媒及网络等新媒体在商业利益和外部资金介入的情况下，几乎全部偏向香港反对派。以“壹传媒”“苹果日报”为代表的“港独”媒体不但借此在市场中扩大占有量，更作为香港反对派舆论宣传的工具，极力煽动群众对立情绪，鼓噪暴乱舆论。

在策略选择方面，2019 年香港暴乱模糊了暴力与非暴力的边界。本次香港暴乱中的非法示威者不将“非暴力”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反而将对警察使用武力看作是合理合法的，“违法达义”的口号再次出现在人群之中。在暴乱分子使用暴力手段的同时，一些“颜色革命”的手段也出现在香港暴乱中。香港暴乱分子打“港独”旗、唱“港独”歌，对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香港市民纵火烧身，破坏港铁等市政基础设施，占领香港国际机场，曝光香港警察私人信息并对其进行恐吓，鼓动“816 全民提款日”等。这一系列行为表明，暴乱分子的行为深受西方“颜色革命”理论中关于“非暴力行动方法”的影响和指导。

在矛盾根源方面，2019 年香港暴乱极力把社会问题政治化。相比于“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2019 年香港暴乱所体现出的策略选择及其矛盾根源有着本质的不同。在 2019 年香港暴乱中，反对派将社会问题作为香港暴乱动员的潜在因素。反对派并没有把社会问题方面的诉求作为暴乱的诉求口号。但是，参加暴乱的成员往往是深受香港社会问题影响的学生、失业者和青年群体，他们长期因为香港社会中高房价、低收入、固化的社会阶层而产生失落、沮丧的心理，甚至产生了对政府的怨恨。在潜在动员因素的推动下，香港社会中的不满逐渐积累，“反修例”成为导火索。

在扩散方式方面，2019 年香港暴乱是“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中相关因素的结合体。香港暴乱中既有境外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等干涉势力的非法介入，也有香港反对派基于香港本地社会的动员。经过新闻媒体的煽动，大批香港民众被舆论绑架而走上了街头。境内外势力通过香港社会中的资金、组织、舆论网络实现了香港暴乱框架下诸因素的联动。

综上所述，香港反对派运用内外部网络在 2019 年香港暴乱中继承了“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中的部分因素，并将其与香港本地发达的社会网络相结合，从而实现了暴乱动员框架的转型(表 2)。

表 2 香港暴乱动员框架的继承与转型

维度	特征	关系
组织领导	无领导和开放的组织网络	继承、转型
暴乱动员	建构暴乱人群的集体身份	继承
话语体系	大众传媒及网络新媒体	转型
诉求焦点	进一步“民主化”	转型
策略选择	暴力与非暴力合流	转型
矛盾根源	表面因素：“民主化” 潜在因素：社会矛盾	继承、转型
扩散方式	境外干涉与社会内部动员	继承、转型

在 2019 年香港暴乱中，继承与转型后的新框架显示出了一定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在“大社会、小政府”的香港政治生态中，新框架下暴力与非暴力合流、开放的组织网络、网络新媒体等因素相互综合的效果明显超过“占领”框架。这样一种新框架刺激了世界其他地方抗议示威活动的转型。2019 年香港暴乱发生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出现的暴乱、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地铁示威都显示出和香港暴乱相似的特点：组织网络更加开放，示威者遮挡面部，持续暴力行为，等等。这些事例表明，在西方国家的操纵下，香港反对派构建的新框架已经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扩散效应。开放的组织网络、社会问题的潜在动员能力、暴力与非暴力界限的模糊，可能将给社会矛盾丛生但政府难以作为的西方社会带来严重危机，甚至将进一步加深西方社会的分裂。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有关国家深度设计和推动而形成的这种新暴乱动员框架终将可能产生“引火烧身”的后果。

六、结 语

2019 年香港暴乱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在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的大环境下，香港社会政治化和外部势力介入干涉的结果。通过分析香港暴乱发生的内外部原因，本文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其一，研究“香港问题”应该采取内外因素联动的视角，将香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统筹分析。殖民地时期的特殊历史导致了香港社会掺杂众多的外部势力。以内部视角分析香港社会能明确香港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但要想解释“香港问题”发展演变的过程并最终解决“香港问题”，我们必须把外部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内。采取一种“降维”的内部因素分析方法能明确香港社会的内部矛盾，采取一种“升维”的外部因素分析方法能厘清香港社会发展演变的具体脉络。只有站在内外联动的角度，才能以较为全面的视角解释当前香港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

其二，香港社会的政治化趋势和大众传媒对“社会—政治”联系渠道的替代是香港暴乱的内部根源，境外干涉是香港暴乱扩大化的推手。香港社会发达的舆论网络既给普通民众以宣泄渠道，又给反对派势力以政治动员的舆论资源。香港反对派利用大众传媒将政治问题扩展到更深层次的社会领域，并影响香港青年群体的政治行为。受资本控制的大众传媒将社会矛盾政治化，为香港暴乱准备了充分的基础。境外干涉势力利用、推动香港社会的政治化趋势，运用舆论手段将香港“民主”

“人权”等话语与香港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相挂钩，企图将香港社会拖入“西方民主政治的陷阱”。

其三，香港暴乱所处的国际大背景是“阿拉伯之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本文通过借鉴先前对“阿拉伯之春”和系列“占领”运动之间关联的研究结果，发现香港暴乱中出现的暴乱动员框架实现了对此前“变革”和“占领”两种框架的继承与转型。鉴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美国纽约发生的类似暴力行动的案例，内外联动的暴乱动员框架或将刺激新一轮世界范围内的抗议浪潮。

其四，瓦解香港暴乱动员框架的关键在于加强对香港社会网络的治理。作为内外因素联动的纽带，香港社会网络在 2019 年香港暴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要有效维护香港的社会秩序，必须加强对香港社会网络的治理。首先，可以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等形式规范香港社会网络，不能使香港社会网络成为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渊藪”。其次，民生问题始终是影响香港社会运行的关键议题。香港稳定的抓手在于改善香港经济结构、保民生、促就业，至于香港反对派鼓吹的“民主化”不是现阶段解决香港既有社会矛盾的着力点。再次，要充分发挥好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香港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将人大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作为联结香港和内地的重点沟通渠道，紧紧依靠香港爱国人士把统战工作沉下去，将“爱国爱港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发动香港民众与社会网络同香港本土激进势力、境外干涉势力进行斗争的武器，维护香港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 [1] 国新办举行关于香港当前局势的看法新闻发布会 [EB/OL]. (2019-09-03) [2020-04-12]. <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39595/41558/index.htm>.
- [2] 习近平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N]. 光明日报, 2019-11-15 (2).
- [3] 冯邦彦. 香港产业结构第三次转型：构建“1+3”产业体系 [J]. 港澳研究, 2015 (4) : 38-46.
- [4] 陈广汉, 张应武. 香港经济转型：现状及未来的路向 [J]. 珠江经济, 2007 (7) : 4-19.
- [5] 封小云. 粤港澳经济合作走势的现实思考 [J]. 港澳研究, 2014 (2) : 45-52.
- [6] 赵子乐, 申明浩. 香港立法会议员投票规律量化研究 [J]. 港澳研究, 2019 (2) : 30-43.
- [7] 王衡. 国家认同、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5 (3) : 147-161.
- [8] 许崇德. 略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7 (6) : 58-64.
- [9] 刘兆佳. 香港“占中”行动的深层剖析 [J]. 港澳研究, 2015 (1) : 18-23.
- [10] 刘兆佳. 政改争议及两种“一国两制”理解的“对决” [J]. 港澳研究, 2015 (2) : 19-28.
- [11] 张建. “一国两制”与中国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为视角 [J]. 港澳研究, 2019 (1) : 51-60.
- [12] 严安林. 习近平涉港澳事务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5) : 5-10.
- [13] John McDermott.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after 1997 [J]. 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1997 (19) : 263-292.
- [14] Wan-Ying Lin, Bolin Cao and Xinzhi Zhang. To Speak or Not to Speak: Predicting College Students Outspokenness in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11) : 3705-3715.

- [15] 沈本秋. 2007 年以来美国非政府组织在香港活动之评析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3 (1): 154-158.
- [16] 沈本秋. 试析 2007 年以来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2 (1): 72-83.
- [17] 李环. 近年美国对香港政策变化及评估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6 (2): 24-31.
- [18] 张建.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研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5): 11-19.
- [19] 张建. 美国对香港修例风波的介入: 评估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1): 46-53.
- [20] 刘兆佳. 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 [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6: 9.
- [21] 张玉阁, 郭万达. 香港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与策略选择 [J]. 港澳研究, 2013 (1): 37-45+94-95.
- [22] 杨建兵, 陈绍辉. 香港民主发展历程的回溯与展望 [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5): 31-37.
- [23] 阎小骏. 徘徊与摇摆: 香港人国家认同的集体困境 [J]. 文化纵横, 2016 (4): 70-76.
- [24] 程恩富, 任传普. 香港修例风波的政治经济根源分析 [J]. 管理学报, 2019 (6): 1-7.
- [25] 刘阳. 香港传媒政治影响力分析 [J]. 兰州学刊, 2006 (8): 124-126.
- [26] 章辉美. 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论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5 (3): 193-196.
- [27] 张萌萌. 香港政治传播中的认同构建 [J]. 探索与争鸣, 2012 (6): 78-80.
- [28] 黄月细, 蔡国谦. “公民记者”及社群媒体对香港青年政治倾向的影响与对策 [J].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18 (1): 45-50.
- [29] Agnes Shuk-mei Ku. Contradi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J]. Asian Survey, 2009 (3): 526.
- [30] 李明堃. 英治时期之香港公民社会 [J]. 港澳研究, 2016 (4): 60-70+93-94.
- [31] 李文良. 国家安全管理学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 19.
- [32] 调查报道|美 IRI 扶植本港学生搞“颜色革命” [EB/OL]. (2020-01-07) [2020-04-12].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0/0107/401085.html>.
- [33] DC leaks. Documents describing financial reserves and plans of OSF [EB/OL]. (2018-08-20) [2020-04-12]. <https://dcleaks.com/index.php/srsreserves/>.
- [34] PUBLIC LAW 116-76-NOV. 27, 2019, 133 STAT. 1161 [EB/OL]. (2019-11-27) [2020-03-29]. <https://www.Congress.gov>.
- [35] 台湾当局介入香港问题的重重阴谋 [EB/OL]. (2019-08-15) [2020-04-12]. <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dnsz/2019-08-15/2297046.html>.
- [36] 汪曙申. “港独”与“台独”合演丑剧 [N]. 环球时报, 2019-09-05 (14).
- [37]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of the UK. The 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 1 January To 30 June 2019 [R]. 2019: 10.
- [38] 周明, 曾向红. 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机会结构、水平网络与架构共鸣 [J]. 社会学研究, 2011 (6): 14.
- [39] 曾向红, 陈亚州. 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运动——全球抗议周期中的框架转型及其效果 [J]. 国际安全研究, 2015 (5): 81-106+158.
- [40] 王震. “阿拉伯之春”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2 (6): 15-19+36.
- [41] 张蔚林. 新媒体的社会功能——以“阿拉伯之春”和“美国之秋”为例 [J]. 新闻前哨, 2014 (7): 91-92.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港独”的极化机制与过程研究

李捷 李文慧

(兰州大学 中亚研究所/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港独”思潮与运动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极化色彩。“港独”是香港本土主义的极端形式, 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二元对立矛盾是其滋长的背景。“港独”的极化机制与过程主要表现为认知极化与行动极端化两个相互增强的层面。一方面, 通过香港与内地之间“自我”与“他者”的极化塑造, “港独”在认知与认同层面建构了分裂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 通过意识形态和行为主体的极化, “港独”势力不断推动从社会运动到民粹主义, 再到“颜色革命”和恐怖主义的行动极端化。在香港社会严重撕裂、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 “港独”势力正企图以“民主”手段夺取和实现对香港社会的暴力劫持。

关键词: “港独”; 极化; 本土主义; 极端化; 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0) 03-0045-17

一、“港独”极化问题的提出

香港回归以来, 香港的分离主义(“港独”)从无到有、愈演愈烈。特别是自2019年6月以来, 其借由“反送中”公然走向台前并肆虐至今。在对香港此起彼伏的乱象错愕乃至愤怒的同时, 我们需要从理论角度梳理“港独”产生与发展的动态机理。这涉及对香港在政治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结构性矛盾的总结, 也涉及香港人对国家文化与政治认同的偏移, 还包括对“港独”势力进行认同政治建构及其极端化行为的解释。以动态方法观察和研究香港的新问题和新动向, 分析“港独”势力对香港社会的暴力劫持以及研判香港的政治走向, 对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及国家安全和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整体而言, “港独”思潮及活动的产生与发展除了体现分裂主义的一般规律外, 在理论维度中还兼具认同政治、民粹主义、社会运动、极端主义、“颜色革命”等各种色彩。在上述领域的综合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0.03.005

作者简介: 李捷,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文慧,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颜色革命’的发生、扩散与应对研究”(19BGJ051)

引用格式: 李捷, 李文慧. “港独”的极化机制与过程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3): 45-61.

性研究中,学界已经对香港社会及政治问题作出有益探索。如在香港政治研究中,学界对国家认同与本土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对香港社会运动的影响展开了相关研究。本土认同与社会运动互为激励关系。一方面,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集体认同感是连接个体、集体行动的组织载体和文化体系的社会建构物;另一方面,运动本身也对身份认同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1]。如果将“港独”视作实质性的政治行动乃至“颜色革命”,那么它的政治动员是嵌入社会运动之中的。其机制包括社会分歧与对抗轴线的确立、针对民众展开集体意识的建构与强化、运动的持续组织化过程。“港独”体现出明显的民粹路径:建构“人民”,定位“人民”的敌人,进而确立“人民”对“其他人”的二元世界观,构成民粹主义的内在规定性。这既是民粹主义话语政治的逻辑基础,也是民粹主义反抗性的内在根源^[2]。结合认同政治、民粹主义的相关理论,“港独”中社会认同的建构、动员策略明显基于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基础。

香港本土主义势力以“自我”和“他者”为范畴,进行放大自我同质性与他者异质性的社会建构。一方面,诉诸社会认同建构以论证和增强自我的同质性。随着香港与内地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不断缩小,香港本土主义引以为傲的经济优越感不复存在,他们对两地政治制度及其背后价值理念差异的强调和放大就成为自然选择。在这个层面上,香港本土主义开始强调自我“价值本土”^①的同质性。另一方面,通过妖魔化内地,排斥一切和内地密切相关的事物,在形塑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彰显对异质的排他性。这种排他在政治上涉及对国家主体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污名化、对中央治理权威的刻板偏见,在价值观上全面向西方靠拢,在文化及社会关系中“去中国化”。这种极端本土派的他者异质性建构常常始于情绪的调动,即故意选择最煽情、极端和侮辱的词句来凸显自身的政治倾向,以“勇武抗争”为行动指南并诉诸激烈的排他主义行径。

以二元价值观为基础,“港独”所建构的“自我”与“他者”从根本上存在一种对抗关系。这种二元对抗体现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纵向维度的对抗指香港本土主义者对特区政府对抗。横向维度的对抗指本土主义者对内地同胞的对抗。两个维度的对抗最终都指向主权、治权的归属——国家。国家(中央政府)成为“港独”实施政治动员所确立的政治对抗轴线。但是,仅以上述二元价值观和横纵向对抗关系解读“港独”思潮和行径是不够的。“港独”并非天然形成,它不同于一般认同政治以种族、族群或宗教等身份特征为载体,而根源于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特性及变迁,同时具有深刻建构性。香港人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香港-中国人”身份认同,其中香港人的身份与文化或族群意义上的中国人身份之间存在张力,这种身份认同在社会中构建出一种对趋同与保留独特性之间的“极化态度”^[3]。同时,“港独”不同于以单一性议题为主的民粹主义——围绕着某一个不能被体制所满足的要求来动员人民。从当前“港独”的行为特征来看,它已远远超越“要求”的范畴,即“不再在向当权者要求某事物的层次上运作,它想要摧毁他们”^[4]。

简言之,“港独”在某种程度上已将内部同质性与外部异质性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建构推进到极化的程度。这种极化首先表现为以极端本土主义为一端,以国家/中央政府/内地为另一端,体现出强烈的反民族、反国家性质。这种极化同时造成香港社会的内部撕裂。撕裂性均源于内部不同团体

^① 所谓的“价值本土”,是指以“普世价值”为包装,以“自由民主”为论述口号,以“制宪”“自决公投”“深化民主”“公民不服从”等为具体行动,以确立“香港主体性”为实质内容,为“本土”服务的政治理念。参见:刘强. 香港本土意识的源流与嬗变[G]//田飞龙. 视角: 香港回归二十年.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17: 162.

对外在“他者”态度的差异，内部撕裂是外部亲“他者”与反“他者”区隔的延续。“港独”议题导致香港社会极化的核心在于分裂与统一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极化。更严峻的是，这种认知层面的极化同时推动“港独”内部的极端化。从非法“占中”到“旺角骚乱”，再到“修例风波”持续至今的动乱，它正在以异常暴力和极端的颠覆方式体现出来。所以，对“港独”的研究需要在范式层面进行突破，立足于国家统一与安全的角度来看待香港的政治社会变迁。本文在综合认同政治、民粹主义和社会运动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尝试以极化理论分析“港独”对立型认知建构和极端化路径，以期对其内在机理和深层威胁作出梳理和评估。

二、极化机制的相关理论

极化理论源自社会心理学，随后扩展到社会运动理论并在政治学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内外群体之间的对立和行为倾向的极端化是极化机制在认知与行为方面的两个显著特征。

（一）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的概念最早由詹姆斯·斯托纳在1961年提出。凯斯·桑斯坦则在社会心理学层面对群体极化进行了详细论述。他将“群体极化”定义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就有某些倾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5]在一定程度上，群体极化是群体内部协商机制的产物。群体极化是群体内部充分协商、频繁沟通、不断强化共识的结果，这种因相似偏好、观念而结成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容易形成心理暗示并相互感染，最终产生极端化的群体意见。但是，这种群体内的协商是非均衡的，因为它首先是一种在群体内排斥异己的现象。

群体极化最直接的后果是观点和态度的极端化。持有相同倾向的人在群体讨论结束之后，更趋向保持原有观点且变得更为极端。群体极化形成于社会隔离机制与群体的自我确信和确认。促成群体极化的社会心理学诱因源于新的信息交流，而荣誉感、舌战优势、抱有偏见的辩论、退出机制、社会压力、权威结构、具体境遇、群体思维等促使群体极化进一步发展。群体极化遍布社会政治领域，它们绝非无理性的冲动，而是在社会隔离机制的诱发下理性的自我选择与自我强化^[6]。在暴力极端主义传播特别是“自我极端化”的案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自我隔离、孤立的活动小组，通过群体极化的心理路径急剧地走向暴力。

在信息传媒充分发展的时代，广泛普及的社交平台和网络为相近立场的人群提供了相互沟通的便利，也为发展和巩固已有立场提供了更多机会。这就更容易强化极端群体的封闭性、激进性和极端性。“社交网络的使用者通过一系列对相异观点的筛选和过滤，进而通过在线社交网络的朋友建构机制，寻找与自己政见相同者，最终塑造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观点极化的社会网络。”^[7]

（二）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极化

在社会运动理论中，极化是指抗争过程中诉求者之间政治和社会差别的扩大，以及先前摇摆不定或中立的行为者向一端或两端聚集的趋势。极化一旦发生，就成为影响抗争进程的重要因素，因为它挖空了温和的中心，阻碍旧有联盟的重构，并为未来新联盟的产生提供条件。它甚至为最具体的政策问题注入意识形态内容而使之难以解决，可能导致镇压、武装冲突以及内战的爆发。在社会斗争理论中，极化机制通常与机遇/威胁螺旋、竞争、范畴形成及居间网络等机制共同发生作用^[8]。其中，机遇和威胁并非客观的范畴，而是取决于集体归因的类型。竞争主要围绕群体边界而展开。

范畴形成造就认同，它影响着斗争参与者的认同。而居间网络则在群体联盟过程中发挥穿梭协调的中介作用。社会运动理论对极化案例的研究，最早涉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之间的斗争，即运动诉求者之间的关系。后来，这一机制逐步扩展到美国南北战争、东南亚族群宗教冲突等案例的研究。

（三）政治学中的极化

在政治学领域，极化一般指对某种意识形态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作为一种状态是指“对某件事情的观点与理论上最大值的对立程度；作为一个过程是指这样的对立程度随着时间而增加”^[9]。现有研究常常以美国两党制为基本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两党对峙所导致的政党极化、国会分化、政策措施的分歧，并由两党传递到选民所导致的社会在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分裂。有学者将政治极化定义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偏好趋于政治光谱的两极，并且两极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偏好分歧较大、对立严重。”^[10]

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民意和公众态度的分歧甚至极端化过程，或曰大众极化；另一方面，在两党制或多党制政体中，处于竞争态势的两党或多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滑向两个极端的过程，或者某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派系或精英在某个党派地位显著上升甚至占据主流地位的过程，意即精英极化^[11]。大众极化与精英极化实质上是相互强化的，现代传媒及围绕着政党竞选产生的竞争推动了两者间的相互激励。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议题的深化，政治学所研究极化的内涵和外延继续延展。它越来越多地涉及包括精英、大众、阶层、信众等不同群体围绕权力、意识形态、文化、全球化等议题导致的分化与对立。

（四）极化的本质与威胁

在极化的主体方面，社会心理学认为极化的主体是小群体，极化效应是小群体决策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社会运动理论关注运动诉求者之间的分化，政治学则将极化的主体扩大到了社会公众。关于极化的对象，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者将极化指向观点、态度、立场的极端化或激进趋向；社会运动理论重点关注极化过程中的群体内关系；政治学领域的极化问题不仅指观点和立场的激进，也包括观点两极化中的内部高度同质化。极化的本质及其威胁体现在如下方面。

1. 认知层面：异质性与同质性的对立。极化现象包括两个主要向度：一是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二是各自内部的同一性。例如，美国的政治极化意味着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两个阵营的差异越来越大，同时各自内部的同一性越来越高^[12]。政治极化意味着两个政治阵营内部越来越同质化，同时两者之间越来越异质化。回到社会心理学的维度，一方面，群体极化过程中，群体内部非均衡性的协商即排除异己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去个体性的过程。个体基于群体归属与认同的考量，在此过程中放弃自我的观点而选择从众。群体内部的压力机制加强了群体内部的内同质性。将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所需要的攻击性不仅是对外朝向另一群体的，而且也是对内的，致力于清除将个体区别于群体的差异，即去个体性^[13]。另一方面，群体极化必然导致不同群体之间分歧进一步加剧。由于社会区隔机制的作用，秉持固有立场的群体为彰显自我特性，更愿意以极端的立场为标签，放大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在这种背景下，群体之间的边界固化且难以跨越。

2. 行为层面：从极化到极端化。在心理学上，群体极化源自集体无意识现象。勒庞认为群体心理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现象，由于群体中的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约束个人的责任感在群体中彻底消

失，群体成为一个不必承担责任的无名氏^[14]。在社会运动中，群体的同质性、匿名性成为大众情绪激化和群体冲动的重要条件，在群体极化的背景下，其行为常常朝着暴力化、极端化的方向发展。更进一步，极端主义可视为群体极化的升级版。极端主义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行为方面，都偏离了常规而选择激进和极端的路径和行动。在认知闭环和群体极化的背景下，群体内观点的偏激化、维护自我同一性和纯洁性的诉求，以及对异质性他者的敌视乃至仇恨，都将催生暴力极端的冲动。像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分离主义这类政治极端主义，更是群体极化的产物。比如，在一国之中独特的文化或民族地区，那些与其他人分离且有反抗甚至暴力倾向的人，经过协商有可能更加明确地朝反叛或暴力方面发展^[15]。如桑斯坦所言，民族仇恨不是人类社会原生的，它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血液中。它们往往是一种迅速的、受到群体极化刺激的“民族化”的产物^[16]。

从极化发展到极端化，必然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极端化在群际情绪、社会认同及价值理念等层面对群体偏激情绪的塑造和推动，不可避免地恶化群体关系，导致社会分裂和政治冲突。在政治层面，大众及精英之间的极化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度，极易催生民粹主义乃至“颜色革命”，或是国家政治被少数精英劫持。极化与极端化传递到文化、民族、宗教领域，则必然导致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或导致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泛滥。

三、“港独”思潮的实质及背景

“港独”思潮是香港本土主义的极端形式。“港独”思潮滋长并发展为肆虐至今的分离主义运动，其背后是本土主义对香港原有二元对立性社会政治结构的利用和极化。“港独”思潮极化香港本土主义、挑战国家权威，并在香港扭曲的媒体环境中为所谓“香港民族主义”迷思提供了土壤。

（一）本土主义与分离主义

所谓香港本土主义，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极端化的地域认同。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地域认同就是国民对国家的疏离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次共同体认同的常见现象。人们会抗拒个体化和社会原子化的过程，而更愿意在那些不断产生归属感、最终在许多情况下产生一种共同体的组织中聚集到一起^[17]，于是形成了相应的地域利益共同体及地域认同。早期来港的内地人士建构的“反把他乡当故乡”意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本地认同的意识。“移民”对香港从“他乡”到“故乡”的认知过程，形成了初期的香港本土意识。由于受殖民统治时期针对各种不公的社会抗争运动的刺激，以及从移民社会向本土社会转型，香港的本土化逐步完成，形成了初步的本土意识。

“本土主义”是一种政治理念，与之互为表里的是另一种政治观念——“去中国化”。在“港独”泛起的过程中，受到“新本土主义”思潮鼓动，高度政治化的“香港本土主义”成为分离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新本土主义”原意是指全球化时代导致的精英势力分化和本土保护主义倾向。近年来，这一运动已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具有结构性特征的政治现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新本土主义”表现为一种借用“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论述方式，后来逐渐演化为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甚至社会运动。“新本土主义”的概念在香港被少数民主派人士借用，他们援引大量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经典，包括西方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社区社群主义，牵强附会地解释香港本土意识、构建本土认同。回归以来，围绕一系列政治争拗，香港在受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本土意识逐渐去“乡土化”而政治化和极端化，成为构筑“港独”理论的底基^[18]。2016年5月，张德江视

察香港时指出，有极少数人排斥“一国”，抗拒中央，甚至打出“港独”旗号。这不是本土问题，而是以本土之名行分离之实。基于分离立场上的“本土主义”已逐步脱离了原生的文化属性，逐步政治化并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挑战力量。其一，这种地域认同不断强化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排斥对国家认同的从属身份。其二，塑造和放大自身的同质性，在价值和制度层面放大与国家的差异。其三，强调自身的优先性，以地域范围内的利益优先为原则，罔顾国家利益的整体权衡及不同地区间的协调。

（二）“港独”主义思潮

近年来，“港独”主义思潮泛起，把所谓“香港自治运动”和“香港独立建国”两种略有相似又有差异的话语体系作为基本论述，辅之以借自“台独”的本土主义、本土优先、本土利益等民粹口号。其主要诉求是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切断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实现所谓“香港民族自决”，在香港建立脱离中央管治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所谓“自治城邦”^①。在组织方式上，新世代的“港独”组织最初往往借助互联网以快聚快散的形式组成。成员以青年为主，使用从“独立建国”“命运自决”到“全民制宪”“本土优先”等烈度不一的口号标语。随着“港独”的逐步发展，其成员组织开始逐渐规范化、常态化。同时，本土派的抗争运动逐渐向更加激进化、有组织化和暴力化的方向发展^[19]。

“港独”思潮在香港的滥觞，标志着香港政治对抗图景中的主要矛盾发生了三项主要转变。其一，香港政治对抗的主题和主要诉求已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争民主、争普选”迅速转变为“争自决、争独立”，民主之争转变为统“独”之争。更严重的是，通过投靠英美等国反华势力，香港反对势力公开宣示对国家的背叛。香港的政治对抗超出本地范畴，对国家的统一、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直接威胁。其二，香港政治对抗的主要形式从和平、非暴力的社会运动转变成暴力、激进的大规模破坏行动和“勇武抗争”，对社会安宁、公共秩序和特区管治造成直接威胁。其三，在香港反对派政治力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泛民主派”与更年轻且更激进的本土、“勇武”组织加紧勾结，共同形成针对特区和中央政府的反对势力并发起反动活动^{[19] 195}。

从根本上说，“港独”思潮及其运动所依仗的激进本土认同既是空洞的，也是狂妄的。由于在文化和政治上不可能割裂与国家的整体性和事实性联系，它只能建立在一系列的否定、对立、反题的基础之上。香港激进本土认同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否定：否定制度上对国家的从属，强调自身作为西方文明和制度代理人的身份；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所谓“价值本土”；否定与内地的文化联系，强调自身粤语方言与繁体字等文化特性。在分离主义的语境下，上述否定式的本土认同陷入否定之否定的怪圈。建构在这种双重否定基础上的认同，最终催生了逆反、仇恨和极度的破坏性而非建设性活动。

（三）二元对立与“港独”产生的结构性背景

陈端洪认为“对峙”是香港政治精神构造的基本特征，是理解香港政治的关键^[20]。实质上，无论是结构、现象，抑或是群体政治层面，香港政治中的恶性对峙都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它诞生于香港受殖民统治时期、在回归后一直未得到有效缓解，并在当前香港社会与政治的剧烈变迁中急

^① “港独”分子陈云的《香港城邦论》被本土派视为“圣经”。他在书中认为“香港要区别于中国”，以维护香港人利益。其后，陈云更提出要以“勇武抗争”的方式捍卫所谓的“本土利益”。

剧恶化。这种二元对立主要表现为：

1. 本土主义与爱国主义。在港英当局管治晚期，香港的本土意识中开始形成香港人与中国人二元分化的身份架构。在这种身份构建的逻辑里，港人通过经济差距、地缘文化、历史认知、生活方式、语言口音的差异，不断将内地“他者”化，从而逐步形成香港的本土身份意识。自回归以降，港人在构建本土身份意识时更加注重政治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形成一套突显政治色彩的香港身份模式。本土意识的政治化，特别是在制度取向和价值层面相对于内地的异质化建构，而成为本土主义。本土主义走到极端，即为“港独”意识，与爱国主义形成二元对立。

2. 一国与两制。“一国两制”超越了现代国家所要求的同质性原则，在坚持“一国”前提下，通过“两制”与高度自治保持香港社会及政治的异质性。但是，“港独”势力把“一国”与“两制”二元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排斥，把国家主权、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同香港高度自治权对立起来。“一国两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创新，本身已经清楚地界定“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但香港的反动势力蓄意制造和扩大两者之间的矛盾。

3. 市民社会与特区政府。由于殖民主义造成的畸形权力结构残余，香港经济、意识形态权力的重心并不在特区政府，前者在商业利益阶层，后者在社会，而且依靠西方的意识形态来展开自身的政治论述。在此结构性制约下，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期望与特区政府管制能力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大，即特区政府无法单独应对经济与民生矛盾，社会在向特区政府发泄各类不满的同时，转向意识形态路径，加大、升级与特区政府的政治矛盾。

4. 政治精英的分化。在香港，由于在国家统一、“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差异，政治精英间的分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建制派与泛民派之间的二元对立和对抗成为香港政治的结构性因素，也成为香港政治困局的主要源头。相对于现代政治体系中政治派别的“议题主导型”，香港政治这种以反政权的基础性政治对抗为基调的二元对立结构是极其荒谬的。此外，随着民主化的推进，委任治理的方式逐步向选举政治转型，传统的精英主义治港路线不可避免地受到民粹主义和激进甚至极端势力的冲击。在近期香港事态的发展中，泛民与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出现合流倾向。

（四）“港独”煽动“香港民族主义”迷思

社会政治结构的二元对立及各类矛盾的尖锐化，使“港独”思潮得以产生。与此同时，利用这些对立和矛盾，香港政治、文化精英不断以民主化为名，持续进行本土主义及所谓“香港民族主义”的社会建构。精英分子能否鼓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实施动员，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他们控制信息来源的能力；二是是否容易将大众分隔为若干部分，充当民族主义信息的目标；三是新闻记者的独立程度和专业水平^[21]。多年来香港社会矛盾的累积和媒体市场的畸形发展，为反对势力煽动“港独”的迷思创造了条件。

1. 供给的部分垄断，即公共讨论的竞技场看似开放而有竞争性，但事实上信息被严重控制并有倾向性。在香港相对畸形的媒体市场中，客观、中立媒体的缺失，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仅有的中立媒体如《大公报》《文汇报》等被本地社会打压，长期被丑化和妖魔化。而香港电台、《苹果日报》等早已成为“港独”势力的喉舌。

2. 需求的分隔化，即个体因偏好差异或信息隔离，只接触到被过滤后的扭曲思想。香港人可以被称为踊跃的传媒新闻接受者^[22]，但是由于政治偏好及政治区隔的因素，他们的信息来源并非全面。

在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下，港人对政治的参与虽然在短期内存在认知踊跃和行动冷漠间的矛盾，但一旦其动机和机会被激活，很可能出现爆炸式释放。

3. 媒体制度和规范欠完善。由于缺乏制度规范和必要的价值引领，香港传媒系统的多样性和庸俗商业主义并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香港媒体表现出明显的议程设立和批判倾向。对轰动性效果的追求、问题紧迫感的塑造和情绪化的解决方案又进一步削弱了媒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①，当情感先于事实、立场决定真相时，人们对现实政治的怀疑越深，左右阵营的对抗和分化越严重，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大。在话语专断、情感压制理性的背景下，来自底层民意的宣泄、非理性的社会氛围和极端化的利益表达三者合一，构成当代极端民粹主义情绪产生的重要根源。质疑理性、仇官仇富、反精英、反体制，成为一种升级版的“政治正确”^[23]。

四、认知极化：以认同政治建构极端化的本土意识

认知极化是指建构极端化的本土意识，这是分离主义运动的起点。因为首先在认同层面建构国家的他者形象，同时塑造自我的政治认同，香港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得以从本土意识转变为排斥国家的本土主义。通过这种自我与他者紧张与敌对关系的建构，香港本土主义将本土意识从它所属的国家意识中剥离出来，以排他的形式构造出自身的主体意识乃至独立身份。“港独”的认知极化机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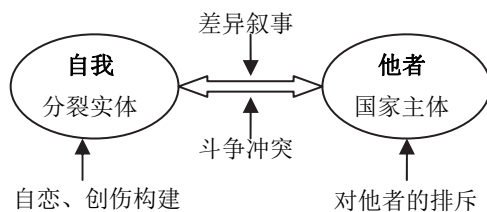


图 1 “港独”的认知极化建构

（一）主体建构与差异化叙事

以群体划界，建构敌对性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认同边界，是极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宣传及叙事的基本功能。当然，这种内外群体差异化的叙事方式是化约的、刻板化的，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在认同多元化及平等共处的现实中，这种认同政治刻意塑造孤立和单一性的身份认同，把内群体偏好极端化和放大，在群际关系的敌对性建构中实现认同极化的第一步。内群体偏向和外群体敌视之间的关系如下：

1. 集群归因错误。它是一种自利性质的内群体偏向，内群体成员通过排斥外群体的形式赋予自己质疑的权利。这种信念反过来决定且维系了其他形式的外群体歧视。相比外群体而言，内群体被认为拥有更多成果或者积极行为特征，更加不需要为那些失败或消极的行为负责。

2. 群际图示。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于图式的不信任。即人们有这样一个信念和预期，群际

^① 即事实不再是媒体报道的中心，真相开始让位于情感、观点和立场；相较于事实与真相，人们更倾向于信任自己的感觉、情绪和情感。

关系本身是竞争性的，因此外群体是不可信任的。这种先入为主的竞争性预期会让人产生自我实现预言。二是相对获益，群际关系意味着一种转变：从行为结果的绝对价值的最大化，转变为跟其他群体比较而产生的相对价值的最大化^[24]。

港英当局最初将“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殖民逻辑带入香港，逐步将包括香港人在内的“中国人”视为“他者”，从而确立了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伪主体”意识。“伪主体”意识是港人国家认同困境危机的根源。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所建立起来的“自我”意识其实是一种西化的本土意识，本质是一个“伪自我”。它所建构的主体也是“伪主体”，即臣服于西方话语霸权、替西方言说的“自我”。港人本土意识即“伪主体”意识建立起来以后，内地成为另一个“他者”，但这个“他者”与港人想象中的英国人这个“大他者”截然不同。内地的“他者”角色是一个在第一阶段就已经建立起来的，被视作西方化自我的对立面的“他者”。通过对香港的言说，西方话语制造了一种港人的“伪主体”，导致部分港人以“伪主体”的身份介入香港与内地对立的映像中^[25]。

由于叙事方式的差异，回归后香港本土意识有了一组对立的定位——缅怀受殖民统治时期的旧日子与重回母体、拥抱内地的经济机遇。后一种本土意识反思后殖民处境，以建立解殖主体为目标；前一种将本土意识重新挪移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将时间维度剔除，殖民遗产由需要批判反思的对象吊诡地回潮成为港人甚至要捍卫的政治及文化基本结构^[26]。就香港本土意识的差异化叙事而言，前一种转变的基础在于图示的不信任，以简单的香港与内地竞争来看待自身境遇及问题。由于特殊的受殖民统治的历史，香港与内地之间长期的政治区隔制造的差异化叙事由来已久。在主体建构方面，历史境遇、殖民制度、政治区隔建构了香港社会的“伪主体”身份。这一身份及其与内地“他者”之间的差异化并没有因其回归祖国而弥合，反而在自身与内地的落差及认知中被放大。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以不同形式呈现在政治层面，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往往异化为极端的“反中”情绪并激化为“港独”思潮。在差异化叙事上，香港本土主义者在试图挖掘本土文化特质、以“想象的共同体”建构所谓“香港民族”的同时，也在凸显自身的民主标签，并在国际社会极力塑造香港的所谓“民主斗士”形象。

（二）自恋、创伤与认同构建

在社会心理学看来，积极独特性多半为积极自尊这一基本需要服务，这种积极自尊的表现形式是积极的社会身份。既然身份是关系性的，任何一个群体中群体自豪感的激活，也会相应激活其他群体。一旦这些群体自豪的展示开始包括对领土的要求、自决的要求或对旧有悲哀和伤害的重温，自恋的循环就开始超越模仿而进入对抗。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语言游戏，它将身份转化为自恋。它是一种话语，承认存在差异的现实，且将他们转化为叙事性的、正当化的政治自决。在为政治规划——获得国家地位——提供合法性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赋予身份以荣耀。它把邻居变成陌生人，把本可相互渗透的身份界限变成了不可逾越的边界^{[13] 53}。同时，创伤的经验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它定义了痛苦的集体伤害，明确了受害者，认定了责任，分配了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后果。在分裂主义的认同政治中，一个重要手段即通过对创伤及不公正的回溯来推进认同构建。根据社会运动理论的解释，在确认不公、归罪他人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整个框架中记录不公，是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活动。大多数斗争构造“工作”是认知上的和可估价的——就是说，它识别不满，并在与其他重大不满相对照的背景下，将其转化为更广泛的要求^[27]。

香港分离主义的吹鼓手陈云妄称：“要挽回香港的城邦地位，要继承往昔英治时期的优良传统，补回英治后期的匮乏，建立中西文化揉合的香港本土文化。”具体行动包括认识本土历史、重建文化荣誉、建立香港文化符号象征等。在陈云眼中，阻碍香港本土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民主中国乃至文化中国的迷障，因此，要“打烂这个要人不断献祭的女神、母神，即是打破偶像崇拜，是香港人的心灵革命，之后才有真实的政治，才有真实的前途”^[28]。陈云的所谓情绪化批判是优越感日渐散去后，借由自锁和妖魔化手段来重塑身份认同。

在某种程度上，自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充当了香港内部结构性矛盾的“替罪羊”。受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畸形社会经济结构制造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这种结构在回归后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并未得以改观，反而被“祸水北引”——相关集团利用媒体大肆煽动，将社会政治矛盾转移到中央政府身上。在此背景下，诸如非法“占中”等被美化为“雨伞革命”，并被赋予所谓公民社会反抗官商共谋体制的正义色彩。香港激进本土势力将“一国两制”界定为“官商共谋”制度，将香港的社会矛盾和不满建构为阶级创伤。

（三）对他者的排斥

“他者”理论认为，认同的前提是“他者”的存在。个体在自我归类过程中会对内群体和外群体（“他者”）进行比较。“他者”的存在感愈强，内外群体的差异就越大，内群体的认同也就越强。爱德华·萨义德认为，自我认同的建构总是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认同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解释和再解释^[29]。他者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显著性是影响个体产生群体认同的关键因素^[30]。

从社会认同的路径来看，群体间（包括族群和某些地域群体）文化的客观差异是人们范畴化的前提。可是在许多情况下，文化差异只是政治修辞的原料而已，能从这些差异中引导出什么样的结果，无关差异本身^[31]。然而范畴化过程涉及感知的简化和明晰化，加上人们有将积极价值赋予自身的动机，内外群体之间的差异被夸大乃至于被极端化，进而产生对外群体僵化和贬抑的刻板印象。在群体间的社会竞争中，内外群体间关系朝恶性方向发展。

香港回归后，“反23条立法”“反国教”和非法“占中”三场具有对抗中央管治色彩的社会运动登场。香港本土意识在其中被重新演绎，解殖的话语为分离的主张所代替，香港与内地之间亦形成了“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在此过程中，香港本土意识亦从一个自治意识、文化意识向“独立意识”、政治意识过渡。“民主独立”“香港民族”等极端分离主义的概念出现在本土意识中，本土意识逐步沦为“港独”思潮的外壳^[18]。而且“港独”势力的范畴化维度是全方位的，即它所反对的“他者”是整体性的，包含人民（内地人）、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主权国家（中国）三个层次，三个层次互相渗透、彼此支撑，导致了反“他者”情绪的强烈性^[32]。

（四）认知封闭与自我强化的循环动力

很显然，以极端本土主义为基底的“港独”势力对香港社会的认同极化建构已取得“成功”，它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鲜明地体现出来。根据香港大学2019年6月的调查数据，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占受访者总数的52.9%，创下历史新高；认同自己为广义中国人身份的占受访者总数的46.6%，分别是认同中国人身份的占10.8%，认同中国的香港人身份的占23.5%，认同香港的中国人身份的占12.3%。2019年的调查是香港人身份认同史上的首次大逆转：一是只认同香港人身份的比例历史首次

超过认同广义中国人身份的比例；二是只认同香港人身份的比例历史首次超过 50%。尤需注意的是，对广义中国人的认同是基于文化层面的，而非政治层面的。在香港社会已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取向堪忧。

参照极端主义的宣传和认知路径，这种趋势仍将继续发展。极化认同建构必然导致认知的封闭，同时内群体认同、解决方案和危机建构的各种相互作用也在增强循环动力。如图 2 所示，群体内外的认同分别具有正值和负值，因此对危机的感知将变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实施解决方案的紧迫性更加迫切。反过来，对他者引发危机的认知，加剧了对群体内生成解决方案的迫切性，因此群体内外之间的双极性变得更加严格。这些过程通过自我强化和复合循环，进一步加强了极化认知中的“竞争意义系统”，即危机意识更严重化，解决方案诉求更极端化，对待他者更为凶狠，纯化内群体的诉求更为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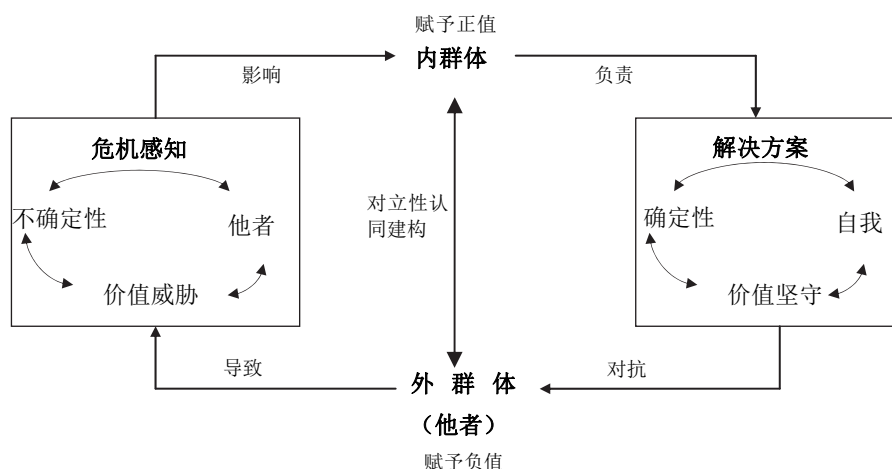


图 2 极化认同建构的循环动力^①

五、行动极端化：“港独”的极化演进

从认知极化到行动极端化，是极化机制演进的必然结果。当前，香港繁荣稳定及“一国两制”在港顺利施行的最大障碍，在于由香港本土主义极端势力所催生的“港独”思潮复兴和以该思潮作为动员基础的新型社会运动。在香港本土主义极端化的推动下，此类社会运动不断朝暴力化乃至分裂主义的方向发展。2003 年“反 23 条立法”、2012 年“反国教”、2014 年非法“占中”、2016 年“旺角骚乱”等愈演愈烈，到 2019 年“修例风波”达到高潮并持续至今。极端化行动在不断突破底线：非法“占中”冲破了法律底线，“旺角骚乱”冲破了暴力边界，肆虐至今的“修例风波”则挑战了国家统一底线。2019 年 6 月开始，香港的动乱至今仍未平息，种种恶行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① 资料来源：Haroro J. Ingram. Militant Islamist Propaganda: A Two-Tiered Framework for Practitioners [EB/OL]. (2016-12-29) [2020-04-22]. <https://www.icct.nl/wp-content/uploads/2016/11/ICCT-Ingram-A-Linkage-Based-Approach-Nov2016.pdf>.

（一）从极化到极端主义的逻辑必然

从“维园晚会”到“七一游行”，从抗议人大释法行动、“反高铁”“反国教”一直到“反送中”，香港本地社会运动从早期的小规模、单一议题抗议活动，发展为当前的大规模、总体性、全面同中央和特区政府对抗的社会运动。它不再以一时一事为依归，而是从基础层面反对和抵制中央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谋求建立属于香港本地的身份认同以及独立的政治实体^[19]。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运动的性质已发生了极化：从民粹性社会运动发展到分裂主义运动。

“反自由行”“反高铁”“反国教”等民粹性社会运动中，香港反对势力使用典型的否定式话语动员，不断增加目标清单。在“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背景下，只要不利于狭隘自我利益的政策，都可能成为香港民粹运动否定的对象。很显然，这种否定式的民粹运动主要是基于对现行政策与现行体制的不信任以及广泛的大众动员的需要。从反对某个单一政策议题上升到反国家，标志着香港反动运动的极化。这种运动内部的极化，既是认同政治、民粹主义朝极端化方向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运动发展到所谓“政治抗争”阶段后的逻辑使然。

从非法“占中”、“旺角骚乱”到当前以夺权为诉求的暴乱等一系列香港反动运动，“港独”势力对“颜色革命”与后现代政治抗争技术进行精致模仿，在弱公民意识和极端化进程下政治羞耻感丧失。政治过程论认为，抗争策略的本质是要破坏某种权力赖以形成和运作的社会结构，策略的有效性就来自它对某种社会结构的破坏力。塔罗指出：“斗争的核心是通过不断发明新的表现抗争的方法以形成破坏力。”^[33]

既然抗争策略的本质是追求破坏力，那么破坏力形成和变化的规律就决定着社会运动对策略的选择和运用。根据破坏力的大小，社会运动一般可以选择三种基本抗争策略：暴力、破坏和顺化的集体行动^{[33] 99-113}。三种策略都是社会运动戏码的组成部分，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运动组织根据需要而组合使用。上述策略的选择还需在效果上契合三种逻辑：首先是“数量逻辑”，即策略设计的基本方向是尽可能提高参与人数。数量意味着能量，参与集体抗争的人数不仅直观地展示着社会支持力度，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对有关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其次是“损害逻辑”，即直接或间接地给对手造成实质性损害，企图使对方难以承受损失而让步。最后是“见证逻辑”，即通过展示或制造某种证据，让外界见证自己体现或捍卫着社会普遍尊崇的某种价值，其关键是在足够大的范围内营造出足够强烈的悲情^[34]。在策略选择方面，一般性、基于数量逻辑的顺化行动虽然可以彰显香港反动运动的规模，但在认同政治导致社会严重撕裂、民粹主义运动出现议题疲劳的情况下，已难以满足相关势力的“胃口”。在反对势力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极化过程中，暴力、破坏策略及其相对应的损害、见证逻辑得以占据上风。更重要的是，“港独”势力面对国家及特区政府，只能沿袭极化逻辑、依赖极端化的暴力和破坏来彰显自身的存在。

在本土、外部等各类极端势力的挟持下，香港的社会运动朝恐怖化方向发展，分离主义运动也正式走向舞台中心。其行为逻辑包括三个方面：在对内地方面极力丑化和妖魔化，以极端民粹和恐怖手段打击一切包含国家元素的目标及其支持者；在对港内部方面，通过大规模的社会破坏运动，以“自残”的方式自我破坏、自我毁灭，以瘫痪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来要挟本地社会和中央政府；在对外方面以意识形态为宣传口径极力争取外部势力的同情，抓紧与外部反华势力的勾结并充当西方制华的工具。

所谓抗争策略加上外部介入，不仅使冲突扩大化，其目标性质也可能进一步极化。“修例风波”背后隐藏着“颜色革命”的图谋，反中乱港分子肆无忌惮地搞乱香港、祸乱人心，摧毁香港赖以生存的法治秩序，企图挑动西方势力深度干涉香港事务，为自身私利而甘作西方遏制中国的棋子。在他们眼中，香港的未来不过是向“西方救世主”摇尾乞怜的献礼，市民的幸福生活不过是胁迫勒索选票的筹码^[35]。“港独”分子投靠西方敌对势力的行为已将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这种极化将使们最终成为人民的敌人和历史的罪人。

（二）“港独”的内在极化

在实践上，今天的香港反动政治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政治诉求上，过去 20 多年所追求的“民主回归”已经转向本土主义的“独立自决”；在抗争手法上，从过去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转向“勇武抗命”；在组织领导上，由精英主义转向扁平化的民粹主义^[36]。上述转变实质是“港独”内部极化的结果。

1. 意识形态。在本土主义者内部，香港社会运动中抗争身份的生产过程同时关乎着其正当性的竞争过程。2009 年“反高铁”的主体“80 后”以文化政治抗争方式以及世代论述作动员，全面开始了政治本土化的建构进程。这种空洞性的本土论述为各类势力的话语争夺提供了空间。在此竞争过程中，“香港人优先”“香港民族主义”等“港独”意识形态开始走上台前。它对本土主义的极端化阐述表现为，把“本土”从地方转化为领土，进而以边界跟内地作区隔。典型如陈云所提出的“香港城邦论”把握本土论述的真空状态，提出右翼式的本土观，以“边界—领土”的空间性架构其本土策略，催生了本土派的抗争身份。本土论述在时空性质中从文化、地域型上升为政治、“国家”型，标志着香港本土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极化。

在自我与他者关系之间，2013 年至 2016 年，香港社会进入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期。在 2014 年非法“占中”无功而退后，本土主义者的身份认同演变成一种更强烈、更狭隘也更具对抗性的政治性共同体意识。在内外群体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国家、内地新移民及特区政府均被视作“他者”。随着激烈的政治争论持续发生，港人的身份认同日趋分明而尖锐。自 2019 年 6 月以来，“港独”的意识形态在年轻本土派激进运动的推动和大肆传播下，更为公开化、系统化。在其话语体系中，崇尚和实践西方政治文明及其制度成为香港身份的标签，在充当西方代理人的同时，反中、反共则成为其行动指南。当然，鉴于“港独”意识形态本身的空洞性和虚妄性，它缺乏理论和价值层面的自洽性与合理性。为迎合部分青年的逆反情绪并在媒体舆论层面推进社会极化，它以更强烈的否定方式构建自我认同、激化政治矛盾。例如，公然侮辱国旗、称祖国为“支那”、肆无忌惮地打砸乃至实施恐怖主义行径等，以最大的仇恨和否定、最彻底的侮辱和破坏，与内地割席而实现对自我存在的肯定。

2. 行动主体。自 2014 年非法“占中”导致香港社会深度撕裂为“黄”“蓝”两大阵营的同时，香港政治反对势力内部也在分化，特别是围绕行动目标和方式发生极化。这种行动主体的极化大大加速了香港反对势力极端化的进程。其一是青年本土派崛起。从非法“占中”落幕到政改方案被否决，香港传统泛民派的体制内抗争资源已然耗尽（至少在青年本土派看来）。而在这一过程中日趋活跃并不断自我组织化的青年非法“占中”力量在后政改时期迅速扩大，产生了青年本土派。它主导了 2016 年的“旺角骚乱”并在 2016 年 9 月的立法会选举中取得重要政治突破。青年本土派是非

法“占中”与政改接连失败带来的社会运动激进化的产物，也是其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他们经由香港的民主选举程序已部分进入体制内，导致香港政治进入一个更加迷茫、激进和不确定的“泛本土化时代”^[37]。其二是本土派中“勇武派”走上台前。所谓“勇武派”产生于非法“占中”后期运动内部的分化：一方是以“占中三丑”“学盟”为代表的所谓“温和派”，另一方是宣称革命的“勇武派”。双方围绕运动方式的争论迅速导致了极化，“勇武派”倾向所谓“暴力革命”的路径。“旺角骚乱”及侮辱恐吓内地游客都被他们视为“勇武”有效的案例。从2019年6月起肆虐至今的动乱中，“勇武派”实质已向恐怖主义发展，成为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在公然打出“港独”旗号、公然投靠外部敌对势力而威胁国家安全的同时，其内部极化导致的极端化与暴力成为必然。当前，香港青年本土派实际上已经抛弃传统泛民的“双普选”议题或重启政改诉求等制度内目标，直接践踏和突破基本法秩序而沦为分裂势力。所谓“勇武派”实质上已堕入反民族、反国家的深渊。

六、结语：极化背景下“港独”的民主算盘和暴力劫持

通过极端本土、价值本土及反民族、反国家的论述和认同构建，“港独”势力在原有二元对立的架构下，不断制造港人认同危机。自2019年6月以来，“港独”势力发动的一系列以所谓“抗争”为名的暴力、骚乱活动，实际是图谋在进行“颜色革命”的同时，对香港社会进行暴力劫持。在高度政治化、暴力化的背景下，香港社会已呈现出全方位的深度撕裂。在上述极化背景下，香港社会的深度撕裂和“港独”的暴力化将陷入撕裂—暴力—极化—再撕裂—更暴力的恶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动向值得高度警惕。

（一）“港独”的民主算盘

首先要承认的是，在本土主义认同政治的操弄下，香港社会的国家认同危机不断加剧。其结果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不断本土化和“去中国化”。近年来“港独”的极化与本土主义者身份认同的“去中国化”是一个互为强化的过程。2018年12月的调查显示，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为43.2%；而仅仅半年后，该数据就上升到52.9%^[38]。其升幅之大，足见“修例风波”对“港独”意识的助推作用。部分港人身份认同的上述转变，直接传递到投票行为中，这在近年来的香港多次地方选举中已有体现。2016年立法会选举数据显示，建制派得票为87.1万张（40.17%），泛民派78.1万张（36.02%），本土派41.2万张（19.0%）。在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获得59席，得票120.7万张（41%）；泛民（包括本土派）获得388席，得票167.4万张（57%）。在香港本土主义对认同政治、民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操弄下，传统意义上建制派与反对派之间40%对60%的支持比例差距将面临直选的强烈冲击。尤需注意的是，香港社会对建制派与泛民派的支持带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前者以中老年为主，后者以青年为主。随着香港社会的代际更替，这一所谓“四六黄金比例”将发生剧烈变化。

反对派以“民主”为名推动“港独”的算盘如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选举来自于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共有1200名委员；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后，泛民派控制了117席区议会名额，加上原有的325席，它已控制了选举委员会的442席；泛民派的目标是在选举委员会中过半数，削弱中央政府提名特首的能力，以所谓“民主”手段控制特区政府或制造香港宪治危机；2020年，香港将举行立法会选举，就目前形势而言，泛民派可能发动新一轮的冲击。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表明，

民主派内部的政治整合已逐步完成。泛民派与本土派达成的政治共识是，在街头运动上不割席，“和理非”与“勇武”联合；在选举政治上也不割席，泛民和本土联合。在实现内部整合的基础上，基于挟持支持者的多数优势，香港反动势力的胃口已不是“双普选”的程序所能满足，他们企图全面控制香港特区的立法权和行政权。

（二）暴力劫持

“港独”极化过程中蔓延的暴力、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直接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严重撕裂，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以暴力实现了对撕裂社会的劫持。香港社会法治、道德、伦理与国家认同等方面的深层危机最终显露出来。

1. 在认同政治层面极化了对内地和国家的仇视。由于强烈的疑中、恐中、反中情结，本土主义者对内地和中央政府的态度有着极大怀疑和不信任。在极度的暴力和秩序失控状态下，本土主义者的认知定势和思维闭环并未受到破坏，反而归因于特区和中央政府本身并加深对他们的怨恨。

2. 在加深对他者怨恨的同时对暴力进行合理化。虽然不能直接将 2019 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与香港社会的多数对待暴力的态度等同起来，但面对“港独”势力持续至今的无差别、不择手段的暴力和仇恨犯罪，面对“东方之珠”日渐沦为失序乃至动荡的深渊，香港社会的部分人反而陷入了“沉默大多数的螺旋”。这种极端认知实质是对暴力的默许，对“港独”的一种表态和纵容。

3. “港独”实现对香港社会的暴力劫持。这次区议会选举对极端“港独”势力来说意义重大，他们的暴力行径并未受到社会内部严厉的道德和伦理的约束和谴责。在收获大规模社会骚乱和极端暴力煽动仇恨、赢取基层选举的“果实”后，他们实际正在以暴力实现对社会的劫持。在他们看来，香港社会只能默许他们的极端化行动及夺权、分裂目标，否则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暴力。由此，高度政治化、激进化的年轻人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香港的政治生态；甚至暴力将继续“平庸化”，成为香港政治生活的标准组成部分。

目前，香港社会及政治的走向面临极大困境，一是“港独”的公然活动，二是它所操弄的认知极化与行动极端化。重塑香港社会的国家认同、坚定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秩序、全面打击“港独”势力，才是香港的真正出路。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面对香港当前的危机，香港社会不再沉默。2020 年 5 月 5 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作为总召集人组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举行成立仪式。在 1 545 位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旨在团结香港各界人士，呼吁坚守“一国两制”，凝聚共识，为香港寻找出路。

参考文献：

- [1] Francesca polletta and James M. Jasper.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 (1) : 283-305.
- [2] 林红. 西方民粹主义的话语政治及其面临的批判 [J]. 政治学研究, 2018 (4) : 68-79+127.
- [3] Marilyn B. Brewer.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Identity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Hong Ko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9 (2) : 187-197.
- [4] Slavoj Zizek.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J]. Critical Inquiry, 2006 (3) : 551-574.
- [5] 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 [M]. 黄维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7.

- [6] 程岩. 群体极化、二阶多样性与制度安排——读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J]. 环球法律评论, 2011(6): 145-160.
- [7] 陈福平, 许丹红. 观点与链接: 在线社交网络中的群体政治极化——一个微观行为的解释框架[J]. 社会, 2017(4): 217-240.
- [8] 道格·马克亚当, 西德尼·塔罗, 查尔斯·蒂利. 斗争的动力[M]. 李义中, 屈平,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206-252.
- [9] Paul DiMaggio, John Evans, Bethany Bryson. Have American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3): 693.
- [10] 孙存良. 政治极化: 选举民主的宿命?——兼论协商民主的功能与局限[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1): 35-38.
- [11] 李钧鹏. 政治多元化与美国政治极化: 迈向关系网络的理路[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 74-79+96.
- [12] David Brady, Hahrie Han. Polarizmion Then and Now: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 // Pietro S. Nivola, David W. Brady, eds. Red and Blue 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America's Polarize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0: 119-151.
- [13] 叶礼庭. 战士的荣耀: 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M]. 成起宏,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44.
- [14]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15-16.
- [15] Albert Bretton. Political Nationality and Extremism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3-55.
- [16] 凯斯·R. 桑斯坦. 极端的人群: 群体行为的心理学[M]. 尹宏毅, 郭彬彬,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133.
- [17]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曹荣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5.
- [18] 祝捷, 章小杉. “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性梳理与还原——兼论“港独”思潮的形成与演化[J]. 港澳研究, 2016(1): 12-22+93.
- [19] 阎小骏. 香港治与乱: 2047年的政治想象[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94.
- [20] 陈端洪. 理解香港政治[G] // 田飞龙. 视角: 香港回归二十年.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17: 4.
- [21] 杰克·斯奈德. 从投票到暴力: 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M]. 吴强,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47-49.
- [22] Curtis H. Martin, Bruce Stronach. Politics East and West: A Comparison of Japanese and British Political Culture [M]. Armonk: M. E. Sharpe, 1992: 131.
- [23] 庞金友. 国家极化与当代欧美民主政治危机[J]. 政治学研究, 2019(3): 44-56+126-127.
- [24] 玛丽莲·布鲁尔. 我们、你们、他们: 群际关系心理学揭秘[M]. 李卫华,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66-92.
- [25] 杨晗旭, 徐海波. 试析香港国家认同的困境——从被言说的“他者”到“伪主体”[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6): 139-143.
- [26] 周思中. 本土的矩阵——后殖民时期香港的躁动与寂静[J]. 思想香港, 2014(3): 14-21.

- [27] 西德尼·塔罗. 运动中的力量: 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M]. 吴庆宏,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149.
- [28] 陈云. 香港城邦论 [M]. 香港: 天窗出版有限公司, 2012: 174-175.
- [29] 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426.
- [30] 庞琴, 蒋帆. “他者”在香港青年大学生国家认同感中的作用: 北京香港两地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实证比较研究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6): 147-158.
- [31] 李峻石. 何故为敌: 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 [M]. 吴秀杰,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21.
- [32] 庄吟茜. 论台港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他者”想象下的社会撕裂与对抗 [J]. 台湾研究集刊, 2016 (4): 7-14.
- [33] Tarrow, Sidney G..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1.
- [34] Della Porta, Donatella,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M]. Oxford, UK; Malden, Mass: Blackwell, 2007: 170-178.
- [35] 郑士庭. 人民锐评 | 珍惜香港的前途命运 [EB/OL]. (2019-11-10) [2020-04-2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9821991789528921&wfr=spider&for=pc>.
- [36] Kaeding, Malte Philipp. Resisting Chinese Influence: Social Movement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J]. Current History, 2015 (773): 210-216.
- [37] 田飞龙. 香港政改闯关的故事 [G] // 田飞龙. 视角: 香港回归二十年.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17: 59.

责任编辑: 孙德魁

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异化及其化解途径

赵 浚 陈祉杉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摘 要：近年来，香港本土主义思潮起伏鲜明、波动频繁，摆脱了原有文化属性，日益显现出极端化、合流化、西化的新趋势，发生明显异化。异化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不断冲击“一国两制”实践，挑战“一国”底线，危害香港自身发展。要从国家治理站位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寻求化解之法，正视传统文化的作用，积极寻求共同价值底蕴，重构香港核心价值观；注重网络教育和社会教育，引导香港激进青年回归正途；加强香港治理，维护法治传统，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关键词：香港；“港独”；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一国两制”

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3-0062-06

社会思潮作为一种自发性兴起的、政治色彩浓烈的、具有特定群体性特征的思想浪潮，植根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政治指向^[1]。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已发生明显异化，不能再视之为单纯的文化思潮，要窥见其中分离主义的政治意图和“颜色革命”的危险。国内学者多从历史渊源、问题归因、对香港青年的影响等方面探讨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对其持批判态度已成学界共识。分析近来暴力乱港系列活动，把握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的异化趋势，剖析其对“一国两制”实践的冲击，提出化解之法尤为重要。

一、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异化的新趋势

原本衍生于文化保育领域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潮，近年发生明显政治性转变，不再以维护香港利益为宗旨，表现出极端化、合流化、西化的新趋势。

（一）极端化

起初，香港本土主义思潮诞生于文化保育领域，有极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沿革。香港社会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0.03.006

作者简介：赵浚，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祉杉，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宣传部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018XZD05）

引用格式：赵浚，陈祉杉. 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异化及其化解途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3）：62-67.

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特点，也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在疏离教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年轻人，缺失深厚的文化根基，缺乏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甚至对香港整体性的存在意义感到迷惘。正是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促使香港本土意识觉醒和“香港人优先”的文化保育口号出现。实际上，这其中蕴含着香港本土开始排斥、脱离内地的文化倾向。

随着内地的不断发展，香港的原有比较优势不再突出。香港自身发展速度的放缓和港人精神世界的迷惘，导致香港本土主义思潮日益极端化。自《香港城邦论》伊始，香港本土主义就明目张胆地脱离原有文化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港独”势力奉行“勇武”理念，严重危害居民的正常生活，这是香港本土主义思潮极端化的重要表征。他们丑化、抹黑中央政府，侮辱国旗、国徽，利用“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对应“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差异归结为绝对的二元对立。香港激进势力不总结香港自身发展问题，一味将香港困境归因为内地发展带给香港的不利影响。在香港与内地绝对二元对立的思想下，香港激进势力将“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的思维逻辑奉为圭臬^[2]，向民众灌输只有通过抗争才能争取到社会公义与美好生活的谬论，导致香港部分民众和青年走上街头，参与“乱港暴动”。

将香港的全部历史归结为“香港城邦”的历史，鼓吹香港“独立”，频频发起暴力事端是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的另一极端化表现。一些“港独”分子公然以“脱北者”自诩，认为香港人具有现代化“公民”的特质，与强调血缘纽带的中华民族具有本质区别；企图以“香港公民”称谓将香港人从中华民族中“独立”出来。自“修例风波”以来，“港独”极端势力假借和平集会上街游行，并逐渐使之演变成暴力冲突事件；包围和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肆意侮辱国旗、国徽和区旗、区徽，仇视甚至敌对中央政府，极力侮辱国家和民族形象。

（二）合流化

自非法“占中”到2019年8月香港多次爆发的暴力乱港事件，显示出香港本土主义已与分离主义相互交融。在长期政策性隔绝下成长起来的香港人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淡漠，在香港回归前深受国际反殖民主义、民族独立主义等思潮影响，对摆脱“殖民”和当家作主有强烈的渴望。香港回归后，与内地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观的差异，为香港本土主义与分离主义的结合埋下历史伏笔。香港人在精神世界的迷失和对未来发展恐惧的双重压抑下，激发了对自我保护的强烈欲望，“本地人优先”的本土主义演化为针对内地的、带有明显分离主义意图和“颜色革命”危险的社会意识形态。

一时间，否认中华民族、大肆鼓吹“香港民族”的论调凸显。“香港民族论”是香港本土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合流的产物。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现代社会的民族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种族，指的是拥有共同价值信念和相互契合意愿的公民族群^[3]。激进的香港本土主义者宣称“香港民族、命运自决”，强调港人具有所谓的“共同价值认同”，实质是间接绑架民众意愿。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与公民民族主义的结合既能煽动港人，又能迎合“港独”主义者“独立建国”的无耻要求^[4]。

香港本土主义的再度觉醒与席卷欧美的逆全球化浪潮有深刻联系。以“反移民”为主要特征的本土主义对今天欧洲和美国的影响迅速增强，从社会思潮逐渐向社会运动发展，并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其政治版图^[5]，逐渐演变为一股逆全球化潮流。过度提倡主体性、盲目排外与自我封闭，是本土主义的共性特征，也是香港本土主义与世界逆全球化浪潮融合的主要特征。随着香港本土主义日

益激烈，隐匿在“我是香港人”口号之下的自大与排外的社会心理逐渐显现出来。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妄图迎合欧美国家对华掀起的逆全球化潮流，排斥内地人来港，丑化抹黑中央政府。

（三）西化

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几经演化变成支撑“港独”、西方势力的西化思潮。近年来，香港本土主义思潮性质已经发生明确转变。暴力乱港事件屡见不鲜，无论是“7·14”暴力袭警事件，还是冲击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大楼，抑或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掀起混战，这些主张所谓“爱港”“愿香港平安”的“港独”势力实际上却是事端的制造者。香港本土主义运动假借“保护香港利益”之名，实际上却行损害香港利益之事，沦为西方国家操控香港局势的工具。

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极易导致香港本土主义思潮西化。主张“港人优先”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一直标榜香港是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然而，对香港社会何以先进、香港文明何以优先等一系列问题都未加论证。曾名列“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是亚洲经济腾飞的标志，一跃达到发达城市水平。香港回归之初，内地与香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使港人形成香港优越的心理。但窥探其实质，香港“先进文明”论调与资本主义优先的逻辑预设如出一辙。“港人优先”实际包含着“资本主义优先”的荒谬信条，暗含香港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文明的疯狂崇拜。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固然是人类发展的结果，有闪耀人类智慧的优越之处，但如果对其一味崇拜，香港就会丧失“我之为我”的内在规定性，必然会出现西化的趋势。

当前的香港本土主义呈现“颜色革命”的趋势。所谓“颜色革命”就是在美国及其盟友的指导和策划下，发动的颠覆其他国家政权的反政府武装革命。一些西方政客以双重标准看待香港发生的暴力违法行径，借题发挥，企图借此抹黑中国甚至遏制中国发展^[6]。纵观暴力乱港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各种舆论造势，将“修例风波”作为突破事件，不惜重金培植亲美势力，策划多起暴力事件，丑化中国中央政府，以达到搅乱香港局势、阻碍中国发展的目的。香港的激进本土主义运动、激进的“港独”运动不是西方社会媒体报道的所谓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正义斗争，而是一场在西方势力策划下的培植亲美势力、企图推翻国家政权的霸权主义政治变革。对西方价值观念的盲目崇拜不会带来香港社会自身的真正发展，只能导致其日益西化，成为西方世界的附庸。

二、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异化对“一国两制”实践的冲击

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异化对“一国两制”实践造成冲击，不断威胁国家安全，危害香港局势，撕裂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文化纽带。

（一）威胁国家安全

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异化不断挑战“一国”底线，对我国政治安全造成影响。“一国两制”是我国为解决国家统一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提出的伟大构想，取得了一系列实践成果。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中，“一国”是根本与保障。只有拥护“一国”的前提才能保障香港的繁荣发展。近来，香港本土主义不再满足原有的文化领域活动范畴，提出“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的口号，带有明显分裂祖国的意图和政治倾向。“港独”势力对香港的分裂意图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违背“一国”前提。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与“港独”势力逐步融为一体，严重腐蚀香港市民“一个中国”的政治认同；诱导民众参与非法集会，并逐步开展暴力活动，不断挑战“一国”的政治底线，将香港局势置

于危险境地。

香港本土主义自身优越感导致其对“两制”的偏差理解，严重威胁国家制度安全。一方面，香港激进势力将城市的发展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主张“港人优先”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对西方制度及文明盲目崇拜，将民主和自由的渴求逐步政治化，进而否定内地政治制度，加剧对内地社会主义制度的抵触。另一方面，他们混淆“高度自治”与“绝对自治”的概念，将“授权治理”理解为“分权治理”，认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治的政治体，严重降低了港人的国家认同感。他们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帜，妄图将香港的命运交给“票决民主”，将企图分裂国家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包装。“港独”分裂活动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安全的延伸性破坏^[7]。

沦为“颜色革命”工具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对我国国土安全构成潜在威胁。香港本土主义思潮虽以“维护香港权益”为借口，实际上不惜牺牲香港自身的安定与团结来追随西方国家。为西方阵营服务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潮，扮演着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前站。香港本土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多方势力不断介入香港局势，助长国际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咽喉重镇，在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有重要位置。香港局势的复杂化映射着整个国际局势的复杂化。

（二）危害香港自身发展

香港经济发展水平曾经享誉世界是不争的事实，但随着内地不断深化改革、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香港在中外经贸关系中的相对优势地位被打破。此后的香港仍固守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导致其经济在世界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逐渐走向衰落。香港本土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暴力乱港事件时有发生，损害公物、逼停地铁、阻塞交通等一系列祸港行径，严重阻碍了香港经济的正常运行。香港激进本土主义运动不仅无法扭转香港经济下行局势，还进一步恶化了香港的经济生态。香港社会的稳定性和安全系数降低导致海外投资者纷纷撤资，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影响。因此，香港激进本土主义不仅没有解决香港发展内部动力不足的问题，反而致使香港面对严峻的外部压力。

香港有着极其特殊的政治结构，在政治体制上保持“行政主导”的体制。为回应港人对“民主和自由”的强烈诉求，基本法和行政体制中增设了许多保障，构成了香港回归后的独特“自由权威政体”^[8]。从政治权利分配角度来讲，权威体的存在是坚决维护中央政府的爱国力量，而自由体的存在依赖于民调与民意的支撑。然而近年来，自由体的存在成为一部分反对力量的掩体，将民主和自由的诉求过度政治化包装，使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变成鼓动群众的舆论工具与政治借口。香港激进本土主义运动不断撕扯“自由权威体”，致使自由体不断冲击权威体，政治斗争不断，恶化香港政治局势。香港本土主义将斗争矛头错误地指向内地，是不可能解决香港社会现实问题的。

（三）损害香港与内地间文化纽带

香港本土主义思潮诞生在香港受殖民统治的早期。英国政府将香港定位为新开垦的自由市场，对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联系并不过多干预。这一时期，香港先后迎来四波“难民潮”，促进了内地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外来移民与本土港人有共同文化底蕴，加之自由市场所倡导的包容和平等文化氛围，极大催生了内地人“反把他乡当故乡”的情结。在乡客情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支撑下，香港诞生了具有抗争思想的本土意识。

香港激进本土主义者通过建构港人现代性“公民”的观念，否定香港人心中中华民族的概念。

香港激进本土主义者夸大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对立关系，刻画完全斗争的“自我与他者”认同，妄图淡化中华民族情感，割裂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文化联系。文化是维系两地居民感情的纽带，即便是香港受殖民统治 150 余年也无法割舍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今，香港激进本土主义者盲目否定中国发展模式，不惜割裂与中华文化的亲缘关系和纽带联系，片面追求欧美发展模式，从思想文化和历史根基上削弱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将损害共同的文化和情感基础。

香港与内地之间本身存在着资本主义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成为维系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文化纽带。撕裂港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无疑是在历史文化领域将香港与内地相互剥离。香港社会的文化空位必会导致各种势力涌入，使香港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在于香港人，香港的回归不仅是指领土的回归，更需人心的回归。要加强和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联系纽带，助力维系香港局势、稳定民心。

三、化解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冲击的途径

面对当下香港局势，要正视传统文化的作用，积极寻求共同价值底蕴，重构香港核心价值观；注重网络教育和社会教育，引导香港激进青年回归正途；加强香港治理，维护法治传统，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一）寻求共同价值底蕴，重构香港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是香港社会无法否认也无法割舍的价值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内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时刻影响着港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要高扬爱国主义传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底蕴，引导港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利益观和是非观。找寻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共同价值底蕴，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摒弃西方普世价值观，打造符合香港特质的价值底蕴。社会核心价值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文化价值底蕴，体现着人们思想的一致性，是特定国家和地区所秉持的共同价值追求。只有以共同价值底蕴为通道，打破当下香港本土主义构造的香港与内地之间完全对立、绝对斗争关系，重塑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重建文化根基，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消除隔阂。

（二）加强对香港青年的良性引导，敦促香港激进青年回归正途

在“颜色革命”中，青年群体往往成为敌对势力竭力争取和积极利用的对象，青年群体的政治意识将深刻影响一国政治发展走向^[9]。当前解决香港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加强对香港青年的良性引导，扭转错误思潮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加强网络主流舆论建设与引导，打破香港激进青年密闭交流群组。从近年的形势来看，香港激进本土主义以网络为基础，形成数个发展流派，并将网络打造为主要舆论基地，明目张胆地构建“港独”群组，时常发起“街头运动”，甚至出现一些极端行动。香港青年中出现群体性的迷茫与狂躁，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香港青年的良性引导和爱国主义教育尤其要注意发挥网络的引导作用。要通过网络将思想教育进行现代化和艺术化的处理，使之能切实地对香港青年发挥影响。要善于把握和利用现代化手段对网络舆论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引导，在网络上抵制“颜色革命”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要强化国民教育，敦促香港激进青年回归正途。对他们的教育绝不能局限于校园教育，家庭和

社会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解构香港部分青年错误观念和激进思想，不仅要排除阻力推行香港国民教育和“去殖民化”教育，还要在香港社会成员中推行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植民族认同感，增强国家意识。面对复杂的香港局势和风云跌宕的思潮涌动，要回应香港社会提出的合理诉求，引导香港青年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

（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维系香港局势稳定

香港激进本土主义思潮的症结在于将香港与内地完全对立，认为“高度自治”是“完全自治”，试图将香港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剥离出来。包括“修例风波”在内的一系列暴力乱港行动，打破了维持香港局势稳定的“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平衡。港内外“反华”“反共”力量联手以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为工具鼓动民众参与乱港行动。从当前来看，仅凭香港特区政府力量难以有效治理，必须站在国家治理的全局处理香港局势，坚定维护中央权威，守住“一国”底线，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得到全面准确贯彻。

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是“一国两制”方针法律化的集中体现，是特别行政区一切制度的最顶层设计，在特别行政区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10]。针对香港出现的乱象，要坚持依法治港，加强执法力量，弘扬法治传统，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依法治港先要整治暴乱分子，维护法治尊严。对任何侵犯法律尊严、挑战国家权威、危害香港发展的行为必须予以严惩。

参考文献：

- [1] 张澍军. 论社会思潮的发生机制 [J]. 东北师大学报, 1992 (3): 1-6.
- [2] 郑湘萍, 徐海波. 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辨析 [J]. 理论研究, 2016 (3): 63-70.
- [3] 白建灵. 试论民族共同体的性质、内容及其形成——对所谓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的质疑 [J]. 青海民族研究, 2008 (2): 13-19.
- [4] 姚嘉洵, 孙晓晖. “香港民族论”思潮对香港核心价值观的消解及其应对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4): 58-63.
- [5] 魏南枝. 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与走向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5): 12-18.
- [6] 陈静, 吴丹妮, 李奥, 等. 特稿: 双重标准暴露伪善 肆意抹黑包藏祸心——多国专家剖析一些西方势力涉港“双标”行径 [EB/OL]. (2019-10-31) [2020-04-20]. http://www.xinhuanet.com/2019-10/31/c_1125173771.htm.
- [7] 杨华峰. 国家安全视角下“港独”意识的流变及其应对 [J]. 岭南学刊, 2017 (5): 17-22+30.
- [8] 刘兆佳.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J]. 港澳研究, 2020 (1): 3-12+93.
- [9] 阚道远. “颜色革命”的新趋势新特征及其政治影响——兼论防范重大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风险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9 (7): 16-21.
- [10]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3-4.

责任编辑: 孙德魁

疫情中生鲜电商的机遇、问题与对策： 在线新经济视角

李勇坚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摘要: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 生鲜电商获得了快速发展。生鲜电商的崛起是在线新经济崛起的一个缩影。以“无接触配送”为特征的生鲜电商在未来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将成为电商领域的一个新增长点。生鲜电商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渗透率低, 发展空间较大; 符合后疫情时代的生活发展趋势; 受到国际各大电商平台的青睐。未来生鲜电商的发展, 仍需解决生鲜电商低客单价与高配送成本、品质多元化与质量标准缺失、电商平台的技术属性与供应链管理复杂性等多对矛盾。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生鲜电商; 电商模式创新; 在线新经济

中图分类号: F7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0) 03-0068-08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突袭中国, 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在抗击疫情过程中, 一些城市和地区为避免疫情扩散而采取“封城”“封小区”等措施, 这些措施对居民正常生活产生一定影响。以“无接触配送”“即时配送”等为特征的生鲜电商, 在保障社会基本生活、避免社会恐慌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生鲜电商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生鲜产品的商业模式。生鲜电商的主要模式有: 电商自营平台的 B2C 模式(如京东生鲜等), 平台第三方卖家的 B2C 模式(如天猫生鲜等), “到家模式”(如每日优鲜、京东到家等), “到店+到家”模式(如盒马鲜生等)。此外, 近年来兴起的“社区团购”模式也有一部分涉猎生鲜产品。生鲜电商也在此过程中获得快速发展: 不论下单量还是用户数量, 都实现了快速增长。生鲜电商的快速增长对阻止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持续下降具有一定作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全部电商销售额中, 吃类商品网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0.03.007

作者简介: 李勇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引用格式: 李勇坚. 疫情中生鲜电商的机遇、问题与对策: 在线新经济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3): 68-75.

上零售额的增长率达到 32.7%，成为电商品类中的亮点。

生鲜电商对推动民营鲜活农产品生产企业的复工复产具有重要意义。据不完全统计，全网生鲜产品售卖商家达到 100 万户以上，其中 99%以上为小微民营企业^①。生鲜电商在疫情期间加速增长。除湖北地区之外，生鲜产品卖家大部分都比其他行业提早复工复产。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平台企业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例如，2020 年 2 月 10 日，京东宣布开通“全国生鲜产品绿色通道”，全面开放并倾斜供应链、物流、运营、推广等核心资源，解决滞销生鲜农产品上行问题^[1]；两个星期内，广西桂林永福县沙糖桔累计销售 3 000 吨，全县沙糖桔已售出量超过 65%；江西瑞昌滞销山药单场直播售出 1.2 万斤，超过滞销库存的 30%。

生鲜电商的崛起是疫情期间在线新经济崛起的一个缩影。在疫情期间，由于受到各项管控措施的影响，生鲜电商成为生鲜产品与消费者沟通的绝佳窗口。这带动了以直播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崛起。从传统经济模式来看，2020 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8 580 亿元，同比下降 19.0%，其中 3 月份下降 15.8%，降幅比 1—2 月收窄 4.7 个百分点。从传统的电商经济来看，全国网上零售额 22 169 亿元，同比下降 0.8%，其中作为电商销售主力的穿类商品下降 15.1%。然而，生鲜电商作为在线新经济的代表逆势上涨。QuestMobile 数据显示，生鲜到家在春节后的一个月 MAU（月活跃用户）接近 7 000 万，2019 年同期为 4 400 万，同比增长 59%。同时，日人均使用次数、时长增幅均在 20%以上。生鲜电商销售额增长更快。以上海为例，2020 年一季度生鲜电商销售额达 88 亿元，同比增长 167%，订单量同比增长 80%，每天订单量达 50 万单^[2]。生鲜电商作为在线新经济的代表，为电商网上销售额基本保持平稳提供了支撑。疫情对生鲜电商而言，是一次非常好的客户教育与普及过程，给生鲜电商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从历史来看，2003 年的“非典”是中国的一次“新零售”启蒙。“非典”之后，以实物商品网上售卖为特点、线上线下联动的各种新型零售业态推动了中国零售业向新零售转型，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电商大国。此次疫情给予一直在寻找发展契机的生鲜电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生鲜电商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一、生鲜电商发展的机遇

（一）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我国生鲜电商的发展始于 2005 年，其时商业模式已基本成熟，市场格局也已形成。2012 年之前，生鲜电商主要以垂直专业电商平台为主。自 2012 年起，各大综合性电商平台逐渐加入生鲜电商领域。2015—2016 年，生鲜电商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热点。但之后因大量垂直生鲜电商平台纷纷倒闭，生鲜电商进入消沉期。近几年综合电商平台强势介入，生鲜电商已步入加速发展期，基本形成了“两超一多强一小众”的电商格局。“两超”是指阿里系、京东系综合性电商平台的生鲜业务；“多强”是指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垂直生鲜电商，如每日优鲜、拼多多；“小众”是指具有成长性的特色生鲜电商平台。

^① 数据由作者从各大电商平台调研获得。

表 1 中国生鲜电商的发展历程

阶段	时间	特征	代表性平台
起步期	2005—2009	生鲜电商开始起步；主要依托专业化垂直生鲜电商平台（以水果为代表），水产品销售只占生鲜电商的很小一部分	易果生鲜、天天果园
启动期	2009—2012	生鲜电商逐渐成长，开始出现一批典型的生鲜电商平台；商业模式开始出现创新	中粮我买网、沱沱工社
市场躁动期	2012—2016	大型电商平台开始进入生鲜领域，生鲜电商受到资本市场青睐，出现很多新平台，商业模式创新持续	本来生活网、爱鲜蜂
理性增长期	2016—	大型电商平台开始在生鲜电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大量垂直平台开始倒闭；资本进入冷静期；市场份额开始持续扩大	每日优鲜、盒马鲜生、京东生鲜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网购用户规模。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6.39 亿，占网民整体的 74.8%。相对而言，我国居民家庭的总数大约为 4.5 亿个，按照这个数据计算，我国平均每个家庭已有 1.4 个网购用户，这说明电商已全面渗透到居民生活。2019 年，网上零售额 106 3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5%；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85 239 亿元，增长 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0.7%，比上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美国消费者在网上消费 6 017.5 亿美元（仅指实物商品），比上年的 5 236.4 亿美元增长了 14.9%。我国电子商务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以及较高的电商渗透率，为推动生鲜电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从消费者的偏好来看，我国电商已经过了从网上购买长尾产品^①、作为一个补充购买渠道的阶段，进入到电商成为主流购买渠道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消费者从电商渠道购买的产品开始从服装鞋帽等标准化产品向食品等日用商品转变。自 2018 年开始，我国电商销售的各类商品中，吃的类别增长率开始超过其他所有品类，在所有品类中增长率最高。在 2020 年 1—2 月，中国电商网上销售额首次出现下降，但是吃的类别仍保持了 26.4% 的增长率。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吃的类别已成为我国电商发展的新增长点。而从吃的大类来看，休闲食品的渗透率快速增长。

（二）渗透率低，发展空间较大

生鲜电商总体上还没有全面渗透到居民生活之中。从数据上看，生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总量逐年上升。2018 年全国生鲜电商交易达到 22.54 亿单，交易额达到 814 亿元；2019 年上半年，生鲜电商交易达到 14.04 亿单，交易额达到 535.63 亿元，增速达到 29.8%，比整体电商增速高近 10 个百分点。

^① The Long Tail，或译长尾效应，最初由《连线》的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于 2004 年提出，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Netflix 和 Real.com/Rhapsody 之类的网站的商业和经济模式。它是指那些原来不受重视的销量小但种类多的产品或服务由于总量巨大，累积起来的总收益超过主流产品的现象。在互联网领域，长尾效应尤为显著。

表2 2016—2020年1—2月各类商品网上零售增长率^①

时间	吃：增长率 (%)	穿：增长率 (%)	用：增长率 (%)	全部 (%)
2016	28.50	18.10	28.80	26.20
2017	28.60	20.30	30.80	32.20
2018	33.80	22.00	25.90	23.90
2019	30.90	15.40	19.80	16.50
2020年1—2月	26.40	-18.10	7.50	-3.00

表3 生鲜类分交易类型交易总量、总额及增速^②

时间	交易类型	交易总量 (亿件)	增速 (交易总量, %)	交易总额 (亿元)	增速 (交易总额, %)
2019上半年	B2C	11.51	11.90	453.44	31.50
	C2C	2.53	7.70	82.19	21.30
	合计	14.04		535.63	29.80
2018年	B2C	18.25	24.40	662.76	34.40
	C2C	4.27	3.60	151.18	16.70
	合计	22.52		813.94	30.80

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生鲜电商的总体渗透率非常低，生鲜电商占全部电商销售额的比重在2018年还不到1%，到2019年才上升到超过1%。按照生鲜产品消费口径计算，我国生鲜电商的渗透率^③在2019年仅为5%左右，而同期我国商品零售的总体渗透率达到20.7%，服装鞋帽等整体渗透率超过40%。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生鲜电商的市场空间非常大。而且，近年来生鲜电商增长率一直高于电商整体增长率。

疫情期间，以到家电商为代表的各种生鲜网上售卖开始火爆。大量新用户开始使用生鲜电商，线下用户向线上转移，电商特别是能够提供及时配送服务的生鲜电商订单量暴增，主要到家电商平台在2020年春节期间交易额均产生了200%以上的增长。这很好地教育了消费者，从而为生鲜电商发展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基础。例如，在2020年1月24—31日，福州地区永辉生活到家交易额同比增长600%；而每日优鲜小程序在这个期间的交易额同比增长465%。又如，原来的外卖平台等积极将生鲜配送作为新卖点，饿了么、口碑在疫情期间新增近10万家门店；其北京外卖买菜订单量同比增长9倍，商超订单也同比增长超2倍。其他平台生鲜订单也都有2倍以上的增长。京东到家等原有电商平台吸纳了更多商超入驻，提供更丰富的即时配送服务，生鲜品类增长率超过300%。

（三）将成为电商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2019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06324亿元，增长16.5%。近年来，我国网上零售增长率持续下降。

①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数据整理。

② 数据来源：商务部电子商务大数据。

③ 指生鲜电商销售额占全部生鲜产品销售额的比重。

2015 年我国网上零售额增速首次低于 40%，2016 年增速首次低于 30%，仅为 26.2%^[3]。2017 年，我国网上零售增长率有所回升，达到 32.2%；2018 年增长 23.9%，再次低于 30%；2019 年更是首次低于 20%。这是中国网上零售额的增长率首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电商整体上维持销售额的增长，电商平台维持 GMV 的持续增长，都要开拓新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市场点。生鲜电商具有高频消费、客户粘性强等优势，将成为大电商平台发力的重要着力点。与生鲜电商相关的即时配送、冷链物流、分布式仓储等都将快速发展，这将使我国生鲜电商保持快速增长。

表 4 数据表明，近年来 B2C 生鲜电商的占比越来越高。2019 年上半年 B2C 商业模式的交易单量占比和交易金额占比分别从 2018 年的 81%、81% 上升到 82%、85%。B2C 生鲜电商份额的增加对规范生鲜电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推动生鲜电商快速发展。

表 4 各种交易类型的占比情况^①

时间	交易类型	交易单量占比 (%)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占比 (%)
2019 年 上半年	B2C	0.82	B2C	0.85
	C2C	0.18	C2C	0.15
2018 年	B2C	0.81	B2C	0.81
	C2C	0.19	C2C	0.19

（四）符合后疫情时代的生活发展趋势

生鲜电商能极大降低消费者的购物时间成本，符合现代社会快节奏、低时间成本的购物需求。《上海居民购物行为的时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居民对蔬菜食品类的购物地点选择，其时间成本因子最高为 0.778，而日常用品为 0.635，大型家电为 0.457，高档服装为 0.302^[4]。生鲜产品购物的时间成本非常高。生鲜电商接受用户利用碎片化时间下单，安排专业人员即时配送，极大地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生鲜电商发展还能减少消费者与大量人群密切接触的机会，从而减少疫病的流行。由此次疫情来看，消费者对大量人群的密切接触心有余悸。生鲜电商通过网上接单、无接触配送，使消费者不必到人流密集的超市等地去采购，有助于提高防疫效率。

（五）受到国际各大电商平台的青睐

从国际电商平台发展趋势看，生鲜电商是其近几年大力发展的品类。2007 年亚马逊在西雅图测试生鲜服务，主要提供新鲜食材即时购买及配送服务。但是，直到 2013 年，亚马逊并未拓展其 Amazon Fresh 服务。2016 年起，Amazon Fresh 开始加快扩张步伐，目前已拓展到美国的 20 余个州，并在伦敦、东京、柏林（包括波茨坦）、汉堡和慕尼黑提供服务。Amazon Fresh 的特点是会员订阅服务 Prime Fresh。Prime Fresh 会员可无限制地享受当日送达或次日早晨送达服务——在上午 10 点之前下单，下午 6 点前送达；在晚上 10 点前下单，第二天早晨 6 点前送达。亚马逊在 2016 年下调了订阅费，由 299 美元/年降至 179.88 美元/年。沃尔玛也提供 Walmart Grocery 服务，其特点是“线上下单、

①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商务部电子商务大数据测算得出。

线下自提”。在消费者网上下单后，工作人员将商品打包并存放在超市的冷柜里。消费者在选定的时间到达沃尔玛门店自提，工作人员将商品免费送至停车场的汽车里。在鼓励消费者上门自提的同时，沃尔玛也提供送货上门服务，消费者需要支付一定的配送费。一部分专业生鲜电商平台如 FreshDirect、GrubMarket、GoodEggs、Shipt 也都致力于加大扩张步伐。

二、后疫情时代生鲜电商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从整体上看，后疫情时代生鲜电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也应看到，生鲜电商由于其固有的成本问题、品控问题、供应链问题等，仍面临极大发展困难。电商平台只有采取相应对策，克服这些困难，才能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一）低客单价与高配送成本之间的矛盾

从总体上看，生鲜电商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客单价较低。2019 年上半年，生鲜电商的平均客单价为 38.15 元，其中 B2C 模式为 39.40 元，C2C 模式为 32.49 元。相对我国电商平均客单价 150 元左右的水平，生鲜电商的客单价低得多。此外，生鲜产品的生产企业或农户并没有在加工、包装、物流等诸多方面适应电商发展的需要。这使电商平台在进行生鲜产品销售时，往往会付出更多的额外成本。例如，生鲜流通环节大多复杂繁琐，保证生鲜产品在运输中不变质所需的物流配送成本比较高。虽然客单价提高有限，但从客户的购买频次来看，仍然呈现出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新用户不断拓展，其较低的购买频次拉低了整体的购买频次；另一方面是因为生鲜产品电商在品类拓展等方面较为谨慎，使消费者无法提升购买频次。平台无法通过提高购买频次、扩大销售量、分摊物流设施等固定成本来降低配送成本。这也是在过去几年中，生鲜电商平台尤其是垂直类生鲜电商平台很难实现盈利的重要原因。在海外，同样有一部分生鲜电商平台因成本等问题导致经营困难。例如，Relay Foods（美国五大生鲜电商之一）在 2016 年与 Door to Door Organics 合并以共同应对激烈的竞争。eBay Now 于 2015 年 7 月关闭；Google Express 在 2016 年 9 月取消了生鲜及冷冻食品的配送业务^[5]。2016 年 7 月 13 日，美国著名生鲜电商 Farmigo 在其官网宣布暂停生鲜食材的配送业务，转而专注 CSA 软件和平台的业务。

我国生鲜电商的发展，一方面要拓展产品品类，推动消费者加大产品消费力度，从而提高客单价，降低单位成本；另一方面，要培养消费者习惯，提高其购买频次。有研究者通过对江浙沪消费者网购生鲜产品的调查发现：女性消费者网购生鲜产品的频次明显高于男性消费者，已婚的江浙沪地区居民网购生鲜产品的频次明显高于未婚消费者。将已婚女性作为主力消费群，通过对网页的设计以及网站的一些个性化、动态化的促销手段抓住已婚女性的消费心理^[6]，将是生鲜电商的一个重要发展策略。

（二）品质多元化与质量标准缺失之间的矛盾

生鲜电商发展需要在产品质量评估、售后服务等诸多方面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交易信用体系。但是，生鲜产品本身的质量标准缺失、售后服务体系建立困难等因素，使生鲜电商的交易信用体系仍有较大完善空间。鲜活易腐商品不在 7 日无理由退货范围，这对交易信用体系的要求更高。2019 年

以来，盒马鲜生、顺丰优选等曾因食材品质不合格或不新鲜出现过风波。6月12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召开“买菜APP”相关企业责任约谈会。叮咚买菜、盒马鲜生等7家平台到场接受约谈。其中，平台商品重量缺失、包装不够环保、水产农残超标等问题被要求整改。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收到的用户维权案例显示，生鲜新零售被投诉问题主要聚焦在：商品质量问题、以次充好、久未发货、物流延迟、下单容易取消难、退款难且款项未及时退回、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差等7个方面。

生鲜产品本身的特点使其品质容易受到多方面影响。生鲜产品电商必须提高从生产加工、包装到仓储、配送各个环节的标准化程度，以保证生鲜产品的品质。生产企业、合作社及电商平台、相关协会等社会行业组织，应研究建立生鲜产品电商的相关标准体系，推动生鲜产品电商发展符合标准化方向。建立生鲜产品更多维度的数据系统，以短视频、直播等更丰富的手段，向消费者展示与产品有关的丰富数据。积极推进溯源体系建设，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同时，打造生鲜产品品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品牌化程度。还应看到消费者对全球高品质生鲜产品的需求，建立全球直采体系，从全球各地进口更多的优质生鲜产品，推动生鲜产品跨境电商的发展。

在政府监管层面，要全面落实《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等与生鲜电商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应政策措施。根据生鲜电商的特点，建立符合生鲜产品电商特色的监管体系。例如，针对电商经营者通过短视频、直播等信息流的方式销售生鲜产品，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通过社会各界努力，破解生鲜电商的物流难题。

（三）电商平台的技术属性与供应链管理复杂性之间的矛盾

生鲜产品的生产、运输等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生鲜产品生产过程的投入品可能影响产品的最终品质，但是电商平台很难实现对生产投入品的全程监控。又如，生鲜产品从田间到电商仓库的过程，涉及收割、田间粗整理、分拣、运输等过程，这些过程都会对产品的品质产生影响。这说明生鲜产品与标准化的工业产品的性质有本质区别。这要求更复杂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和技术。电商平台的技术属性主要是信息技术，在处理客户大数据、跟踪订单、调度资源方面具有优势。而从事生鲜供应链管理，除少数电商平台之外，大多数电商平台都难以胜任。因此，当生鲜电商规模持续扩大时，电商平台就会面临巨大压力。

生鲜电商商业模式的创新是一个很好的出路。例如，以美国 Instacart 为代表的轻资产生鲜电商模式，电商平台主要为线下商店或线上卖家提供电子商务运营、配送等多种服务，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Instacart 通过和 Whole Foods、Costco 等实体便利店合作，为用户提供 1 小时内送达的送货上门服务。用户可以在单个或不同的店铺内选择产品，由专人进行统一购买和配送，商品价格和店内保持一致，平台对用户只收取运费。Instacart 模式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没有自己的库存，自己负责搭建平台，上游接入线下实体店，下游接入消费者，消费者下单后，Instacart 负责去离消费者最近的实体店取货并送到消费者家中；二是众包物流，Instacart 没有自建物流，也没有利用第三方物流，而是采取众包模式，通过整合社会闲散运力来安排配送服务^[5]。从发展过程看，Instacart 在 2012 年成立后受到了多方追捧，到 2016 年时估值已达 20 亿美元。之后，其商业模式曾受到质疑。

但该公司的营业额与估值仍保持着较快的增长，目前其市值约为 80 亿美元。

另一种模式是电商平台与生鲜供应链专业管理企业合作，共同拓展电商市场。电商平台发挥客户优势、技术优势等，与生鲜供应链管理企业合作，也能够实现较快发展。例如，京东生鲜借力味库海鲜供应链，解决了海鲜供应过程中的暂养、包装、配送、周转等各个环节，在全国部分城市实现了鲜活海产网购闪电送到家。

（四）商业模式创新与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之间的矛盾

近几年，生鲜电商商业模式持续创新，除了 B2C 平台销售、第三方平台销售、“到家”模式、“到店+到家”模式等外，还衍生出社区团购、“电子菜箱”、“智能菜柜”、农业众筹、CSA（社区支持农业）等创新模式。创新模式要求有新的基础设施，如冷链物流选装。中国冷链物流普及程度不高，区域发展不均衡，导致生鲜产品电商无法普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冷链仓储设施供应量明显不足。2016 年，中国现有的冷库容量为人均 0.14 立方米，而全球为人均 0.20 立方米^[7]。在美国和日本，平均每千人拥有 1 辆公路冷藏车，而国内每 1 万人才拥有 1 辆。发达国家预冷保鲜率为 80%~100%，冷藏运输率为 80%~90%，冷藏保温汽车占货运汽车比例为 1%~3%，而中国分别为 30%、10%~20%、0.3%。而且，中国冷链物流设施与水产品电商的需求也不能匹配，冷链体系配置仅能在极少数大城市实现。据统计，中国综合冷链应用率仅为 19%，水产品冷链流通率为 41%，冷藏运输率为 69%。在水产品的流通过程中，质量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商品损耗率高，损腐率高达 15%^[8]，预计流通损耗超过 700 万吨。在生鲜物流的最后一公里方面，现有的智能快递柜不能满足生鲜电商需求。这使生鲜电商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根据生鲜电商的发展需求，做好生鲜产品产地包装、冷链物流、智能快递柜等方面的工作，将是生鲜电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 [1] 李雪钦. 生鲜电商力保“菜篮子”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0-02-21 (8).
- [2] 全市生鲜电商交易额 88 亿元云上时装周销售超 5 亿元 一季度在线新经济逆势活跃! [EB/OL]. (2020-04-14) [2020-04-20]. <http://www.shpt.gov.cn/shpt/shxxdt-yaowen/20200414/487392.html>.
- [3] 史吉霞. 基于 EVA 阿里巴巴的企业价值评估研究 [D]. 沈阳: 沈阳理工大学, 2018.
- [4] 柴彦威, 沈洁, 翁桂兰. 上海居民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J]. 经济地理, 2008 (2): 221-227.
- [5] 闫德利. 供应链创新驱动生鲜电商快速发展 [J]. 中国信息化, 2017 (2): 94-96.
- [6] 李怡芳, 韩笑. 生鲜水产品电商的发展对策 [J]. 商场现代化, 2016 (28): 15-16.
- [7] 史耀广, 刘斌. 浅谈新形势下普通高校冷链物流人才培养研究 [J]. 物流工程与管理, 2019 (11): 140-142.
- [8] 安凌飞. 水产品损耗率偏高 物流提升空间大 [N]. 中国商报, 2015-07-31.

责任编辑：孙德魁

疫情对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及应对

郭朝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44)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开放稳定安全运行构成极大威胁, 叠加“逆全球化”思潮、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升级,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面临多维度冲击。为有效应对疫情和防止疫情对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产生损毁性打击, 我国应利用大国效应和发挥先行者优势, 稳住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 努力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重塑中占据优势地位。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电子信息制造业; 全球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 F4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0) 03-0076-06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世界人民生命健康构成极大威胁, 而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极大冲击, 全球经济有陷入衰退的危险。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最深的产业, 是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之一。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采取相应对策化解疫情冲击甚至转危为机, 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疫情及其关联事件对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产生的冲击是多维度的: 从供需维度来看,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既面临着前期国内生产线复工复产困难, 也面临着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需求端重启尤其是外需端恢复困难; 从时间维度来看, 疫情对产业的冲击并非一次性的, 而是分阶段、多批次的。第一波是疫情带来的“休克停摆效应”, 第二波是在经济停摆之后因重启而产生的成本冲击, 第三波是疫情全球蔓延和“全球大流行”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休克停摆的冲击。

与其他产业相比,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疫情面前显得更加脆弱。一是资金流紧张。一般来说,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0.03.008

作者简介: 郭朝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产业组织研究室主任,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全球创新链的调整及其影响研究”(19AJY013)

引用格式: 郭朝先. 疫情对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及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3): 76-81.

在停工停产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现金流很难支撑 3 个月。当前，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平均资产利润率仅为 4.7%，和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基准利率水平相当。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应收账款拖欠长期居行业前三位。其中，民营企业不仅应收账款规模较大，而且回收期较长，普遍在 3 个月以上，甚至 6 个月及以上。二是产业生态脆弱。据测算，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民营企业数量占比为 45.7%，资产占比为 14.7%，营业收入占比 16.7%，财务费用占比 17.6%，利润总额占比 18.5%；小微企业数量占比为 70.6%，资产占比为 15.3%，营业收入占比 13.2%，但是财务费用占比高达 26.4%，利润总额占比只有 12.7%。可见，数量庞大的中小民营电子信息制造企业规模小、体质弱。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停工停产、交通封闭等措施，会影响整个产业链的正常运转。

疫情及其持续蔓延对全球产业链来说是一次带有破坏性试验效果的压力测试。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举足轻重。数据表明，我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总产值在全球占比高达 49%，消费额占比 38%，出口占比 30%，中间品贸易占比 28%^[1]。中国在前期抗疫阶段，适值春节，企业复工复产困难，使电子信息制造业全球产业链紧绷，不少跨国公司生产线受到较大影响。IHS Markit 的报告称，中国占全球显示屏产能的一半以上，武汉有五家工厂生产 LCD 液晶显示器和 OLED 面板。疫情之下的武汉一度“封城”和全国范围内的延迟返工，造成显示屏面板价格上涨，初步估计每块面板的价格可能会上涨 1 至 2 美元，最高可能会升至 3 至 5 美元^[2]。随着海外疫情的蔓延，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内的全球供应链暂时中断的风险仍在加剧。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很多原材料等上游供应都来自日韩，如在半导体存储领域，SK 海力士和三星占据全球市场的 70%；日本企业在硅晶圆材料、光罩、靶材等重要的细分子领域，所占份额都多达 50%以上^[3]。在海外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之前，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一环，会受到供应链上游的严重制约。

疫情影响显然不止于产业和经济层面，各国政府、跨国公司和专家学者也在思考其他层面的问题，并可能采取相应措施：

一是反思全球化的风险。一些学者认为疫情正在侵蚀全球化，部分国家出现向内转向的趋势，以寻求对本国命运的自主权和控制权。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Laurie Garrett 认为，本次疫情对世界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根本性冲击，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与分销网络极易遭到破坏^[4]。全球化使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并及时地将产品投入市场，从而降低仓储成本。但新冠肺炎疫情表明，病原体不仅会感染人类，而且能够破坏整个实时生产系统。因此，全球资本主义可能会进入一个戏剧性新阶段：为免未来可能遭受的破坏，供应链会更靠近国内且充斥剩余。这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短期利润，但会使整个系统更具弹性。

二是归因错误，指责中国政府隐瞒信息并有意与中国“切割”。一些国家的政客将本国因疫情防控不力而导致的疫情扩散，错误归因于中国政府，甚至攻击中国体制。这明显是将一个不断发展的医学认识问题错误归因于政治问题，但这种思想在某些国家很有市场。这对中国产品出口和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行为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 响。最明显的是，美国、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明确表示将对本国企业撤离中国提供“搬家费”。日本甚至已经制定了 22 亿美元帮助在华日企撤出中国的资金资助计划^[5]。

三是美国政府利用疫情做文章，对我国发起新一轮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并有可能联合一些盟国，形成对中国的“围剿”态势。这致使全球电子信息供应链受到疫情和政治的双重打击。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动作频频，对我国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巨大压力。2020年1月1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企业的可穿戴监测设备、系统及其组件发起337调查^[6]。1月31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公开说，中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利于美国，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访问英国，以继续施压阻碍华为参与英国5G建设。2月13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份联邦起诉书，指控华为犯敲诈勒索罪，并密谋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被告包括华为及其4家子公司，还有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7]。美国商务部正在部署修改长臂管辖规则，将管控范围从美国技术占比的25%降到10%。这项规则一旦实施，意味着大量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元器件将无法供应中国企业。而在2019年华为采购的来自日本、韩国等的元器件总金额超过200亿美元，增长50%以上^[8]。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华为的限制措施再次升级：要求采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生产出的芯片，必须先经过美国批准才能出售给华为。

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思潮、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升级，使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链继续承压。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限制趋于升级，对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应利用大国效应和先行者优势，稳住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

针对未来全球产业链因受疫情冲击如何发展的问题，国内外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即将终结。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Robin Niblett 认为，一旦各国再无意愿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迅速萎缩^[4]。另一种观点认为，疫情只是在经济“逆全球化”过程中增加了一个短期影响因素而已，并不构成影响全球产业链发展走向的根本因素。部分学者更乐观，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 Kishore Mahbubani 认为，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方向，它只会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4]。为此，我们既要有底线思维，预防最坏的情况出现，也要向着有利的方向努力。为防止全球化退潮，我国应充分发挥大国效应和先行者优势，稳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就电子信息制造业而言，要充分利用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大国的优势和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以及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有利形势，防止疫情对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产生损毁性打击，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重构中赢得先机。

（一）利用大国效应，稳住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

目前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了以中国和美国为双核心的“哑铃型”结构，并呈现三个互相关联的图景^[9]：第一，从全球价值链的供给角度看，中国是全球生产中心，美国是全球技术和价值中心；第二，从全球价值链的需求角度看，中国是投资中心，美国是消费中心；第三，从国际市场看，中国是出口中心，美国是进口中心。在中美构成的“哑铃型”全球价值链的中间地带，广泛分布着第二梯队的发达国家和第三梯队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新兴生产国，这些国家以不同方式联系中国和美国两个中心，获得自身的产业利益和发展机遇。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与美国在全球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全球价值链上获益不对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

品，中国只获得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 46.4%，美国获得 7.1%，而第三方（德国、日本、韩国等）获得 46.4%；相反，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美国可获得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 87.4%，中国获得 4.3%，而第三方仅获得 8.3%（基于 2014 年的数据测算）。在全球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全球价值链上，第三方获益是最多的。尽管中国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按传统国际贸易统计），但从全球价值链增加值份额来看，中国获得 39.2%的收益，美国获得 7.7%的收益，而第三方获得 53.1%的收益。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虽规模大，但获益不多。中国的生产贡献使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具有某种程度的“刚性”，对防止疫情损毁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发挥先行者优势，稳住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

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欧美等地成了疫情重灾区。我国充分利用制造业大国的产能优势和控制疫情蔓延的先行者优势，不仅可以稳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甚至还可以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重塑中占据优势地位。当前，我国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形成或即将形成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集群，超过 80%的电子制造相关配套零部件是本地生产的^[9]。这种集群化的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显现了竞争力，成为重构全球产业链的先声。以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本次抗疫中大显身手，凸显电子信息产业在我国的广泛应用前景。我国完全可以通过大力推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发展，带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和中国经济走出疫情冲击。

三、长短兼顾、多措并举，助推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出疫情

当前需要提防的是，疫情这种一次性的、短期的剧烈冲击演变成趋势性、系统性、内生性和中长期的冲击。对电子信息制造业而言，要同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国产业保卫战和全球产业链保卫战这“三场战役”。为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对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影响，政策的重点应在对冲疫情短期的巨大冲击外，兼顾产业长期发展。

（一）围绕电子信息产业链加强服务，促进企业复工复产

当前，各地正在有序推动复工复产，考虑到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应优先复工复产。尤其是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重点出口企业和关键环节应加快恢复生产供应，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由于产业链环环相扣，要推动重点企业、龙头企业和配套企业协同复工复产，提高产业链复工复产的系统性、协同性。有关部门在实施税收、信贷、社保、发债、租金、水电气费等优惠政策时，可考虑面向整个产业链条，即对整个产业链条上的所有受损企业都进行评估和救助。以金融服务为例，可以考虑以下措施：第一，鼓励银行机构以核心企业为依托，根据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等信息，为核心企业及上下游的小微企业提供全链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第二，加大对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鼓励核心企业以适当方式减少对上下游企业的资金占用，为下游企业提供延期付款的便利。政府要加强信贷资金监测，促进核心企业提高对上游企业的支付效率。第三，完善跨境金融服务链条，中国金融机构要与境外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为稳定全球产业链提供信用支持和融资服务。第四，提升产业链的金融服务科技水平，鼓励银行开发专门的信贷软件和信息系统，与核心企业深化合作，在系统对接、

信息共享、资金监控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

（二）稳定中小型电子信息企业，避免破坏产业生态

当前，要警惕可能发生的部分债务违约、部分企业倒闭、部分员工失业等情况。这就要高度重视保护产业生态，保护产业链供应链，尤其要保护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要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力度，保障企业资金的合理需求，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重点保障产业链关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的资金需求，在贷款利率、期限等方面给予相应优惠政策，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贷款方式。对企业“续贷”“转贷”提供政策支持，并做到“无缝”衔接。鼓励产业链主导企业对其上游供应企业支付未交货订单的款项，以贴息支持等方式鼓励产业链主导企业对关联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加大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基金、高新技术产业基金等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全面落实普惠性减税政策，促进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结构性减税。持续打好降成本的“组合拳”，降低用地、用能、物流、交通等成本，控制劳动力工资过快上涨，降低企业社保费率。可考虑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将近期出台的一些救助中小企业的政策，如税费减免、“五险一金”免交或少交等转化为长期性政策。

（三）帮助外向型电子信息企业渡过难关，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大力简化对外经贸管理程序，推进证据电子化和无纸化管理。海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单一窗口”和“互联网+海关”两大平台，推进通关业务全流程网上办理。加强出口信用保险支持，进一步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降低短期险费率，帮助企业应对订单取消、出运拒收等风险。要简化报损、索赔程序。对受疫情影响未及时缴纳保费的出口企业，合理缓交保费，在定损核赔时酌情处理。加强对外贸企业融资支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完善“政府+银行+信保”合作机制，扩大保单融资规模。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帮助企业利用海外仓扩大出口，支持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对资金困难较大的外向型企业除提供租金、社保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外，还可提供出口退税政策或加大出口补贴力度。积极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一大批富有活力、创新力、专业化程度高、协作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培育一批市场渗透力强的国际营销网络，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贸易平台，培育一批外贸自主品牌，推动加工贸易从组装向技术、品牌、服务和营销转变，推动加工贸易、生产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提高外向型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力。支持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促进支持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支持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国内的梯度转移。

（四）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新经济

加快建设以 5G、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加大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产业投资建设力度，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和电子信息制造业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积极丰富 5G 技术应用场景，带动 5G 手机等终端消费，增加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教育、网络医疗等方面的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增加汽车号牌配额，乃至阶段取消配额限制，带动汽车相关电子信息产品消费。同时，应充分将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于企业研发、生产、经营等环节，灵活使用远程办公、柔性制造、无人工厂等方式进行生产经营与合作交流。

（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坚定外资继续在中国发展的信心

以落实《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为契机，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落实好《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做好相关法规规章“立改废”工作，如明确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安全审查、“实际控制”等方面的规定，增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运营的信心。我国目前已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应进一步大幅度缩减负面清单，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进行“引资补链”“引资扩链”，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努力打造一批区域性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链集群。

（六）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拓展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国际空间

应对发达国家可能会采取的“逆全球化”操作，我国可以考虑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开辟“一带一路”新市场以迎来新契机，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具有弹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成为“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重要“代言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实现从单一设备制造商“走出去”转变为设备商与运营商等“抱团”出海的态势。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大型企业以直接投资的形式、中小企业以出口或契约的方式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东道国企业一道深化在生产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乃至国际并购等领域的合作。

参考文献：

- [1] McKinsey & Company. Coronavirus COVID-19 Crisis Response [R/OL]. (2020-02-14) [2020-04-15]. <https://www.mckinsey.com/>.
- [2] 武汉至少有 5 家 LCD 显示器工厂生产放缓，液晶电视价格有望上涨 [EB/OL]. (2020-02-06) [2020-04-20]. <http://www.51touch.com/lcd/news/dynamic/2020/0206/56177.html>.
- [3] 李佳师. 日韩疫情带来不确定性，电子信息制造业应积极应对全球供应链风险 [EB/OL]. (2020-02-28) [2020-04-21]. <http://www.cena.com.cn/industrynews/20200228/105068.html>.
- [4] 12 位世界顶级思想家预测：新冠疫情之后，世界将何去何从？ [EB/OL]. (2020-04-05) [2020-04-28]. https://www.sohu.com/a/385608956_120065710.
- [5] 只要把工厂撤出中国，搬迁费美国政府全包！日本、欧盟也开始了 [EB/OL]. (2020-04-14) [2020-04-28]. https://www.sohu.com/a/387902961_120066136.
- [6] 美国对 7 家公司发起 337 调查，涉及两家中国企业！ [EB/OL]. (2020-01-14) [2020-04-22]. <https://www.esmchina.com/news/6113.html>.
- [7] 张梦旭. 美国政府指控华为敲诈和窃取商业机密 [EB/OL]. (2020-02-14) [2020-04-22].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214/c1002-31586150.html>.
- [8] 魏际刚，刘伟华. 发达经济体供应链战略动向及启示 [N]. 中国经济时报，2020-04-20 (4).
- [9] 黄奇帆：新冠疫情蔓延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三点思考 [EB/OL]. (2020-03-29) [2020-04-2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553298913187253&wfr=spider&for=pc>.

责任编辑：孙德魁

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解构： 基于媒体舆论的政治学分析

陈奕平 关亦佳

(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舆论对华侨华人的态度渐趋负面，形成所谓“华人威胁论”，给当地华社带来较大压力。通过政府报告、政府人士言论以及主流媒体报道，澳大利亚不断渲染“华人威胁论”：所谓中国政府通过华裔“购买”政治影响力；澳大利亚华人政治精英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中国政府通过华社会团体和留学生建构“间谍网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华侨华人支援中国导致澳医疗体系无法高效应对疫情。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感到焦虑，也和澳大利亚政党竞争、澳社会“白澳主义”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密切相关。“华人威胁论”给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发展、中澳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形成意识形态“国际联盟”效应，冲击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应对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既要解构其“华人威胁论”妖魔化中国形象的内核，也要从共享利益和道义的视角来讲述华侨华人对澳大利亚、中澳关系和国际治理的贡献。

关键词：“华人威胁论”；媒体舆论；中澳关系；澳大利亚；美澳同盟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0) 03-0082-09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移民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常见现象。移民与居住国的关系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从19世纪40年代第一批华人踏上澳大利亚开始，华人积极参与澳大利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建设，是其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华人占澳大利亚总人口5.6%，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亚裔少数民族群，也是澳多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

DOI：10.13946/j.cnki.jcquis.2020.03.009

作者简介：陈奕平，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关亦佳，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社区中华文化遗产研究”（16ZDA220）

引用格式：陈奕平，关亦佳. 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解构：基于媒体舆论的政治学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3）：82-90.

（一）研究综述

中澳两国自 1972 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华侨华人与澳大利亚关系研究得到重视，议题包括：华侨华人与澳大利亚的发展，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作用，华侨华人在中澳两国交往中扮演的角色，等等。黄昆章教授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2]从史学描述出发，分四个阶段讲述 1823 至 1995 年期间华人社会的不同特征。同一时期，张秋生教授在其著作《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3]中，回顾历史上中澳两国关系的发展，澳大利亚华工出现原因及生活状况，澳大利亚对华移民政策的演变，澳华人社团的发展变化以及战后华人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变迁。国内学者关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制定、改革、转型与华人移民的关系。张秋生教授认为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制定与其早期排华政策密切相关；20 世纪 70 年代澳大利亚废除“白澳政策”的部分原因是为吸引高技术、高素质华人。国外学者关注华人群体在澳大利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澳大利亚学者 A. J. Grassby 在《中国华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4]中论述了华人对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艾瑞克·罗斯（Eric Rolls）的《旅居者们》^[5]和《澳大利亚华人史（1888—1995）》^[6]将中华文化与华人在澳历史结合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学者开始关注澳大利亚政府、政府人士、智库、媒体对中国的报告、言论、报道。笔者曾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多家智库、报刊媒体为研究对象，论述西方国家炮制的新“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影响^[7]。朱文博探究澳大利亚媒体涉华舆论的转变过程，认为中澳两国关系呈现“整体向好、曲折多变”的特征^[8]。马妍采用文本分析法，将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民意调查报告作为研究材料，从民众、学界以及官方三个层次来研究澳大利亚舆论对中国崛起的认知^[9]。吴前进以中国大陆新移民为研究对象，论证澳大利亚政界和媒体所担忧的“中国威胁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华人威胁”是澳社会想象的结果，威胁并不真实存在^[10]。学者大多关注中澳两国关系中澳大利亚舆论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就近年澳大利亚对华人舆论认知出现的原因及其对华人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拟分析 2017 年至 2020 年初澳大利亚舆论对华人的认知状况，探究当前澳大利亚舆论对华人认知的形成原因、影响与对策。

（二）分析框架

近年来，受中澳两国关系变化、澳大利亚政党竞争、澳社会“白澳主义”以及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等因素影响，澳大利亚舆论对华人的态度出现新变化。澳社会对华人认知日趋负面，“华人威胁论”抬头并逐渐成为舆论主基调。澳大利亚有关华人的舆论报道中，充斥着“中国威胁论”“华人威胁论”“华人间谍论”，还高频次地使用“渗透”“代理人”等词形容华裔、华人政治精英以及中国留学生。20 世纪 80 年代初，德国社会学、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通过实证研究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人们通常会以为大众传播媒介上呈现的意见代表多数人的想法，进而支持该观点^[11]。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观点是狭义、具体化的舆论。本文对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的舆论分析，是对澳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观点进行研究。在大众传播中，政府和媒体由于掌握话语权而成为舆论的制造者、引导者和传播者。当前，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的社会舆论氛围日渐浓厚，与澳政府、政府人士以及主流媒体的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澳社会舆论中“华人威胁论”进行分析，需从政治学视角出发探究澳政府、政府人士和主流媒体炮制“华人威胁论”的内容与动因。

二、当前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的主要内容

2017年之前，澳大利亚媒体对华人的报道聚焦财富，诸如“华人横扫各国奢侈品店”“中国富翁海外买豪宅”等。主流媒体观点多肯定华人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少量负面报道，例如所谓华人投资、购置房产将会使澳大利亚经济缺乏独立性。2017年以来，《悉尼先驱晨报》《时代报》等澳大利亚主要媒体在有关华侨华人的报道中，出现大量带有明显选择性的负面语言，报道内容不再局限于经济。

（一）渲染华商“购买”政治影响力

当前的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报道中，华商被称作所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澳媒体认为华商向澳大利亚主要政党进行政治捐助，将中国势力逐步“渗透”到澳政党中，进而使澳政府作出有损澳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决策。黄向墨是在澳中国商人。澳舆论认为，工党参议员邓森关于“南海问题”的表态和辞职与黄向墨有关。2019年初，黄向墨被澳联邦政府取消永久居留权，理由是澳安全局认为“黄向墨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12]。时任澳议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的自由党籍众议员安德鲁·哈斯蒂在公开场合表态：“澳大利亚已经意识到威权主义国家构成的威胁及其影响和破坏我们民主制度的企图……我们正在转向保护我们的主权。”^[13]澳大利亚主流媒体以及有重要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始终强调黄向墨的政治捐助不是单纯的政治行为。他们认为黄向墨通过捐助政治现金，不断接近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邓森，使其落入金钱陷阱，作出错误表态。面对舆论指责，邓森本人在接受反腐败组织调查时，诬称“黄向墨是中国政府势力的代言人”^[14]。邓森表态成为澳媒体报道的佐证，进一步恶化舆论对华人的形象认知。

（二）炒作中国政府利用社交平台影响澳政治

澳媒体污蔑中国利用微信平台，对华人以及开通微信的澳政客进行监督和控制，并操控政府选举影响澳大利亚政治。在2019年澳联邦大选中，自由党籍华裔候选人廖婵娥当选澳大利亚众议员。媒体开始指责廖婵娥“所筹集到的30万澳元捐款来路不明”“她与中共有关组织关系密切”^[15]。在澳媒体宣传中，廖婵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宣传武器”^[16]。悉尼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孙皖宁认为微信“已经变得比传统媒体重要得多了”^[17]。澳大利亚许多政客开通微信向华人宣传竞选理念，借此加强沟通、吸引选票。但一些媒体舆论认为，微信是中国政府鼓励海外华人支持某一政党或反对另外政党的平台。悉尼洛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麦克格里戈尔妄称：“北京如果有明确喜好（澳洲的候选人），理论上可能干预选举，努力让他们喜欢的候选人获胜。”^[18]

（三）诬陷中国利用留学生建构“间谍网”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前往消费水平低于欧美的澳大利亚留学。据澳大利亚国家教育部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有大约20万中国留学生，占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8%^[19]。在澳大利亚部分政客和媒体看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华人是一个阵营，是值得怀疑的对象。据报道，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一名老师在授课材料中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称为所谓“独立国家”，甚至在考试中将“香港是独立国家”列为正确答案，在遭到中国留学生集体抗议后仍拒绝改口^[20]。面对澳大利亚反华言行，中国留学生群体自发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澳媒体却将中国留学生的自发行为解读为受中国政府的操控，认为中国政府通过控制留学生，将势力渗透到澳大利亚的大学并构建一张“间谍网”。为

应对所谓“中国对澳高等教育领域的渗透干涉行为”，澳大利亚政府着手组建“大学应对外国干预特别工作组”^[21]。澳大利亚某些学者也时刻鼓吹“中国威胁论”和“华人威胁论”，肆意渲染紧张气氛。澳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的《无声入侵》声称“数以千计的中国情报人员，已经混入澳洲”^[22]。

（四）指责华侨华人支援中国抗疫

近期，澳大利亚社会舆论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将澳防疫物资紧缺归咎于华人群体。有报道称华人将澳大利亚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运往中国，导致澳大利亚医疗体系无法高效运转。《悉尼先驱晨报》曾发布报道，矛头直指在澳中国企业，将目前澳大利亚防疫物资紧缺、澳大利亚医务人员防护薄弱等问题甩锅中国企业，污蔑中国企业为驰援武汉，在澳大利亚大量抢购医用口罩、手套、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造成澳大利亚防疫物资严重不足^[23]。澳大利亚新闻集团旗下报刊也曾称澳大利亚华人“秘密”将口罩运到中国，却没提及运输符合法律要求。

三、当前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兴起的动因

澳大利亚舆论对华人的认知之所以出现大量负面内容，与中澳两国关系变化有密切联系。而中澳两国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此外，澳大利亚政党竞争、澳社会“白澳主义”、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同盟效应，也是澳大利亚涉华人负面舆论出现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根本原因：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

著名移民问题专家、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瑞恩哈特·罗尔曼认为，移民的文化身份是一种社会结构，是政治层面利益冲突的表现^[24]。当政治利益冲突时，不同于主流社会文化的移民群体会首当其冲成为冲突的载体和矛盾的爆点。华人作为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祖籍国存在着无法隔断的关系，必然会受到中澳两国关系变化的影响。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不安全感”上升。在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加深的同时，澳情报局和国防部将中国视为“威胁”。澳大利亚《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中这样描写印度洋地区的权力转移：“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正在迅速提高其军队的能力，它现在拥有亚洲最大的海军和空军，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海岸警卫队。”^[25]2016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堪培拉视察军队时表示，为了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澳大利亚将在未来10年增加300亿澳元国防预算^[26]。国家安全不仅是一种客观上不受威胁的状态，而且是一种主观上没有恐惧的“心态”^[27]。澳大利亚将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视为中国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澳大利亚社会掌握话语权的势力出于恐惧、误解抑或政治需要，将华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建构成对澳大利亚的威胁。这是澳大利亚出现大量对华人负面舆论认知的根本原因。

（二）加速器：澳大利亚政党博弈

选举期间，澳大利亚自由党和工党两大政党争相打出“华人牌”。自2013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以来，自由党连续赢得澳大利亚总理职位。澳大利亚自由党与工党相比，对华态度较为强硬。2017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推动澳大利亚政府制定《反外国干涉法》，法案立法时的舆论焦点聚集在“中国是否过分干预澳洲”。其中，“中国资金对澳洲政坛的影响”被认为是澳政府快速推动反外国干扰立法的肇因^[28]。为引起议员关注以推动法案顺利通过，特恩布尔不断指责工党参议员邓森接受华商黄向墨的金钱并对黄向墨透露有关国家安全的信息，渲染“中国干涉澳大利亚”的话语氛

围。特恩布尔还借此向工党党魁比尔·肖顿发难，逼迫其辞去邓森的参议员职位。最终，两党此次斗争以邓森辞职、法案通过而告一段落。两党间的争斗没有随着2019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结束而落幕。澳大利亚自由党华裔女议员廖婵娥被媒体攻击“接受的捐款来路不明”。澳大利亚分析人士称“若廖婵娥退出国会，将会使莫里森的多数席位减少一个”，这是廖婵娥议员资格受到质疑的关键^[29]。澳政党对华人的指控与其追求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

（三）催化剂：澳大利亚社会“种族主义”

澳大利亚是一个以多元文化著称的移民国家，移民融入议题始终是社会关注焦点。在多元化的理论视角下，移民融入的重要标准是“不同族群在文化上保持平等，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相互作用，相互适应，最终使得所有社会参与者都享有平等的权利”^[30]。但澳大利亚历史上长期实行“白澳政策”，使得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白人至上主义”。根据澳莫纳什大学教授安德鲁·马库斯撰写的斯坎伦基金会调查报告，亚洲移民曾受过歧视的比例较高^[31]。澳大利亚著名工会活动家普瑞玛就“黄向墨事件”发表文章称，黄向墨的政治捐助是符合澳大利亚法律的，取消其永久居留权是澳政府“统治阶层反‘亲中’华人所发起的种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方面”，是澳政府“试图剥夺大部分华人社会应该被赋予的政治权利”，其本质是“白人至上主义”^[32]。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澳大利亚华人群体受到更多歧视甚至遭受辱骂暴力。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2月和3月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种族歧视投诉占总数的四分之一^[33]。该委员会的报告称，澳大利亚出现确诊病例以来，华人经常受到歧视，他们被歧视性地禁止进入餐馆、学校和其他公共生活领域^[34]。两名塔斯马尼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在街头遭遇歧视性辱骂，其中一名留学生还遭遇殴打。就澳舆论对华人的歧视与指责，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接受采访时表示，相关言论是“错误”的，“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实际上保护了澳大利亚”^[35]。

（四）重要因素：美国对中国遏制战略的同盟效应

二战后，澳大利亚与美国在“维护澳大利亚盎格鲁-撒克逊人各方面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石”基础上结成同盟^[10]。澳大利亚保守派认为中国崛起会影响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澳大利亚要始终关注国际体系特别是亚太地区权力转移。面对中国崛起，澳大利亚试图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36]。澳大利亚2017年《外交白皮书》认为，澳大利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受益很大，“支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高度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为此，澳大利亚某些政府官员认为澳大利亚要继续坚定地支持美国的国际领导，并与具有相似观念的国家合作；若美澳同盟被中国瓦解，澳国家安全基石将会被侵蚀，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将逐渐被抛弃。其时刻警惕与中国有关的事物，而华人不可避免地成为质疑的焦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强化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每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轻则曲解和诬蔑中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重则影响所在国的对华政策，阻碍甚至围堵中国的崛起^[37]。美国处在国际舆论的中心位置，使其全球舆论战略成为可能。在美国形成的舆论都会变成对其他国家构成压力的世界性舆论^[38]。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打出“组合拳”来遏制中国。在舆论方面，美国利用其掌握的世界舆论话语权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华人威胁论”“华人间谍论”，渲染紧张气氛。作为美国重要盟友之一的澳大利亚，为维护符合其利益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抛出“新麦卡锡主义”等敌视中国或华人的论调。

四、当前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产生的影响

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对当地华侨华人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阻碍中澳两国关系发展。同时，它在国际社会掀起一波“中国威胁论”，不利于我国开展各项对外工作。

（一）对在澳华人发展的影响

大量负面舆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对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产生负面影响。就报道中出现的个体华人来说，负面报道会使其名誉受损，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和政治参与。就华人群体而言，大量负面舆论会增加华人融入澳大利亚社会的难度，影响华人社会实践参与热情。2015年，《悉尼先驱晨报》在没有事实依据支撑的情况下发布报道，宣称“联合国大会主席阿什贿赂案中的CC-3嫌疑人是周泽荣”“周博士通过向政府官员支付非法款项，在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39]。周泽荣向澳联邦最高法院起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第九娱乐公司、《悉尼先驱晨报》等对其的诽谤，并在2019年初赢得诉讼^[40]。周泽荣在公开接受采访时说：“这种经历对我的个人和职业声誉以及我的健康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最重要的是它影响了我的家人。”^[41]有关华人的负面报道成为华人参与政治的障碍。根据澳大利亚华裔作家、前工党成员罗介雍的说法，若有人表达自己作为华人的自豪感，或政客表达其对华人的支持或认同，就会被贴上“亲共”标签。这种负面舆论长期存在，将会影响华人和其他族群的相互信任。

（二）对中澳两国关系的影响

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联系是移民行为发生时就已产生的、正常的联系，华人与中国间的联系亦是如此。澳大利亚舆论认为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对澳大利亚产生威胁，这类无端指责伤害了华人和中国的情感。值得关注的是，受澳大利亚政界对中国不信任感增加的影响，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出现负面化倾向。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公布的报告显示，在2018年有关“外国对澳大利亚政治干涉”的调查中，63%的民众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政治进程产生了“影响”；大部分民众连续8年将中国视为澳大利亚的潜在“军事威胁”。最新报告中，4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在未来20年，中国将成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42]。在全球抗击疫情期间，澳大利亚社会舆论一度出现破坏中澳两国合作的声音。澳外长玛丽斯·佩恩在采访中妄称，通过“独立调查”向中国了解病毒的源头、中国的处理方式、有没有充分公开信息以及与世卫组织和世界各国的互动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摆到台面上来”^[43]。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的质疑、猜忌是“极其不负责任的”^[44]。

（三）对国际舆论环境的影响

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美国的重要盟友，澳大利亚竭力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澳大利亚炒作“华人威胁论”“侨务干涉论”，配合美国掀起“中国威胁论”新高潮，形成联盟效应，冲击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威胁论”始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遏制打出的组合拳之一。美国和西方世界错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最大的挑战者^[45]。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新一波“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意在延续和加强意识形态联盟，构建阻碍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在话语权方面，美国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华人威胁论”“华人间谍论”，渲染紧张气氛。面对新型

冠状病毒的肆虐，西方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借此向中国继续发难。澳大利亚配合美国大肆炒作“病毒源头”，出现针对中国或华人的种族歧视言论，将舆论攻击矛头指向中国。可见，澳大利亚对华人展开负面舆论攻势，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政治性，缺失真实性和道德性。其本质是西方国家为妖魔化中国形象、鼓吹“中国威胁论”而采取的手段之一。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文章妄称，中国政府利用统战工作干涉他国内政，加强对海外华人社区的管理和引导，把海外华人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代理人。澳大利亚《星期六报》发表文章称，该文代表国外学界和媒体开始讨论中国统战工作与对外影响力^[46]。

五、结 语

对于所谓“华人威胁论”，一方面要从共享利益和道义的视角讲述华侨华人对澳大利亚、中澳关系和国际治理的贡献。另一方面，要解构“华人威胁论”妖魔化中国形象的内核，介绍真实的中国，构建良好的中国形象。中国官方和学者不断反驳西方“甩锅”话语，批判其险恶用心，是话语建构的必要举措。同时，要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话语介绍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推进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参考文献：

- [1]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71.0—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Reflecting Australia—Stories from the Census, 2016 [J/OL]. (2017-06-28) [2020-04-13]. <https://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by%20Subject/2071.0~2016~Main%20Features~Cultural%20Diversity%20Data%20Summary~30>.
- [2] 黄昆章.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3] 张秋生.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 [4] A. J. Grassby.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settlers to Australia [M]. Canberra: Office of Commissioner For Community Relation, 1976.
- [5] Rolls E. Sojourners: the epic story of China's centuries-old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M].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2.
- [6] 艾瑞克·罗斯. 澳大利亚华人史 (1888—1995) [M]. 张威, 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 [7] 陈奕平, 关亦佳, 尹昭伊. 新“中国威胁论”对海外统战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1): 78-85.
- [8] 朱文博. 整体趋好、曲折多变——澳大利亚媒体涉华舆论走向评析 [J]. 公共外交季刊, 2017 (2): 118-125+180-181.
- [9] 马妍. 试析澳大利亚舆论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J]. 国际研究参考, 2014 (10): 1-7.
- [10] 吴前进. 中澳关系中的中国大陆新移民: 国家安全的威胁? [J]. 八桂侨刊, 2019 (1): 3-12.
- [11] Noelle-Neumann E.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74 (2): 43-51.
- [12] Henry Belot. Chinese billionaire Huang Xiangmo wants political parties to pay back his donations after failing in citizenship bid [EB/OL]. (2019-02-08) [2019-08-10].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02-08/chinese-Billionaire-huang-xiangmo-wants-political-donations-back/10794726>.
- [13] Damien Cave. Australia Cancels Residency for Wealthy Chinese Donor Linked to Communist Party

- [EB/OL] . (2019-02-02) [2019-08-11] .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05/world/australia/australia-china-huang-xiangmo.html>.
- [14] The New Daily. Sam Dastyari tells ICAC Huang Xiangmo was Chinese “agent of influence” [EB/OL] . (2019-08-30) [2019-09-21] . <https://thenewdaily.com.au/news/national/2019/08/30/dastyari-icac-huang-xiangmo/>.
- [15] ABC NEWS. Gladys Liu’s Liberal Party branch called to relax foreign investment laws before she became federal MP [EB/OL] . (2019-09-14) [2019-09-15] .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09-14/gladys-liu-was-part-of-calls-to-ease-of-foreign-investment-laws/11511500>.
- [16] Dan Oakes, Echo Hui, Sarah Curnow. 廖嫦娥与中国神秘统战组织有关联[EB/OL]. (2019-08-14)[2020-04-20]. <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19-08-14/liberal-gladys-liu-linked-to-secretive-chinese-influence-network/11409668>.
- [17] 德国之声. 澳大利亚大选：华人选民成关键？ [EB/OL] . (2019-05-12) [2019-12-02] . <https://www.dw.com/zh/%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5%A4%A7%E9%80%89%E5%8D%8E%E4%BA%BA%E9%80%89%E6%B0%91%E6%88%90%E5%85%B3%E9%94%AE/a-48649650>.
- [18] BBC NEWS|中文. 中国微信平台引起澳洲网络安全专家的担忧 [EB/OL] . (2019-01-28) [2019-12-02] .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7032659>.
- [19]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tudent numbers [EB/OL] . (2019-09-27) [2019-12-02] . <https://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research/DataVisualisations/Pages/Student-number.aspx>.
- [20] 张雪婷. 澳高校袒护“辱华”印度裔教师，中国领馆：希望校方认真对待 [EB/OL] . (2017-08-26) [2019-08-15] .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8/11180119.html>.
- [2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Establishment of a University Foreign Interference Taskforce [EB/OL] . (2019-08-29) [2019-09-15] . <https://www.education.gov.au/news/establishment-university-foreign-interference-taskforce>.
- [22] Hamilton C, Joske A. 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M] . Melbourne: Hardie Grant Books, 2018.
- [23] 王传军. 《悉尼先驱晨报》歧视性报道惹众怒 非议华人援华，看不见他们帮澳吗 [N/OL] . (2020-04-01) [2020-04-16] .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20-04/01/nw.D110000gmrb_20200401_2-12.htm.
- [24] Reinhard Lohrmann. Migrants Refugees and Insecurity—Current Threats to Peace? [J]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0 (4) .
- [25]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M/OL] . (2017-11) [2019-09-15] .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report/2017/australia_2017_foreign_policy_white_paper.pdf.
- [26] 澳大利亚增拨国防预算应对中国军力扩张 [EB/OL] . (2016-02-25) [2019-08-10] .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6/02/160225_australia_defence_spending_china.
- [27] 田源. 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 [M]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6-17.
- [28] 澳洲通过“反外国干预法”：中澳关系何去何从 [EB/OL] . (2018-06-28) [2019-08-11] .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633401>.
- [29] ABC 首席政治记者深入分析廖嫦娥事件发酵的幕后 [EB/OL] . (2019-09-13) [2019-09-13] . <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19-09-13/questions-raised-about-liberal-mp-gladys-liu/11512498>.
- [30] 黄匡时, 嘎日达. 社会融合理论研究综述 [J] . 新视野, 2010 (6) : 86-88.
- [31] Andrew Markus. Map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scanlon foundation surveys 2017 [M/OL] . Monash University,

- 2017 : 59-60 [2019-12-19] . https://scanlonfoundation.org.au/wp-content/uploads/2018/10/ScanlonFoundation_MappingSocialCohesion_2017-1.pdf.
- [32] Trotskyist Platform. From Labelling Chinese Students as Communist “Spies” to Persecuting a Socialist Political Prisoner: Cold War Witch-Hunting Returns… Mixed With White Australia Racism [EB/OL]. (2019-02-25) [2019-08-10]. <https://www.trotskyistplatform.com/cold-war-witch-hunting-returns-mixed-with-white-australia-racism/>.
- [33] Jason Fang, Erwin Renaldi, Samuel Yang. 澳洲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种族歧视增多 遇到该如何投诉? [EB/OL]. (2020-04-10) [2020-04-11]. <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20-04-03/racism-covid-19-coronavirus-outbreak-commissioner-discrimination/12119832>.
- [34]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Racism undermines COVID-19 Response [EB/OL]. (2020-04-08) [2020-04-13]. <https://www.humanrights.gov.au/about/news/racism-undermines-covid-19-response>.
- [35] 赵挪亚. 澳总理称赞华人社区: 他们保护了澳大利亚 [EB/OL]. (2020-04-15) [2020-04-16].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0_04_15_547002.shtml.
- [36] 周方银, 王婉. 澳大利亚视角下的印太战略及中国的应对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8 (1): 29-36+52.
- [37] 郑永年: 中美贸易战, “地缘政治又回来了” [EB/OL]. (2018-03-24) [2020-04-11]. <http://opinion.haiwainet.cn/n/2018/0324/c456317-31285651.html?nojump=1>.
- [38] 近藤诚一. 日美舆论战——一个日本外交官的驻美手记 [M]. 刘莉生,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5.
- [39]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Responsible Media Blog. Case Law, Australia: Chau v Fairfax Media Publications PL, Philanthropist Wins Round One - Justin Castelan [EB/OL]. (2018-06-28) [2019-08-11]. <https://inform.org/2019/05/04/case-law-australia-chau-v-fairfax-media-publications-pl-philanthropist-wins-round-one-justin-castelan/>.
- [40] Michaela Whitbourn. “Disappointed”: ABC, Nine lose appeal over Chau Chak Wing truth defence [EB/O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9-08-02) [2019-08-10]. <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19/02/22/18451/>.
- [41] 周泽荣胜诉捐 28 万赔偿金 Fairfax Media 称会上诉 [EB/OL]. (2019-02-22) [2019-08-13]. <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19/02/22/18467/>.
- [42] Alex Oliver.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2018 [M/OL].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18: 9-11 [2019-12-16]. https://www.loy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LOWY_2018-PollReport_LR_0.pdf.
- [43] 王恺雯. 和美国一唱一和, 澳外长要求调查“病毒源头” [EB/OL]. (2020-04-20) [2019-04-25].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0_04_20_547614.shtml.
- [44] 成竞业大使就新冠肺炎疫情等接受澳《金融评论报》采访实录 [EB/OL]. (2020-04-29) [2020-04-30].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sghdxfwb/t1774672.htm>.
- [45] 郑永年. 美国 (西方) 外交中的种族主义情结 [EB/OL]. (2020-02-11) [2020-04-17]. <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200211-1027971>.
- [46] MARTIN MCKENZIE-MURRAY. Inside China’s “United Front” [EB/OL]. (2018-03-09) [2019-11-29]. <https://www.thesaturdaypaper.com.au/news/politics/2018/03/03/inside-chinas-united-front/15199956005888>.

责任编辑: 龚静阳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中“nation”与“nation building”术语之意涵解析

——兼论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

叶 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全球治理研究所，上海 200233）

摘 要：“nation”与“nation building”是安德烈亚斯·威默著作《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的关键英文术语，其意涵需要通过概念史梳理进行澄清。“nation”的含义既为中文一体层次“民族”，又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building”的含义则是对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基于“nation”与“nation building”的意涵界定，《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提出了相应主要学术观点：国家建构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维护国家（nation）以及与建构国家紧密相联的民族（nation）的凝聚力；西式民主化不是促使现代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聚合或分裂的根本因素；国家建构的核心机理是经过跨族群“政治整合”达成“民族及国家认同”；国家建构的基本内容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多民族国家有效地进行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中国应坚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自信，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国家认同统一起来。

关键词：民族；国家；国家建构；国家认同；nation；nation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3-0091-1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哲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下文简称“威默”）在2018年推出“Nation Building: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0.03.010

作者简介：叶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西欧多民族国家国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比较研究——以英、西、比、瑞士为例”（2019-GME-025）

引用格式：叶江.《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中“nation”与“nation building”术语之意涵解析——兼论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3):91-100.

一书^[1]。该书中文译本《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下文简称《国家建构》）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10月出版，笔者是译者。该译著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相当程度的关注^[2-3]。笔者认为，颇有必要较为系统全面地解析本书的两大关键术语“nation”与“nation building”的意涵。这有助于读者把握威默此书的主要学术观点。本文还将讨论该书对多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启示。

一、英文“nation”的意涵及其中译解析

《国家建构》一书的英文正书名为“Nation Building”，而英文“nation”一词的含义相当复杂。在很大程度上，全面理解和把握作者在本书所论述的内容及其主要观点，必须首先厘清“nation”的意涵。更重要的是，准确地理解和中译英文“nation”一词有助于我们从此书得到对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的启示。

一般而言，西文百科全书和辞典对“nation”词条的释义非常复杂，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民族，即在共同语言、领土、历史、种族或心理构成的基础上形成的，表现在一种共同的文化之中且希望或已经生活在一个特定国家中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其二，国家，即具有相同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人们共同体，生活在特定地区、拥有统一政府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实体^①。这也就意味着，英文“nation”一词具有中文“民族”与“国家”双重含义，或表述着中文的“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毫无疑问，威默在《国家建构》中所讨论的“nation”也具有前述双重内涵。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英文“nation”在表述中文“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时，与这两个中文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并不对等。在下文，笔者将先具体讨论中文“民族”概念的内涵以及英文“nation”在表述中文“民族”概念时所具有的含义，然后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讨论“nation”在表述中文“国家”概念时的含义以及“nation building”术语的内涵及其中译问题。

国内相当部分的民族问题研究者认为：中文的“民族”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广泛，既有极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又有很大的模糊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作不同的理解”^[4]。但是，早在3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就对中文“民族”概念的模糊性做了澄清。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5]这意味着，费孝通先生将中文“民族”概念的内涵清楚地界定为两个层次的人们共同体：一体层次即“中华民族”层次的人们共同体，多元层次即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层次的人们共同体。即使在费孝通先生明确地用两个层次来界定中文“民族”概念之后，我国的部分民族问题研究者依然坚持认为，“汉语‘民族’概念的内涵在纵向上包含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在横向上以单一民族为基本单位，并延伸到复合民族和民族支系……”^[4]。因此，其内涵始终是模糊的。

^① 比如，英国的网上《剑桥词典》将“nation”定义为：1. “a country, especially when thought of as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living in one area with their own government, language, traditions, etc.”；2.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of the same race who share the same language, traditions, and history, but who might not all live in one area.”。（参见：<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hinese-simplified/nation>）

随着 2019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作出更为全面、科学的论述^[6]，中文“民族”概念内涵的两层次性得到了清楚的界定。“习总书记清晰地用中文“民族”一词表述两个层次内涵——一体层次，即中华民族层次的‘民族’内涵和多元层次，即我国 56 个民族层次的‘民族’内涵。”^[7]

很显然，中文“民族”一词所表述的两个层次内涵中只有一体层次的“民族”内涵与英文“nation”在表述“民族”概念时的内涵相互重合。这也就是说，《国家建构》原著中英文“nation”所表述的中文“民族”概念指的是一体层次，也就是“中华民族”层次的“民族”，而非构成中华民族的多元层次，即我国“56 个民族”层次的“民族”。中华民族层次或费孝通先生所云一体层次的“民族”是国家层面的，也就是直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民族”。因此，其所对应的英文就是“nation”，如“法兰西民族”（French nation）、“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和“印度民族”（India nation）等。同时，英文“nation”所表述的也是斯大林所言“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8]。斯大林称这样的共同体为“нация”（nation），而“нация”（nation）恰恰就是可以直接建构现代国家的“民族”^[9]。其所建构的国家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或“нация-государство”。总之，《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中的“nation”一词在表述中文“民族”含义时仅指“一体层次”或“国家层面”的“民族”。

与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民族”（nation）相对应的多元层次或次国家层次的“民族”就是诸如我国“56 个民族”层次的“民族”。当今世界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都由多个这一层次的“民族”所构成^[10]。在当前西方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这一层次“民族”的英文表述为“ethnic group”，相应的中文“多民族国家”的英文表述也自然为“multiethnic state”。威默在《国家建构》一书中当然也是用“ethnic group”及相关术语如“multiethnic”（多民族的）等来讨论该层次的“民族”，探究该层次的“民族”（ethnic group）如何共同建构国家层次的“民族”（nation）以及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我国官方英文译本都已用“all ethnic groups”来翻译我国的“各民族”即“56 个民族”^[11-12]；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3]已经正式英译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unified multiethnic state found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12]。

近年来，国内不少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者认为，为了区分一体层次即国家层面的“民族”（nation）与多元层次即次国家层面的“民族”（ethnic group），我们应该将国家层面的“民族”（nation）改称为“国族”，并且用“国族”来翻译英文的“nation”一词，同时继续用“民族”来称呼次国家层面的“民族”（ethnic group）。但是，“中华民族”就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其英语表述是“Chinese nation”^[11-12]。《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官方英文译本都已经用“Chinese nation”来翻译“中华民族”。如果我们将中华民族这一层次的“民族”改称为“国族”，从而将英语“nation”一词翻译为“国族”，那么“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就将改称为“中华国族”，这是很难令国人接受的。“中华民族”一词不仅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中广泛传唱，而且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于这种考虑，《国家建构》的中文本坚持在英文“nation”一词表述中文的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的“民族”概念时，用中文“民族”而非“国族”来翻译。

国内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将我国的多元层次或次国家层面也就是“56个民族”层次的“民族”改称为“族群”。这就意味着需要将英文“ethnic groups”统一翻译成“族群”而非“民族”。但是，这在目前也行不通。我国的“56个民族”“少数民族”等称谓已深入人心，以至于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都将这一层次的“民族”表述为“民族”而非“族群”。因此，目前在涉及我国的民族问题时，我们应该继续用中文“民族”一词来同时表述我国的两个层次的“民族”——“中华民族”（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民族”）和“56个民族”（多元层次或次国家层面“民族”）。此外，我们必须继续称呼我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很明显这里的“多民族”指的是多元层次的“民族”（ethnic groups）。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建构》作者用英语“ethnic group”来表述我国“56个民族”或“少数民族”等以外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多元层次或次国家层面的“民族”。为了表示与“nation”的区别，本书中译本将其统一翻译为“族群”。在解析出中文“民族”概念的两个层次内涵后，我们在用英文来翻译这两个层次的“民族”时，就应该将国家层面或一体层次的“民族”翻译为“nation”，而将次国家层面或多元层次的“民族”翻译为“ethnic group”^[14]。

二、英文“nation building”的意涵及其中译解析

通过上文对英文“nation”在表述中文“民族”概念时的含义分析，我们已经较为清晰地看到“nation”所表述的“民族”内涵不与中文“民族”概念的内涵完全重合，其所表达的只是中文“民族”概念中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的“民族”内涵。与此相似的是，英文“nation”在表述中文“国家”概念时同样也不与之完全重合。进一步厘清其所表达的中文“国家”的实际内涵，对准确把握“nation building”术语的意涵及对之做恰当的中文翻译至关重要。

英语中常用于表述中文“国家”概念的词语有三个——“country”“state”和“nation”。一般而言，英文“country”在表述“国家”概念时，其所指称的是各种类型的“国家”。英文“state”所表述的“国家”概念则具有很强的政治意涵，所表述的是各个历史时期拥有疆域、政府和人民的政治实体，比如古希腊的“city-state”（城邦国家）、中世纪的“feudal state”（封建国家），乃至近代以降形成的现代“sovereign state”（主权国家）等。英文“nation”是指与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的“民族”（nation）相互紧密关联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很大程度上，英语“nation”之所以用以表述中文的“国家”含义，是因为“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出现。顾名思义，“nation-state”（民族-国家）即为由“nation”（民族）所建构的国家，当然这里的“民族”（nation）指的是一体层次或国家层面的“民族”。换言之，英文“nation”是由于“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产生而逐渐地形成中文“国家”含义，而这样的“国家”概念包含着“民族”（nation）的内涵。构成这样的“国家”（nation）有三个主要因素——疆域、政府和“人民”，这里的“人民”为一体层次的“民族”（nation）。而同样可以翻译为中文“国家”

的英文“country”和“state”，则不强调其内部的人民是“nation”（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国家学说，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的“民族”（nation）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或资本主义属性。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强调：“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нация/nation）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灭各族人民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各民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结合成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在资本主义以前，在封建主义时期，既然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不仅没有用民族的纽带彼此联系起来，而且根本否认这种纽带的必要性，那么民族怎么能产生和生存呢”^[15]。斯大林对一体层次“民族”（нация/nation）形成的分析与列宁有关“民族（нация/nation）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16]的论断完全一致。这就意味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国家学说，既然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的“民族”（nation/нация）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么由它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нация-государство）当然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虽然西方学术界对作为人们共同体的“nation”（民族）是现代的产物还是古已有之依然存在激烈争论^[17]，但是对“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认识则基本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一致，认为它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由于英文“nation”所具有的“国家”内涵来自英文术语“nation-state”，英文“nation”实际所表述的就是现代“nation-state”，也是由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建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英文“nation”在表述中文“国家”概念时，一方面，其外延比同样可以中译为“国家”的“country”与“state”要窄一些；另一方面，它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和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民族”的民族性。

在考察分析英文“nation”表述中文“民族”“国家”两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基础上，我们可进一步探讨英文术语“nation building”的意涵，解析为何要将威默的“nation building”的英文正书名中译为“国家建构”。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nation building”这一术语的翻译很不统一，既有翻译为“民族统一构设”^[18]，也有译作“民族构建”^[19]，还有译成“民族建设”^[20]。但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基本将该术语中的“nation”翻译为“民族”。有意思的是，在国内网络上对《国家建构》的评论中不乏认为该书正书名应该翻译为“国族建构”的意见^[3]。如前文已经讨论过的那样：所谓“国族”为国家层面“民族”的另一种表述，“国族建构”实际的意思是“民族建构”。

应当承认，英文术语“nation building”确实有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的“民族建构”的意涵，因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构过程不可能脱离国家层次的“民族”（nation）建构。但是，其更为主要的内涵则是“国家建构”，当然这里的“国家”指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在相当程度上，从西方学术界有关“nation building”问题学术研究历史的发展演变就可以清楚地理解“nation building”主要是指“国家建构”。西方学术界对“nation building”产生研究兴趣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涌现出一大批后殖民国家，西方学者由此对这些新型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建构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兴趣。一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使用“nation building”概念来描

述国家 (state) 与社会 (society) 的更大程度的整合, 因为公民身份带来了现代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的忠诚, 但是如何成功地维护这样的忠诚从而使国家能长治久安则成为一个值得研究者们深思的大问题。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 西方学术界在研究 “nation building” 问题时基本将 “nation” 和 “state” 视为可以互换的词汇, 以至于经常将 “nation building” 与 “state building” 交互使用, 表达同一种意思——“国家建构”或“国家建设”^[21]。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卡尔·多伊奇 (Karl Deutsch) 与威廉·福尔兹 (William Foltz) 共同主编了 “Nation Building in Comparative Contexts” 一书。该书主要讨论社会交往和国家的整合 (national integration), 对西方民族-国家乃至后殖民时期亚非拉新型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 (nation building) 的作用与影响。从整体内容看, 其书名当然应该中译为 “比较语境中的国家建构”^[22]。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威廉·福尔兹 (Reinhard Bendix) 出版了名著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该书考察了国家 (state) 和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如何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其所聚焦的是国家建构 (nation building) 过程中个人 (individual) 与国家 (state) 之间的关系, 因而该书的中文书名应为 “国家建构和公民身份”^[23]。

几乎与卡尔·多伊奇、威廉·福尔兹等同时,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及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主编了一部至今仍对 “国家建构” (nation building) 问题研究颇具影响的著名论文集《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查尔斯·蒂利在其中一篇重要文章 “西方的国家建造和政治转型诸理论” (Western state-making and theori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中, 用 “战争制造了国家并且国家也制造了战争” (War made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ade war)^[24] 这句名言高度概括其有关 “国家建构” 或 “国家形成” 的观点。由于查尔斯·蒂利在他的相关文章中主要用 “state building” “state making” “state formation” 来表述 “国家建构” “国家建造” “国家形成”, 因此国内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只有 “state building” 可以翻译为 “国家建构” 或 “国家建设”, 而 “nation building” 应该翻译为 “民族建构” 或 “民族建设”^[20]。然而, 这本论文集集中英文术语 “state building” 和 “nation building” 是互换使用的^[24]。

虽然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 西方学术界就已经对 “国家建构” (nation building) 问题产生兴趣, 但该问题引起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以及 21 世纪初 “9·11” 事件的发生相互关联。随着苏联解体和 “9·11” 事件之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以及西亚非洲一系列所谓 “失败国家” 的产生, 有关如何在旧秩序崩溃或国家已经被战争摧毁或是国家从未真正正常运作过的地方建构能发挥作用的, 成为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界关注的重点。由此, “国家建构” (nation building) 问题研究再度勃兴。2003 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多宾斯 (James Dobbins) 和他在智库兰德公司的合作者们推出了研究报告 “Nation-Building: the Inescapa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国家建构: 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可避免的责任》)。该报告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参与的重新建构被战火摧毁国家的过程都称为 “国家建构” (nation building), 并将 “国家建构” (nation building) 定义为 “在冲突后利用武装力量来巩固向民主制的持久过渡”^[25]。2004 年, 美国政治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出版著作“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国家建构：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福山在此书中用“state building”来表述通过法治建立秩序、建立合法的政府和其他有效的社会制度、发行可靠的货币、实行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等的国家建构过程^[26]。但是，在 2006 年福山又主编了一本题为“Nation-Building: 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国家建构——超越阿富汗与伊拉克》）的论文集，书中基本都用“nation building”来表述所有“国家建构”的内涵^[27]。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西方“nation building”研究的学术发展历史可见，西方学术界所使用的术语“nation building”与“state building”都具有“国家建构”的含义，且两者经常可以互换使用。就如西方学者在概括“nation building”内涵时指出的那样：“今天，nation 一词常常与 state（国家）同义，就像 United Nations 被称为联合国一样。”^①^[28]可见，与英语术语“nation building”所对应的中文翻译自然应该是“国家建构”，而威默所著“Nation Building”的书名也就理当翻译为“国家建构”而非“民族建构”。当然需要注意，尽管“nation building”和“state building”可互换使用，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相当区别的。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和布里奥尼·赖希（Bryony Reich）认为：“‘state building’总体上指的是为一个有功能的国家建构各项国家制度，而‘nation building’则是指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以及同时建构有功能的国家。”^[21]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state building”强调不同时期各种类型国家的制度和功能建构，而“nation building”则聚焦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国家制度及功能建构两个方面。由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与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的“民族”（nation）建构密切相关，“nation building”所表述的“国家建构”包含着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建构意涵。

三、《国家建构》对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的启示

前文对“nation”和“nation building”两个术语意涵的解析和厘清，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建构》的主要学术观点及其对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的启示。

首先，国家建构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维护国家（nation）以及与建构国家紧密相联的民族（nation）的凝聚力。通过上述对英文术语“nation”与“nation building”的解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威默著作讨论的“国家建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始终聚合而长治久安，而另一些国家却持久不稳而分崩离析。他主要讨论的“国家”（nation）是由一体层次或国家层面的“民族”（nation），也即中华民族层次的“民族”（nation）所建构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正因如此，他笔下的“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与“民族”（nation）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

其次，西式民主化不是促使现代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聚合或分裂的根本因素。威默在《国家建构》中强调，应该将国家建构与民主化区分开来。通过对“nation”和“nation building”术语的辨析，我们已经知道威默在《国家建构》中研究的国家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其中的“民族”（nation）绝大多数都是由多个多元层次或次国家层面的“民

① 英文原文为“Today the word nation is often used synonymously with state, as in the United Nations”。

族”(ethnic group)所建构的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的“民族”(nation)。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建构》实际上主要研究多民族的(multiethnic)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unified multiethnic state)。威默认为,西式民主化并不是多民族的(multi-ethnic)现代民族-国家国家建构的一个配方。当然,他不否定西式民主制度本身。

威默提出,国家建构的关键不在于实现民主化,而在于由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交换而建立的包容性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国内各多元层次的民族(ethnic groups)对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民族(nation)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同(national identity)。根据威默的历史社会学定性和定量研究,一方面,上述国家建构的“政治整合”和“民族及国家的认同”的一体两面可以通过遍布全国的志愿性协会、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给和共同语言的使用得以实现,虽然以多民族国家为样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并非需要同时拥有上述三个因素。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看,早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成败具有深刻影响,而早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在西方与战争相关,在西方之外的其他地方则与早期国家所处的地形和人口密度相关。

再次,国家建构的核心机理是经过跨族群“政治整合”达成“民族及国家认同”。威默强调,不论是研究国家建构一体两面中的“政治整合”面向还是“民族及国家认同”面向,都必须十分注重研究各国内部各多元层次民族(ethnic groups)如何超越各自的群体认同,而建构更高层次也即一体层次的民族(nation)认同。由于威默认为国家建构的“政治整合”面向是通过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环绕交换关系以及促使各多元层次民族有效参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事务的包容过程,因此增强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中各民族(ethnic group)对直接建构国家的一体层次的民族(nation)认同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在公民对国家层次的民族(nation)及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同面向,威默认为必须促使国内各民族(ethnic groups)将对一体层次也即国家层次民族(nation)的认同与对国家(nation)的认同统一起来,即必须通过对建构国家的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认同来增强对国家的国家认同,并使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建构在相当程度上包含着一体层次即国家层次民族的民族建构过程,在英语中两者都称为“nation building”。威默特别指出,防止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沿着民族的(ethnic)断层线而分裂的重要一环,就是加强国内各民族(ethnic group)对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并且将之与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有机相连。

最后,国家建构的基本内容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多民族国家有效地进行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根据威默的看法,国家建构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是否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在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内各民族(ethnic group)能否实现包容性的政治整合,以及能否成功地超越本民族(ethnic group)的认同而建构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的民族(nation)认同和与之紧密相连的国家(nation)认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是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成功实现国家建构的必由之路。这也是加强一体层次也就是中华民族层次的民族认同、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的最佳途径。我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要坚定中国特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建构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6] 4}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对我国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国家认同十分有利。威默认为，在建构现代国家进程中，国内各多元层次的民族（ethnic groups）必须建构起对一体层次即国家层次民族（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同，否则国家建构将难以成功，更勿论国家的任何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客观现实表明，中国的多元层次民族（56个民族）与一体层次民族（中华民族）紧密相连、融为一体。中华民族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6] 4-6}。正因为如此，我国各民族（ethnic groups）对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的认同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坚实的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国家认同统一起来，使56个民族同时具有坚实的中华民族认同和对由中华民族建构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 [1] 安德烈亚斯·威默.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 [M]. 叶江, 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2] 陈宇慧. 宏大叙事的精细回归——评《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 [EB/OL]. (2020-04-03) [2020-04-30].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403/09/60669552_903542939.shtml.
- [3] 陈拯. 评《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 | 政治包容与国家认同 [EB/OL]. (2020-04-06) [2020-04-30].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849462.
- [4] 何叔涛. 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 [J]. 民族研究, 2009 (2): 11-20+108.
- [5]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4): 1-19.
- [6]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年9月27日)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 [7] 叶江.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民族”内涵再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的一点体会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20 (4): 1-6.
- [8] 斯大林选集：上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61.
- [9] 叶江. 民族概念三题 [J]. 民族研究, 2010 (1): 1-9+108.
- [10] 叶江. 多民族国家的三种类型及其国家认同建构问题——民族学研究的视角 [J]. 民族研究, 2018 (1): 18-31+123-124.
- [11]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B/OL]. (2017-10-24) [2020-04-3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download/Constitution_of_the_Communist_Party_of_China.pdf.
- [12]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18-03-11) [2020-04-30].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constitution2019/constitution.shtml>.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 7.
- [14] 叶江. 希腊文“εθνος” (ethnos) 在西方古代后期文献中的内涵探析——从十九大报告中“少数民族”及相关概念的官方英译谈起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8 (4): 1-8.
- [15] 斯大林全集：第1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 287-288.
- [16] 列宁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13-418.

- [17] 叶江. 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1): 146-157+208.
- [18] 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邓正来,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 [19] 杨雪冬. 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 一个理论综述[J]. 复旦政治学评论, 2005(00): 84-107.
- [20] 饶志华, 于春洋. 论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11): 23-28.
- [21] Alberto Alesina and Bryony Reich. Nation-building [EB/OL]. (2015-05-27) [2020-04-30]. <https://scholar.harvard.edu/alesina/publications/nation-building>.
- [22] Karl Deutsch. Nation-Building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ome Issues for Political Research [M]. 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66: 7-8.
- [23] Reinhard Bendix.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2.
- [24] 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25] James Dobbins et. al. Nation-Building: the Inescapa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EB/OL]. (2003-01-01)[2020-04-30]. https://www.rand.org/pubs/corporate_pubs/CP22-2003-08.html.
- [26] Francis Fukuyama.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7] Francis Fukuyama ed. Nation-Building: 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8] Carolyn Stephenson. Nation Building [EB/OL]. (2005-01-01) [2020-04-30]. https://www.beyondintractability.org/essay/nation_building/.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研究述评

张 多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 既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制度自信, 也体现了我国政党制度越来越显著的世界意义。国内学界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关注日趋升温, 研究成果包括: 从“权”字出发, 通过“政党制度”与“话语权”的理论叠加界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内涵; 从遏制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增强我国民众的制度自信、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等方面阐述其构建意义; 从我国政党制度优势日益凸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被不断强调以及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等方面阐述其构建机遇; 从西方话语霸权袭扰、中国话语建设能力不足、制度自身并未成熟定型、国际传播机制存在缺陷等方面阐述其构建的制约因素; 从强化话语意识、顺应生成理路、扩大国际传播、构建话语体系等方面阐述其构建路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研究应该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的深度, 加强研究的实证性与应用性, 提升研究的系统性与全面性, 关注西方赢得话语权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话语权构建; 多党合作; 制度优势; 软实力; 西方话语霸权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0) 03-0101-08

21 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 也是国家间制度竞争的时代。制度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反映, 与制度的生存权、发展权密切相连。政党制度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背后隐含国家之间地位、利益、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技。“应该承认, 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和运用, 我们总是生手, 在很多场合还是人云亦云, 甚至存在舍己芸人现象。”^[1] 西方别有用心之人利用长期掌握的媒介平台优势歪曲我国政党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政党制度及其话语权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表述, 意味着从过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侧重讲政党制度的独特性, 演进到新时代侧重讲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的战略任务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 增强我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本文以国内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为依据, 对中国

DOI: 10.13946/j.cnki.jcqi.2020.03.011

作者简介: 张多,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内在逻辑研究”(15AKS010)

引用格式: 张多.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研究述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3): 101-108.

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内涵及其构建意义、机遇、制约因素与实践路径等内容进行梳理与评析。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内涵

国内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理解，主要从“权”字出发，通过“政党制度”与“话语权”的理论叠加，确定和拓展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外延。

（一）从“权力”单向度解读

有学者认为，“权”表“权力”，在话语理论中，话语权被用来指称言说者的权力，直接关系到言说是否可以继续，所说是否具有影响、控制他人的能力。基于这一分析框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就是多党合作制度利用自身具有的话语体系影响话语客体的权力，即多党合作制度具有的引导力、影响力和控制力”^[2]。

（二）从“权”引申出多重向度解读

广义上的“权”不仅表示权力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是一种话语权利^[3]，是指言说、交流、辩论等语言上的权利，话语主体必须具备表达“多党合作话语”的资格。还有学者将“权”引申为“解释权、表达权和引导权”^[4]，进一步细化为“对多党合作制度在政党政治范畴的定义权、标准与规则的制订权、优劣的评议权”^[5]。

（三）从“国际—国内”两个视野解读

从其实践的对象来看，一方面，话语权重塑国内民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另一方面，话语权对外彰显本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有学者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应包括两大系统的组合。一是国内话语体系，这一体系要使民众了解、认同中国的政党制度，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制度自信。二是国际话语体系，这一体系要交待清楚这一制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实际效能，从而进一步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同和信服^[6]。

（四）从“软实力”维度解读

有学者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在严格意义上是一种制度性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权是多党合作制度产生的影响力，具体体现为界定政党话语传播的范围、设定政党讨论的话题及议程、把控政党理论评判的舆论导向、对政党理论难题的释疑解惑等^[7]。

二、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意义

国内学界主要从遏制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增强我国民众的制度自信、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等方面论述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遏制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

我国政党制度具有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的客观性，同时适合中国国情，也具有世界意义。但是，长期以来，西方通过生产概念、包装理论、推销思想等手段塑造话语霸权，以“学术自由”为名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霸权话语的怀疑、歪曲、诋毁。这严重影响国内学者和广大民众对政党制度作出正确判断。同时，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及其优越性长期被国际社会漠视、低估甚至贬低，已对中国展开政党交往、扩大国际“朋友圈”与开展国际统战工作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8]。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话语权成为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9]，让国际社会全面、真实地了解我国的政党制度，重塑我国国家形象，彻底改变我国政党制度“失语”“挨骂”的困境。

（二）增强我国民众的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重要政治命题。理论上，自信是主体对客体的肯定性判断，制度自信则是反映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支持和拥护的状态，关乎政治体系中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制度自信是一个动态的塑造过程，需要特定的话语在主客体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为其塑造可感知的“归属感”。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构建能够促进社会及各政党之间团结和谐、凝聚共识，不断提升民众的制度自信。有学者认为，应提升政党制度向心力，重塑政党制度权威以带动人民群众形成制度自信^[10]。政党制度权威的确立符合社会转型需要，顺应世界民主化浪潮，符合现代政治发展方向，是现代政治权威的体现。而话语权恰恰是重塑政党制度权威的重要内容。提升中国多党合作话语权能够推动制度效能的发挥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政党之间的和谐关系^[11]。

（三）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意味着人们愿意将制度的价值追求内化为人的价值标准，以激励自身自觉遵守和维护制度，从而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提高制度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坚持与完善需要依靠执政党、参政党同向发力，对政党制度的认同是其行为一致的前提条件。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与争取政党制度话语权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有学者指出，构建国内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多党合作话语体系，进而提升政党制度话语权，本质上就是对我国政党制度的一种坚持和完善^[12]。

三、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党制度优势日益凸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被不断强调以及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为政党制度话语权构建提供了现实条件。

（一）基本依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日益凸显

探讨我国政党制度独特优势是树立制度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其一，从社会整合角度来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要求政治制度具备高度社会整合功能，以防止社会碎片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代表并有效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制度效能上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优势^[13]。其二，从利益表达角度来看，政党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是利益表达的工具。在利益表达上，西方政党制度始终难以跳出“首要代表强势集团利益”的运行逻辑。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民主党派广泛吸纳民众意见，各种利益诉求可源源不断沿着这个纵轴进行信息对流^[14]。其三，从民主决策角度来看，政党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优化政府决策。西方政党注重权力制衡，其所谓“民主”往往是政党间互相倾轧的党争民主，导致政党成为撕裂社会的力量。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执政党、参政党依次完成对政治的输入以及生产和输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和有效性，从而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5]。其四，从民主监督角度来看，苏联、东欧剧变与其实行的“一党制”导致共产党缺乏监督有着必然联系。而西方政党间的监督与制衡建立在政党竞争之上，带有严重的政党偏见，

容易失去对事物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16]。中国参政党的监督具有超越一般监督的积极意义。合作性监督便于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政府执行力^[17]。

(二) 有力保障: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同时要求加强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权的建设。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与话语权建设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理论工作者应该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契机,实现话语体系及话语权的重构和发展^[18]。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后多党合作制度的不断完善及效能的不断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政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党制度研究中心、重庆多党合作历史研究中心等纷纷成立,探索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以及话语权的人才队伍和研究平台得以搭建^[5]。

(三) 历史契机:当前国际格局“东升西降”

一些学者看到,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经济体正在陷入长期增长乏力、低迷的困境。西方民主制度呈现出不可遏制的衰败趋势,西方政党制度在后发国家的推行也遭遇诸多危机。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开始日渐式微^[19]。西方世界的衰落还体现在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上,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西方的两党或多党制使得基于政党利益的争论极大地延误了疫情防控^[20]。与之形成对比,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发展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当前西方学者热议“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学术动向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及话语权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我国应抓住机遇,通过争取未来国际制度的议程设置权、制度建设权来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21]。

四、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制约因素

我国政党制度话语尚未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构建话语权更是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学者主要从西方话语霸权袭扰、中国话语建设能力不足、制度自身并未成熟定型、国际传播机制存在缺陷等方面,阐述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制约因素。

(一) 西方话语霸权袭扰

从国际上看,西方话语霸权挤压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空间。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并不代表冷战思维消失。西方政党政治已有300多年历史。“二战”以后,凭借先发优势,西方大国把社会福利和政党制度捆绑,推销“普世价值”,推进各国“民主化”进程,对不符合西方政党模式的政党体制进行理论攻击与思想倾轧,其本质目的是维护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22]。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从未停止。学者认为,西方意识形态偏见源于中西文化差异,这种天生的差异直接降低了中国话语被世界接受的程度。长期以来,“西方普遍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基督教文明,对东方文化带有偏颇的理解,认为人类文化应该超越民族、种族、国界和信仰,围绕西方具有的普世价值观而展开^[23]。

(二) 中国话语建设能力不足

虽然中国的硬实力发展迅速,但还缺乏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意识与能力。有学者从民族心理角度分析,认为建构多党合作话语体系面临的文化和民族心理挑战主要表现在自我矮化的

民族自卑，“认为谈民主宪政、谈政党制度、谈法治民主，言必称欧美”^[24]。有学者从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角度分析，认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层面的转变必然会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政治运行及居于政治结构中心位置的政党制度产生深刻影响^[25]。特别是当前多样化社会思潮挤占话语空间，国内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多党制^[26]。有学者认为，构建我国政党制度话语存在自身的理论困境。这主要表现在：“沿用本属于体制机制层面的‘中国政党制度’概念，以表达中国政党政治具有广泛实践与丰富创新论域的重大问题，客观上制约了智力支持的有效回应和智库资政价值的深入开掘。”^[27]

（三）制度自身并未成熟定型

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政党制度话语的理论与实践体现合理性与科学性，才能让我国政党制度真正拥有话语权。然而，我国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简单化倾向^[28]。政党协商方面，随意性大，信息不对称，协商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一些基层执行不到位，以通报代替协商，特别是一些监督式的协商较难，在一些地方一些场合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意义重于实际意义的问题^[29]。这些现象都削弱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

（四）国际传播机制存在缺陷

我国在国际传播方面的缺陷导致我国政党理论陷入“说了传不开”的怪圈，其生成的主要原因是话语传播平台与政党制度话语权实现队伍的问题。“西方的通讯社垄断了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90%的新闻，几乎淹没其他声音。但以汉语为传播符号的信息量仍只占到总量的5%左右，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偏弱。”^[30]可以说，因为西方媒体掌握新闻传播的主动权甚至控制权，国际社会难以准确认知我国的政治生活。有学者分析我国现存传播体系的弊端：官方话语常常难以与民间话语在理性和感性上产生共鸣。而在对外宣传中，其话语大多以简单说教为主。这两种宣传方式在国内外难以适应现实需求^[9]。有学者认为，我国政党制度有理说不出的窘境主要由“政治学国际交流的平台较少、规模较小。政治学领域还缺乏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者和若干大师”造成^[31]。有的学者直接用西方的政治“元话语”来观照中国的政治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

五、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途径

关于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途径，学界认为要强化话语意识、顺应生成理路、扩大国际传播和构建话语体系等。这些途径不仅对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提供了理论借鉴。

（一）强化话语意识

强化政党制度话语意识即确立制度自信、增强话语自觉，这是提升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基本前提。首先，要破除对西方的话语依赖与话语崇拜。加强政党制度理论创新，做好政党及政党制度知识的普及教育，积极揭露西方政党制度的局限性、欺骗性^[32]。其次，要从受动思维转变到能动思维^[33]。有学者指出，现代政治中的思想公共产品“也怕巷子深”，制度绩效并不必然带来话语权提升。因而，我们需要有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自觉。要化“被动”为“主动”，化“偶尔”为“经常”，化“小声说”为“大胆说”^[34]。再次，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化侵入，必须敢于接受挑战，摒除各种社会思潮带来的认识混乱和信仰危机，不断提高广大民众和社会对国家和政党

制度的认同,使他们在情感上接受与认可,在心灵深处拥护与支持,在行动上积极实践与实施^[35]。

(二) 顺应生成理路

“构建话语权”与“构建政党制度话语权”有相通之处,一些路径策略可以互相套用。有学者认为话语权是按照一定逻辑关系建构的:“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三是强大的思想宣传机器;四是概念和主题选择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平衡。”^[36]根据话语权的生成逻辑,首先,“国际话语权的拥有和掌控,与国家实力的强弱有关”^[37]。“话语权背后是实力的支撑”是大部分学者的共识。其次,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彰显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是提升制度影响力、吸引力、公信力进而赢得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并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中国样本^[18]。大部分学者从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提升党际协商民主水平等角度提出完善政党制度的对策。再次,在网络化时代,提升中国话语权要改进传播手段、构建话语平台、提升传播能力。有学者对新媒体时代如何实现话语占据舆论宣传领域的高地进行了探讨^[38]。最后,我国政党制度在国际上获得认可,要克服排他性的文化封闭主义,兼收各种文化优长,还要处理好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关系,重视研究各国社会和人民的心理,为增强国际话语权奠定坚实基础^[39]。

(三) 扩大国际传播

进入新时代,中国方案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及全球治理,加强同世界各国政党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加强世界各国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了解,吸引世界各国与中国展开政党合作,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魅力与吸引力,抢占话语权高地”^[40]。这也是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误解的重要途径。有学者认为,民主党派的地位相对超然,拥有对外交往方面的潜力,其在传播中国声音方面更易于被外方接受,可用事实澄清中国不是所谓的“一党专制”国家^[41]。有学者认为,当前应该紧紧抓住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机遇,推动与西方国家的高层、学界、民间的交往和互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增强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知与理解。这要利用一系列合作机制,拓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的研究交流平台^[42]。

(四) 构建话语体系

话语一旦形成体系,就具有社会生活解释功能和价值观凝聚功能。从整体上打造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夯实我国政党制度话语权。目前,政党制度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亟待建构。“与政策解读相比,学理性阐释是以其自身的系统性、科学性与合理性提升对政党制度认同的深度与有效性”^[43]。有学者认为,新时代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建设应依靠“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理论工作者、海外研究者多主体共同努力、各司其职、协同创新”^[18]。由于西方民主制度抢占了话语先机,且我国早期政党政治实践的主流是模仿外国模式,一些学者并未立足“共产党领导”和“多党合作”两个显著特征来分析我国政党制度。有学者认为,“应推进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本土经验研究,勇于使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表述的话语阐释我国政党制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规律。”^[44]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当前我国的政党制度取得显著绩效,但需要以开放的态度广泛借鉴古今中外的政治学话语。作为后生的政党制度,我们要科学合理地批判和吸收世界范围内政党制度的优点与经验,做到为我所用^[45]。

六、研究评述

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视野出发，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既有研究能够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启示，但一些薄弱环节尚待突破。

（一）拓展研究内容的深度

首先，对“中国政党制度”和“话语权”这两个问题单独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将二者叠加成为一个概念的研究稍显单薄。其次，对政党制度的辩护性与解释性研究较多，对政党制度发展历程的研究较多，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较少。对话语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问题—对策”视角，话语权在我国历史上的演进和变迁研究存在缺憾。这不利于我们汲取话语权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

（二）加强研究的实证性与应用性

目前政党制度话语权研究主要采用归纳、总结和概括等传统理论性分析方法，提出的路径与对策难免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若能通过问卷、座谈等方式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构建我国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可行性建议，能够大幅度提高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三）提升研究的系统性与全面性

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但从研究此主题的人员构成来看，研究人员的来源单一。不同机构研究人员的研究内容难以综合，使得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呈现出单一研究视角，较多重复论述，缺少有理论深度的学术成果。

（四）关注西方赢得话语权的实践经验

国内学界对西方话语权的研究往往以批评的视角进行。客观分析西方世界如何赢得话语权，能够为我国话语权的建构与提升提供启示与镜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03.
- [2] 张毅，宋菊芳.试论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权与话语体系[G]//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104.
- [3] 王天楠.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理论话语权的对策建议[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2）：24-32.
- [4] 杨松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构建的四重维度[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5）：42-47.
- [5] 刘菊香.构建多党合作制度国际话语权的思考[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1）：24-28.
- [6] 李金河.对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几点思考[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5）：3-10.
- [7] 黄成华.增强中国政党理论话语权研究[J].社科纵横，2018（2）：1-6.
- [8] 亢升，杨晓茹.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挑战与路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29-36.
- [9] 郭道久.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研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1）：59-65.
- [10] 钱文华.政党制度自信的社会凝聚力探析[J].学习与实践，2015（11）：52-58.
- [11] 孙景峰，汪凤敏.建构与重塑中国政党制度权威的时代价值[J].东疆学刊，2010（4）：63-66.
- [12] 周述杰.对提升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理论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6）：5-8.
- [13] 祝灵君.从制度自卑走向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中国政党制度的成本、效能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

- 校学报, 2017(6): 5-14.
- [14] 魏晓文, 苏杭. 新时代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及功能优势 [J]. 理论探讨, 2018(6): 43-49.
- [15] 张献生. 我国政党制度是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 [J]. 红旗文稿, 2017(5): 15-17.
- [16] 周淑真. 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7): 6-13.
- [17] 王建华, 王云骏. 我国多党合作的民主监督问题研究——基于比较政党制度的视角 [J]. 学术界, 2013(1): 23-31.
- [18] 林怀艺. 论新时代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建设 [J]. 社会科学辑刊, 2018(4): 5-11.
- [19] 周亚东. 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及其式微 [J]. 江淮论坛, 2017(2): 99-103.
- [20] 刘波. 意大利疫情数字的背后 [J]. 人民论坛, 2020(10): 20-23.
- [21] 张毅. 以完善的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增强其国际话语权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3): 18-22.
- [22] 杨松祿, 罗雷.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的话语权构建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8(5): 43-51.
- [23] 王远启. 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 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1): 11-14.
- [24] 陈钰业. 关于构建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理性思考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6): 20-24.
- [25] 邸乘光, 贾绍俊.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3(3): 3-11.
- [26] 王永贵.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真实面目 [J]. 红旗文稿, 2015(5): 8-12.
- [27] 王韶兴.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6): 4-24.
- [28] 周述杰, 朱小宝. 增强中国政党理论话语权的途径选择 [G]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研究.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 138.
- [29] 杨卫敏. 协商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6): 21-30.
- [30] 陈正良. 软实力发展战略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65.
- [31] 杨平. 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条件分析 [J]. 探索, 2017(4): 39-47.
- [32] 顾榕昌. 主动把握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话语权 [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6): 72-75.
- [33] 苏长和. 探索提高我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J]. 党建, 2016(4): 28-30.
- [34] 朱小宝. 增强中国特色政党理论话语权的途径选择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4): 33-38.
- [35]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增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权研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5): 58-64.
- [36] 廖胜刚.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关键词: 合法性、现代性与话语权 [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5): 38-42.
- [37] 许奕锋, 肖光荣.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研究 [J]. 观察与思考, 2019(10): 88-96.
- [38] 张峰林, 唐琼. 提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6): 25-30.
- [39] 俞新天. 集体认同: 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J]. 国际展望, 2016(3): 1-16+142.
- [40] 魏晓文, 刘志礼. 当代中国政党建设互动关系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57.
- [41] 于洪君.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243.
- [42] 朱虹. 突围与形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生成进路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4): 24-28.
- [43] 聂阿山. 关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的思考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3): 35-39.
- [44] 董树彬. 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学术话语体系 [J]. 学术论坛, 2014(9): 13-18.
- [45] 陈萍.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权体系的构建: 理由、可能与路径 [G]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研究.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 31.

编辑: 龚静阳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 卷(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 55(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 52(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j/hlwzx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0年第3期 总第21期 第4卷

双月刊 2020年5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何晓栋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定价：15.00 元

统
一
战
线
学
研
究

二
〇
二
〇
年
第
三
期
（
总
第
二
十
一
期
第
四
卷
）